

恩格斯傳

先哲之如若德意志人

我之友也 德意志人

大力編譯

新中國書局發行

送來物為

有

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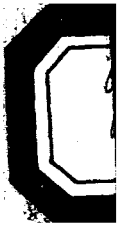
一九四九年

九月

十八日

1949.9.18. 德

自北平



02/2

恩 格 斯 傳

郭 大 力 編 譯

郭大力 編譯

山西省圖書館
藏 書

光華書店發行

108611

序

這是一個思想家的傳記。在寫這本傳記時，我所根據的，是柏林大學社會民主黨史教授古斯達夫·梅爾 (Gustav Mayer) 所著的 *Friedrich Engels: A Biography*。原書是一九三六年在倫敦出版的。

我在一九三八年第一次見到這個原本，因為友人鄭易里在上海書店裏買到了這唯一的一冊，並願意贈送給我。他贈我時，問我有沒有意思和時間把它譯成中文。

次年我在故鄉第一次把它譯成了中文，但不幸，譯稿寄上海，意外遭了損失。再過一年，我到了廣東。我決心把它再譯一遍。但後來我決定回故鄉時，友人張栗原看見這一包譯稿，勸我不要攜在身邊。這第二次的譯稿，才留在栗原家中。不料我同他別後一個月，他就作了古人了。那包譯稿就和他的遺族一同遇了艱苦的命運。

這一個草稿，算來已經是第三次了。我不惜再三重新動筆，是因為這位思想家的生活，太使人敬愛了。他的勇敢，他的熱情，他的謙虛，實在使人神往。同一工作的反復所以不致令人厭倦，主要就是爲了這點。

可是，我這一回不能再是直譯了。原著者在原本的序言上，有這樣的話：「二年前，我曾由海牙的馬丁尼諾夫書店，用德文出版了一個『恩格斯傳』，書分二冊。在這個傳記裏，朋友們的未曾發的遺稿，第一次有了刊行的可能。這個新傳記，是我特別爲英語的世界寫的，所以我特別注意了恩格斯大半生任在英國的事實。」從這幾句話看去，這所謂『新傳記』，原不過是一個更大的傳記的縮編本改編本。現在，我與其第三次翻譯這個縮編本改編本，自不如等待將來，有機會再翻譯那個更完全的傳記了。

還有，直譯的書是比較不易讀的書。在一個不懂外國語的人看來，直譯的書還往往成爲難解的。經典的著作，固不許譯者自由，但像這裏的著作，我是覺得，如果文字能够平易一點，那一定可以便利讀者。就這一方面說，我原假定，我的讀者有一部分是不識外國文字的。

最後，我必須聲明，我除了決意要刪去那些足以使文字顯得累贅晦澀的文字，還發覺了，原著後半，尤其是關於第一次大戰前夜的情形敘述，完全是採取當時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立場。我

覺得，不酌量刪改，是容易引起錯誤的。

這樣，這個草稿就已經不是單純的譯稿了。

郭大力一九四二年十二月

目次

一	家族和幼年	一
二	練習生和少年著作家	三
三	青年德意志運動和少年黑格爾派	九
四	在柏林	一五
五	第一次在英國	二〇
六	和馬克思的友誼	二九
七	回到巴門	三四
八	在布魯悉	三九
九	在巴黎	四四
一〇	黨的形成	四九
一一	「新萊茵新聞」	五五
一二	德國革命	五九

一三	在倫敦.....	七
一四	在孟徹斯德.....	六
一五	軍事研究家.....	五
一六	工廠主.....	九
一七	德國的內政.....	八
一八	再成爲自由人.....	七
一九	國際的分裂.....	六
二〇	社會民主黨的統一.....	五
二一	社會主義取締法.....	四
二二	俾斯麥與社會主義運動.....	三
二三	各國的社會主義運動.....	二
二四	第一次歐戰前夜的情形.....	一
二五	晚年.....	一八
二六	終.....	一五

一 家族和幼年

德意志的工業，最早是在萊茵河一帶發展的。巴門(Barmen)，德意志紡織業的中心，曾有「德意志的孟徹斯德」的稱呼。初期資本主義社會的實況，在十八世紀初年，已經在那些工業化的區域出現了，工廠的工作狀況，是十分悲慘的。真如我們這裏要講的這位思想家說的，在工廠的低的襟下，工人們「與其說在呼吸氧氣，寧說是在呼吸煙煤和塵灰。」兒童從六歲起，就被囚禁在工廠裏，成爲「犧牲品」。就在這時代，這地方，這情形下，我們一位大思想家腓特烈·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生長了。

恩格斯的家世，可以在吳培達爾(Wuppertal)遠溯至十六世紀末葉。他的祖先，似乎曾經是小農業者。那時，那裏的紡紗工業已經相當地繁榮了。家族世營的職業——紡織業——不知在什麼時候開始，但成爲開業之祖，爲家族奠定未來繁榮基礎的，是腓特烈的曾祖父，而在十八世

紀末葉，在他祖父約翰·加斯巴（Johann Caspar）手裏，大繁榮起來。

約翰·加斯巴去世後，他的營業留給他的三個兒子。他們的意見不能和洽，才以抽籤法，決定這個營業應由誰去繼承。腓特烈的父親失敗了。他離開了老店，和姓歐門（Pfeiffer）的兩兄弟，新設了一個棉工廠。工廠先是在一八三七年設立於孟徹斯德，後又於一八四一年設立於巴門和恩格斯克郡（Engelskirchen）。那時，德國紡織業雖然已經很繁榮，但生產技術還很幼稚。不管怎樣困難，他還是設法在他的德國工廠內，採用種種最上等的英國機器。

一八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腓特烈·恩格斯誕生在他的故鄉——巴門。他父親還只二十四歲，母親還只二十三歲。母親愛麗絲（Elise）是一個有敏感而富有想像力的女人。她喜歡笑，就在年紀已經很高的時候，也還有時笑出淚來。父親是一個嚴格的信徒，他信聖經每一個字都是神授的。他雖然時常到英國去，不致抱過於墨守的成見，但家族的傳統，迫使他不得不嚴守正統派的信仰。

關於腓特烈·恩格斯的童年，留下的報告是不多的。他是八兄弟姊妹中最長的一個。家庭的記錄，很看重如下的事實：他的仁慈的天性，很早就表示了。他常常把他的少許積蓄，全數施捨給貧民。他在巴門上小學，一直到十四歲，才轉到曼爾柏（Münsterberg）高等學校去。那個學

校，曾被推稱為普魯士最好的學校之一。在那裏，腓特烈未來的生活，由他父親寫給他母親的一封信，暗示出來了。父親信上說，「腓特烈帶回上星期的報告。你知道，他的態度已經改良了。但不管過去有怎樣嚴重的責罰，他還是不知道順從，打也不怕。今天我非常煩躁，因為我在他抽屜裏發現了一本舊書，從一個圖書館借來的，是一個十三世紀人的小說。上帝保佑這個孩子的心靈，這個孩子雖然在別的方面極有希望，但我對於他，總是扭着心啊！」

父親對於兒子的前途，懷着滿腔隱憂的豫覺。他知道，這個能幹的孩子的秉賦，和這個有秩序的保守的虔敬的家族的習慣，是衝突的。但背叛的兒子，最初並沒有想要越出基督教的範圍，去尋求精神需要的滿足。基督教的理想，在巴門把他包圍着；他自己的精神需要，還在半醒狀態中。一八三七年他行堅信禮時，還懇切希望在家族的傳統信仰中，尋求所盼望的「安靜的宗教樂趣」。堅信禮給與他的生活格言是：「忘記那在後面的東西，求取那在前面的，我要努力前進，實現上帝加在基督耶穌身上的高貴的使命。」這一個格言，無意的，為他後來的生活，指示了一個方向。

不過，這只是一個空空洞洞的指示。決定他後來生活上最重要的事情，是他周圍的工人階級的情形。每天，這個小孩子上學校去，總要走過工廠的旁邊。他看到工人生活的困苦與墮落，是

不能以旁觀者自居的。他自己是一個工廠主的兒子，但他懷疑工廠主的良心。他覺得，「雖然每個星期日要到教堂去兩回」，但一個製造家，即使崇敬虔派的信仰，也不會爲救一個孩子下地獄去。

所以，從童年起，恩格斯就認識了工廠制度的真性質。而資本主義初期工廠制度的黑暗面，也註定了要由他提出第一幅完全的畫圖。

二、練習生和少年著作家

據恩格斯家族傳下來的報告，恩格斯本來想學法律。他的志向後來改變了；改變的理由，有兩種不同的解釋。據一種說明，是父親反對腓特烈上大學，而要他去經商，雖然他自己無意於此。依別一種說明，是腓特烈自己放棄了學法律的念頭，因為他有了自由的見解，不願在普魯士做官。腓特烈在學校裏，差一年沒有畢業，就退學了。在退學報告上，校長寫道，「他以前雖有升大學的計劃」，但現在「他相信他自己寧可經商，把這當作外部的事業。」

在十七歲時，恩格斯曾經認他的內部的事業，實在的事業，是文學。但家族的傳統和父親的堅決反對，使這種志願沒有實現的可能。最初，恩格斯好像是在父親店裏受營業上的訓練。對於這件事，父親曾經為長期的考慮。結果，他被遣到布勒門（Bremen）去了。在那裏，宗教的空氣是和在他的故鄉一樣嚴厲。他住在托里維倫拿士牧師（Pastor Treviranus）家裏，而在康棧。

魯卜爾特 (The Consul Lempold) 的出口部，做一個不支薪水的練習生。這樣的環境，正是父親所欲選擇的。

由腓特烈寫給他妹妹瑪利和舊學友的信札，可以知道他在布勒門的生活的一斑。在事務所裏，他的工作不怎樣繁重。經理先生一出去，練習生的辦公桌上，就可以看見啤酒瓶和盞菸煙，甚至可以看見一卷詩，一封未寫完的信。飯後，腓特烈照例有一點鐘休息的時間；他托一張吊床，搬到貨棧的最高一層樓上，可以在那裏午睡一會。一有空閒的時間，他是喜歡運動的。對於舞劍，他特別感到興致。星期日，他常騎馬，在布勒門周圍的鄉村馳騁。他喜歡游泳。布勒門是音樂著名的；他參加了當地的音樂會，還會編撰樂譜。他參加了當地的友誼協會，那是當地青年商人的集會處。在那裏，有各國的報紙，他可從那裏學習語言。他寫給他妹妹瑪利的信中，有時會用一些西班牙語，葡萄牙語，意大利語，荷蘭語，法語，英語；他會笑說他能用二十五種不同的語言講話。

他是十八歲了，在新的生活環境內，空氣是和在家鄉一樣富有宗教的嚴肅和虔敬心，但一離開父親的束縛，他就開始去整理那正在形成中的新見解了。許多的印象，留在他心中，要他去整理。他開始寫一點雜感之類的文章，送到報紙和雜誌去，居然常常有發表的機會。當然，他這時

清算的對象，就是在他幼年壓迫着他的宗教精神了。

一八三九年，他在「德意志電訊」(Telegraph für Deutschland)三月號四月號，大發了一番反對那種宗教精神的言論。這個雜誌，是由著名青年德意志派作家庫茲考(Culow)編輯的。恩格斯當時是用腓特烈·奧斯渥(Friedrich Oswald)這個假名。他在這個雜誌上發表的吳培達爾通訊，曾在易爾柏和巴門引起許多人注意。誰也不會猜到作者是一個製造家的兒子，並且這位製造家還是一位這樣可敬的基督教徒。

在家裏，他不能有機會閱讀當代各著作家的著作。一到布勒門，他就開始做他在家裏不能夠做的事情了。他自由地從那些著作吸收新的印象。不久，他的批判力，也覺醒了。遇着一個叫作注意的新作家，他就要尋出他的先驅者：最小的指示，也會引起他的敏捷的賞鑑。這樣，他發現了兩個人，在以後數年間，成爲他的老師。由庫茲考，他知道了庫茲考的老師白爾尼(Borne)；由斯托勞斯(Stauss)，他受到了黑格爾(Hegel)的影響。他越是理解斯托勞斯的「耶穌傳」，他關於聖經神授這件事所抱的信念，就越是動搖。他知道在聖經製作上人和神是一樣參加時，他心頭就疑團重重了。斯托勞斯告訴他，聖經中的明明白白的矛盾，使聖經經字神授的假設，沒有支持的可能。他以前對於宗教的嚴格傳統，原只有一種下意识的厭惡心理；現在，他覺得，他

必須在神學上有一個堅固的立足點，來參加德國神學上哲學上的論戰了。他知道，在神學上，只有斯托勞斯和黑格爾左派，能夠引導他到他欲走的確實的路上去。

三 青年德意志運動和青年黑格爾派

宗教的鬭爭，不久就演成了思想上和哲學上的鬭爭，法國革命的教訓，使統治着全國的保守主義者，知道對於權威的反叛，無論是社會的、政治的，還是宗教的，結果都會影響全國威權的每一個掌握者。維也納會議算把歐洲的舊秩序重行確立了，但一八一五年以後，革命與保守的勢力，又處在對立的地位了。革命勢力的兇猛，使統治者驚愕而且駭怕。保守主義的安全，不許再冒第二次的危險了。因此，保守主義的第一個條文，是一切現存的威權是絕對互相依存的。教會與國家締結了不可搖撼的同盟。爲了維持世界的秩序，地上須有一個絕對的君主，天上必須有一個萬能的統治。嚴格的宗教正統，絕對的君主政治，和貴族，是由共同的利益聯成一氣了。因此，要反對他們中的一個，便必然要反對他們的全體；並且，要反對他們，還必須反對他們的哲學——浪漫主義的哲學。

歌德 (Goethe) 和黑格爾死後數十年間，德意志人的志趣，最活躍地爲哲學問題宗教問題佔據着。在這當中，也時時有社會問題出現，但政治上的公開主張，還是不可能的。報紙不許發表政治論文；政治的集會結社，在禁止之列。政府對於自由主義的要求，是採壓制手段。可是，壓制手段反而使青年自由主義激切地走向急進主義。政黨沒有成立的可能，但青年的行動要求，沒有某種行動的組織是不行的。當然，這種組織只有在文學上和哲學上才可能。

在當時，文學方面的組織有青年德意志，哲學方面的組織有青年黑格爾派。這兩種運動，恩格斯都參加了。

最初吸引他的，是文學的青年德意志運動。他會把這個運動叫做「現代文學的女皇」。它的通俗的文體，和他在家裏看慣的過分虔敬生活，成一個尖銳的對照。正如恩格斯所贊美的一樣，這個運動主張了下一代人的權利。不過，他雖然很驕傲地站在青年德意志派作者中間，他還是覺得，他的精神的實在需要，必須到別一個地方去滿足，自他的興趣轉向公衆生活以來，他就渴望有一個真正的同志，指導他從現代生活的迷宮走出來，但在青年德意志內圈之內，他不能發現一個人具備這個條件。他的政治興趣越是增加，他就越是對他們失望。一讀到新故的白爾尼的著作，他就充分認識這個團體是沒有力量的了。

那時德意志沒有別一個人能够像白爾尼那樣忠心於政治問題，那樣守自己的見解，那樣無私地把自己的一切文學天才，用來支持與統治階級相反的新觀念了。恩格斯覺得，白爾尼是西方急進主義思想的儘可能最好的解釋者。自一八三九年到一八四二年，他的書信和論文，不倦地，把白爾尼推稱爲自由與正義之英勇的鬪爭者，他在政治學上所給予他的影響，和黑格爾在哲學上所給予他的影響，是一樣大。他轉向黑格爾時，他還覺得，時代的任務，將成爲「黑格爾和白爾尼的綜合」，將成爲知識和生活，哲學和近代趨勢的調和。白爾尼的革命見解，在這時支配着他。

只要讀一讀他那時撰的一首詩「傍晚」，我們對於這位二十歲青年的心理，是可以窺見一角的。這首詩，發表在一八四〇年八月號的「電訊」上，用「明天來了」這樣一句格言作標題。這句格言，是由雪萊 (Shelley) 作品中借用的。詩中描寫一位青年，在夕陽中，立在威塞爾河畔的法加爾登 (Faldern) 的悲劇展開在他眼前。傍晚的光景，使他突然想到他所夢想的黎明，這是自由的黎明，會使全世界轉爲樂園的黎明。在幻想中，變成了一切人間的聯繫，一切人全被視爲同一個精神家族的成員。他覺得，在自由王旗飄揚着的地方，船會把那「長成爲人類幸福」的穀物，不是把那種「專爲一個人賺錢的貨物」，運送進來。社會主義思想已經萌

了芽，不過表面上還只是和平與自由的萌芽。青年的恩格斯，已經認識了現代經濟秩序的弱點。由青年德意志運動的媒介，他已經知道了聖西門主義。在一篇評論摩里茲·安特（Ernst Moritz Arndt）的論文發表在「電訊」二月號裏，他用「不復與現代觀念相合」一語，來排斥斷分制度（Enfatisshon）包含着的所有權觀念。這時候，這種思想在他心裏雖還不過是一種淡淡的雲，但在白爾尼的陣容中，他已經是一個與牧師反對的自由思想家，是一個與君主政治反對的共和主義者。是一個與貴族王公反對的民主主義者。有一次，他妹妹從一間高級寄宿學校，用女學生的驕傲心，告訴他，說她見了巴登大公夫人。恩格斯看了很不高興，覆信說：「你以後再看見這一類貴夫人時，只要告訴我，她漂亮麼？對於這種人，我只有這種異致。」

使他更進一步的，是青年黑格爾派。新的德意志哲學，至黑格爾而進入危機階段。黑格爾比任何別的學派，都更看重國家的重要性。所以，在腓特烈·威廉三世的政府下，會有許多黑格爾派，被委派去充任教授。正統宗教雖發現黑格爾的神的觀念與神學違背，但普魯士的官僚在這個問題上面原沒有嚴格的見解。反動派雖不斷提出警告，黑格爾的哲學仍不失王家哲學的地位。但自斯托勞斯的「耶穌傳」出版表示青年黑格爾派已經不相信聖經的絕對神授性以來，反動派作家提出的警告，就更被人注意了。

實在說，青年黑格爾派的勢力，也就是在這個時候開始的。一八三八年之後，黑格(Arnold Ruge)的「哈勒年報」成了一個集合點。這更年輕的一代，已經用他們的觀念，當作武器，來反對教會與國家的二元論了。黑格爾說，思想結構也受發展法則的支配。但怯弱的反動時代，使他迷惑，以致認暫時的歷史的現象，有絕對的性質。更年輕的一代，卻由巴黎的七月革命，受到一種刺激。他們不久就用黑格爾的學說，來試驗黑格爾自己的哲學了。黑格爾的辯證法，在前進中受著一種限制。在黑格爾的體系中，整個自然史及精神世界，都被看做是一個過程，即永恆的運動，變化，轉換，和發展；他企圖證明那些運動與發展之間的內在的聯繫。但他又要在這種發展中，承認教會和國家是絕對的。他的青年學徒看到了這種限制，並且要從這種限制，把辯證法解放出來。他們看破了宗教和國家的絕對性。把它們看做辯證法的對象，看做是歷史過程的產物。

腓特烈·威廉四世登位，才使黑格爾派的地位動搖。恩格斯就在他們的地位開始動搖時，到風潮中心地柏林來。恩格斯在布勒門住了兩年，是在一八四一年春，離開那裏的。他的精神正切求能够成熟，而不受擾亂。所以他決定到一個設有大學的都市來受軍事訓練。柏林是最適當的地點，因為在那時，柏林正是精神鬭爭的戰場。他覺得，他自己也正在從事這種鬭爭。黑格爾激進

派，歡迎「腓特烈·奧斯渥」的來到。這一羣青年作家，自命爲「自由人」；在他們裏面，有鮑爾 (Bruno Bauer) 和史迪訥 (Stinner) 是波希米人中最聞名的。

新王反對時代精神的決心，益益顯明地表示出來了。他委任斯丹爾 (Stahl) 和謝林 (Schelling) 爲柏林大學教授，斯丹爾是基督教國家的使徒；謝林是黑格爾的最著名的反對派，鬪爭終於不可避免。激進派於是舉起了十字火。

最早的攻擊，是在哲學上提出的。鮑爾對於福音書批評，使他們不必要接受基督教。神和不可朽者的信仰成了不必要的。君主政治無論是專制的還是立憲的，在他們眼裏，也都成了空洞的觀念。甚至國家本身，從史迪訥和鮑爾的著作看來，也成了多餘的。唯一剩下的，正如費爾巴哈 (Feuerbach) 所說，只是人道的信仰。費爾巴哈使他們在人道主義倫理學的建立上，得到一種新的刺激。他們注意世間，注意行動。由哲學到社會主義的路，就是這樣開放的。

四 在柏林

恩格斯正好在青年黑格爾派進行精神鬭爭的時候。來到風潮的中心地。他被捲入風潮中，反過來風潮又被他推進了。他是在一八四一年秋，以志願兵的資格，加入浩士黨砲隊。在這個秋天，反對的兩派接火了。國王委派謝林的目的，就是叫他去破壞青年黑格爾派的勢力。謝林的就職演說，把哲學的新發展，當作無用的，誤解的來指斥了。

恩格斯聽了謝林的演說，是怎樣覺得憤怒啊！對於黑格爾哲學已經研究有素，但對於希臘哲學，斯賓諾莎(Spinosa)萊布尼茲(Leibnitz)哲學還只有很淺的認識的他，竟受熱情的驅使，去和謝林這樣一個公認的權威者挑戰。一八四二年他發行了兩個小冊子，都是匿名的。先出的一冊，題名「謝林與啓示」。許多年間，這個小冊子被認為是巴枯甯的著作。在裏面，他大胆表白了他的自信。他指責謝林；因為在謝林看來，世界史全部只是一序列外在的偶然的事跡，在其

間，只有神的手可以避去罪惡。黑格爾的神是人類發展中的神，謝林的神却不是這樣。在後出的一冊內，他披上蔽虔派的外裝，把謝林捧上天。當然，這不是真正恭維他，只是想由這個方法，來破壞謝林的哲學地位。

這時候，恩格斯掙脫了一切的束縛，成爲一個無神論者了。現在，他是「自由人」中間最大的一個了。鮑爾失卻波恩大學護師地位這件事，也使他憤怒。爲這件事，他做了一些文章表示不平。一八四二年秋，他寫了一篇論文，送給急進派詩人侯威(George Herwegh)，題名「腓特烈·威廉四世論」。他猛烈攻擊新王扶育浪漫派國家學說的「詭辯」的企圖。他說，浪漫派的國家學說及其「有機國家」論，不過是世襲貴族政治的辯護。他鄭重否認腓特烈·威廉四世有建設其政治體制成功的可能。他說，國王不允許出版的自由，但將被迫承認出版的自由；只要出版的自由一被承認，國會就會在一年之內成立。出版自由和國會，已成爲普魯士輿論集中注意的問題了。

斯托勞斯的影響，使他懷疑基督教的信仰；費爾巴哈更使他進一步懷疑一切宗教。費爾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質，不承認神與不朽性。他看重人，但不把人當作單純的思想存在體，而把意志的力量和感情的豐富，看得和思想的強固同樣重要。在費爾巴哈的哲學內，行動有了重要的地位。

但這一切的影響，不過使恩格斯成爲一個無神論者。費爾巴哈雖然分解了思辨的觀念，但沒

有注意現實的社會問題。他的人類，只是孤立的人類。他的影響，在哲學範圍內是革命的，但這位「隱者」全然不能把遊行動問題的重要，也不能把遊行動問題的本質。

在這裏，衝進來了摩塞·赫斯（Moses Hess）。他的「三國政治」（The European Triad），使人們的注意點，由哲學移到現實的社會問題上來。

赫斯和馬克思同是猶太種，又和恩格斯一樣是製造業者的兒子，他比他們兩個的年紀都大。他們認識社會主義思想，是由他介紹的，雖然他的社會主義，根本和他們的不同。他是一個熱狂的幻想家，他永遠是在幻想中摸索。他熱望人類的未來的完成；他最先是在基督教，其次是在共產主義，最後是在猶太民族主義，尋求他的夢想的實現。他有敏銳的想像力，但不能用明白的理性，把他精神上的志願表示出來。他年輕時，曾游歷法國和英國。他看見英法的情形，便相信德國哲學不能再在寂寞的祭台上禮拜理性了。他注意了法國的社會學，把聖西門主義的精神介紹到德國來。一八四三年十一月，恩格斯曾明白承認第一個把共產主義描寫出來，讓他們去認識的，就是赫斯。

赫斯認識了黑格爾歷史哲學的弱點，因為這種哲學不會由過去和現在，去推斷未來。這正是典型的聖西門主義思想。他把聖西門放在黑格爾旁邊，用這兩位主人公的區別，說明當時德法二

國在發展上的區別。

但還有第三種勢力；必須有這三種勢力合起來，人類在這世間的未來的任務，才能完成。這就是英國。那時大憲章運動，正好在英國流行。他預言英國的革命已經臨近。他看見了，反威權的鬭爭不單實現，在德國的激進哲學內；那其實是一切文明國家的共通現象。他以為，英國的使命是綜合德國的改革和法國的革命，建立世界上完全的自由，政治的社會的自由。他承認英國的革命將廢止貧富的對立，並完成偉大的歷史變革。這樣，赫斯就歸結到共產主義上來了。恩格斯在費爾巴哈哲學中發現的人類的完全的自意識，就實現在一個具體的社會體系內了。

除了赫斯，海涅(Heine)的敏銳的智力，也給了恩格斯深刻的影響。一八二二年海涅的「賴特克利夫」(Reichelt)已經說到有兩種人(富人和貧人)在同一國內鬭爭至死。七月革命把他吸引到巴黎以後，他曾把當時親見的景象記錄下來，投到「一般新聞」發表。恩格斯是一個深刻的讀者；海涅又已經是有名的作家。在這些論文裏，海涅把共產主義描寫得像一個無名英雄，在耳廬侯著，一等有命令，就挺身出來，在世界舞台，扮演它的重要節目。這些論文，恩格斯一定讀過。此外，友仁·蘇(Eugene Sue)，喬治·桑(George Sand)，迭更斯(Dickens)，狄斯累利(Disraeli)諸人，所描寫的貧民狀況，也一定幫助着他記起他幼年時代在巴門親眼見到的

種種情景。這些都成了不可磨滅的印象。

威特靈 (Welling) 的小冊子，他見到了，在他的意思，如果赫斯的共產主義可以說是哲學的共產主義，威特靈就是自發的勞動階級運動的建立者，當然，赫斯和威特靈後來都成了他和馬克思的反對派，但在初期，他們的指導作用是不可否認的。

在柏林，恩格斯受種種的影響，由自由人，變爲工人階級運動的注意者了。一八四二年夏，蘭克夏的大罷工，招致他決定要到英國去看看。父親是孟徹斯德一個工廠主，所以他的計劃是容易實現的。

五 第一次在英國

一八四二年十月初，恩格斯離開了柏林。在回巴門的途中，他在科倫（Coloene）逗留一下，特為要訪問「萊茵新聞」的編輯所。他到柏林以後不久，就開始向「萊茵新聞」投稿了。赫斯也是「萊茵新聞」的投稿人。他們在那裏第一次會見了。幾個月後，赫斯會對奧爾巴哈（Balthold Auerbach）記述他和恩格斯的會面：「我們談到當時的問題。我們會見時，恩格斯是一個徹底的革命者；他離開我時，已經是一個熱烈的共產主義者了。」

十一月底，恩格斯離開了家。父親希望他到孟徹斯德的歐門恩格斯工廠，完成他的商業訓練。他自己却希望在工人運動的中心地，觀察工人階級運動。在途中，他再訪問了科倫「萊茵新聞」的編輯所。他希望能從英國寄一點稿來。在那裏，他第一次會見了馬克思。

這是歷史上一個最高貴的友誼的開端，但這個開端是冷淡的，甚至可以說是不友誼的。馬克

恩是在恩格斯到柏林以前不久離開柏林。恩格斯加入「自由人」時，馬克思不久才從這個團體脫離。馬克思被聘任「萊茵新聞」——普魯士境內被允許出版的第一個反對派報紙——主編的職務了。他和「自由人」的關係雖還沒有斷絕，他主編的報紙也還以「自由人」爲主要的柏林通訊人，但正如在恩格斯到科倫的前幾天，主編和柏林通訊人間發生了激烈的爭論。主編懷着疑團，接待這位被疑爲鮑爾（自由人的領袖）使者的客人。兩位後來共同奠定社會主義基礎的思想，第一次就是在這樣冷淡的情形下會面的。這時恩格斯恰好滿二十二歲。

一到英國，他看見每一個英國人都看日報，都參加會議，都加入組織，他就看見了德國和英國的情形的對照。這時候，赫斯的觀念還影響着他。赫斯以爲，人類的進步，依存於三種革命。他以爲，英國的會革命，將成爲法國政治革命和德國哲學革命的綜合，而形成一個高級的統一。抱有這個結論在心的青年恩格斯，一上岸，就只注意那些可以表示革命已經臨近的記號。

他在英國遇到第一種組織，是摩爾（Mohl）、鮑爾（Bauer）和夏培爾（Schapper）的正義同盟會。他稱他們爲「最早的革命的無產者」，「三個實在的人」。他們是住在倫敦的德國工人。但他們的狹隘的均產的共產主義理想，他是沒有的。他們給了他難忘的印象，但他覺得，沒有在這時加入「正義同盟會」的必要。當然，這個「正義同盟會」對於組織的發展，後來是佔着重

要地位的。

但就一般社會來說，他對於英國人的「素樸的經驗主義」的人生觀，是覺得驚奇。他發覺了，英國人一般缺乏哲學的基礎訓練，他們只注意可以捉摸的現象，而忽略這種現實所依據的原理。他們只看見樹木，而不能看森林。當他看見上等社會還是相信奇蹟，相信摩西的創造神話時，他覺得，赫斯的預言只是一種幻想。不過，他還是對於英國寄與極大的革命的希望。孟徹斯德的情形，迫使他不得不承認，經濟的條件，在現代世界，有決定的影響。他發覺了，在大工業發展的國家，政黨的形成是由階級的對立性決定。他原來的哲學訓練，固使他不易接受這種思想，但經過一度掙扎，他就全然為這種思想所佔據了。這時候，他沒有建立獨立的歷史哲學，但已經知道，經濟的利害關係，正在導向一種社會革命。

他就從這個觀點，去考察當時英國政治上所謂兩黨的鬭爭。很明白的，托利黨 (Tories) 和惠格黨 (Whigs) 的對立，不過表示不動產和財政資本的衝突。一八四四年春他動身回大陸前不久，曾寫一篇文字，說明英國的情形，並斷言現代英國正為階級的偏見所奴隸，它的立法行政司法制度都為統治階級的精神滲透着。他寫道：英國的自由是專制主義。

他不能贊成科布登 (Cobden) 和布萊特 (Bright) 的政治主張。他是一個工業家的兒子，但

在他看來，托利黨內那一羣慈善主義者，阿胥勒 (Ashley) 和迭斯累利 (Disraeli) 的信徒，還有時對工人表示更大的善意。在若干重要問題，他和惠格派是一致的，但在他眼裏，這個黨根本是權主的黨。現在龐大的工人人數，還在支持自由黨，但一有可能，他們就應當建立獨立的組織。自由黨至多只能創立「中庸的立法」。

他住在孟徹斯德。那裏是英國新紡織工業的中心，反穀物條例同盟的誕生地，工人聚集的所在。他在那裏看到了英國工業霸權的黯淡的前途。他以為，法蘭西，比利時，和德意志的工廠，已經在和英國的工廠競爭了。英國已經喪失了歐洲市場。美洲市場也不十分可靠了。他對於資產階級的前途，在資產階級的生產還在十分旺盛的時候，就下正確但令人沮喪的斷言。對於代表資產階級的政黨，他也不能有更好的判斷。格拉罕爵士 (Sir James Graham) 限制兒童勞動時間的提議，為自由黨政府所拒絕了。自由黨顯然已經遺棄他們以前的同盟。

可是，在資產階級以全國民代表資格進行他們的歷史的鬭爭時，還有幾種運動，在同時進行着。

在愛爾蘭方面，有阿康內 (O'Connell) 發起的騷動。自一八四二年發生饑饉以來，阿康內領導下的愛爾蘭農民已經起來。但這位「英傑的梟雄」的「貧乏的目標」，不過在取消英愛合併條

約，不過在愛爾蘭的政治獨立。他只有民族主義，他勸告愛爾蘭人當心「社會主義危險」的話，恩格斯永遠不能赦宥的。不過，對於愛爾蘭民族，他始終是懷着熱情。他寫道：「什麼民族呀！他們沒有一個便士在手裏，他們半數以上沒有一件襯衫披在肩上。他們是真正的無產者，真正的共產主義者——愛爾蘭，是野性難馴的瘋狂的高盧人。不親眼看見他們，是不會知道他們的。我只要有二十萬愛爾蘭人，就能把整個大不列顛帝國推翻。」

同時，大憲章運動 (Chartist Movement) 也在一八四二年的大饑饉中達到最高點。英格蘭北部正爲總罷工所襲擊，風潮的中心地就是孟徹斯德。恩格斯以熱情的態度，觀察罷工運動。在「萊茵新聞」上，他寫道：英國人民的三分之一，也許有三分之二，是屬於產業上的貧苦階級，他們的人數在不斷增加，他們是永不能得到財產的。一八四二年的行動，說明他們已經開始覺得自己的力量了。但他們失敗了。他們失敗的主要原因，在於他們的信條。他們相信合法的革命。幾個星之後，他們剩下的少許節省完了；這少許的節省一用完，他們就被逼得去復工了。現在他們知道了，只有激烈地奮起推翻那壓迫着他們的反自然條件，並消滅血統的和工業財富的貴族，他們方才可以得救。他們怕法律，但更怕餓死。餓死的逼迫，總有一天會使他們起來的。

對於大憲章運動，恩格斯寄與了莫大的同情。普選權的鬭爭，是革命的前奏曲。保守自由黨

不會在和平的運動前面，拱手把政權讓給無產的大眾。所以，大憲章運動必然會走向革命的路；出本身的目的，也正是這個。

他參加了憲章派的運動，不過他發覺了，大憲章運動所揭的目標，不是私有財產的廢止，而是政治的民主。他們是以天賦人權爲根據的。後來，恩格斯批評他們，說他們的啓蒙主張，只是「人類自我認識和解放過程的半節」。

大憲章派以工人階級的名義，出而主張工人階級的政治權利時，在英國，還有一種社會主義運動，出而主張工人階級的經濟權利。這一種運動，是以一個人的天才爲標誌的。這個人，就是洛伯特·歐文（Robert Owen）。

在恩格斯看來，那時候及以後許多年間英國的社會進步，都應歸功於歐文。歐文以爲，他那時代的貧苦現象，全起因於財富分配的不均，在他看來，大憲章派的政治運動，不是克服這種貧苦的方法，雖然他也是相信天賦人權的。但歐文敢宣告婚姻，宗教，和私有財產爲「自有世界以來一切不幸的唯一原因」，恩格斯對之，是只有敬服的。歐文信徒所立孟徹斯德科學院所舉行的星期日集會，恩格斯參加了許多次。

對於這兩種運動，他是以同樣熱情的態度去參加。大憲章派出版的「北星」和歐文派出版的

「新道德世界」，同樣爲他所愛讀。他同樣和這兩個學派的領袖來往。在歐文派中，他的最常見的朋友是約翰·瓦茲 (John Watts) 孟徹斯德的一個裁縫。在大憲章派中，他發現了傑姆士·里齊 (James Trevelyan)。但一八四三年夏季訪問里茲的「北星」編輯所時，他締結了一種重要的關係。他遇見了哈爾內 (George Julia Harney)。哈爾內比他大三歲。在大憲章派中，只有他一人，熟習大陸方面的政治社會狀況。他們第一年會見時恩格斯所給與他的印象，五十四年後，還是沒有消滅。那是恩格斯去世的一年。他說：「一個瘦長的青年，外表上看來幾乎是像孩童一樣沒有成熟，他一口非常純熟的英國話，說他對於憲章運動熱烈地感到興趣。」

但這些英國社會主義者無論是大憲章派還是歐文派，都不知道大陸方面社會主義的思想和努力。因此，他要對他們說明大陸方面的情形。一八四三年他寫了一篇論文，題名「大陸方面的社會改革的進步」。發表在「新道德世界」內。在這篇論文裏面，恩格斯說明了，不單在英國，就在法國和德國，社會也不久就會發生革命，以廢止私有權。他說，一切文明國家的社會運動，必然會由不同的道路，不約而同的，走向這個方向來。各國的領袖和信徒間，應建立一種友誼的關係。宣言最後的一句話——「全世界的工人聯合起來」，——就由這樣一種觀察，預示出來了。

在英國，他常常投稿到雜誌去，——「萊茵新聞」，「北星」，「新道德世界」。但他這時

期的最重要的著作，是「卡萊爾論」和「經濟學批判綱要」。

英國的知識份子中，在恩格斯看來，只有卡萊爾(Carlyle)一個，會真正想到他生活所在的社會的道德問題。卡萊爾痛斥當時的虛榮心，責備社會制度的腐敗。看到這種議論，恩格斯是贊揚的。但卡萊爾的主張還嫌不夠。他攻擊競爭制度，但不能認識一切罪惡的根源是私有權。

「經濟學批判綱要」大約也是這時寫成的，這篇論文，比「卡萊爾論」更大胆，更有神彩。他看到了，在世界工業的首都，生產已由機械的發明，漲到驚人的水準，人民大眾却還在財產制度的壓迫下，因為他們不能獲得也不能消費他們自己的勞動的生產物，引起這種稱奇的「不合理的無感情的公開競爭的機構」，居然被整個古典學派視為神聖的。私有財產居然被英國資產階級認為必要的，不可破壞的。看到這一點，他就心有所感了。那時他還只二十三歲，但已經對於這些經濟學家，實行理論的攻擊。他認為，這整個體系，只是矛盾的雜湊。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尤其是如此；這種理論，只是「自然與人道之可厭的褻瀆」，不過要視可厭的社會構造的結果為自然法則而已。

這兩節論文，充分說明了恩格斯的歷史天才。那都是用真名字發表的。他從德國帶了辯證法的革命思想來，而在英國獲得它的實際的社會的應用。他瞭解了階級和國家的關係，瞭解了工業

革命的社會結果，瞭解了資本主義發展的趨勢。他決定了他終生努力的目標；現在他要為這個目標的實現而努力了。

他於一八四二年十二月到達孟徹斯德，於一八四四年八月底離開那裏，回德國去。還不到兩年的時光，對於他以後的生活，是重要的。他已經是一個革命的社會主義者了。

六 和馬克思的友誼

在回國的途中，他在巴黎逗留了十天。在蘭克夏「可怕的銀灰色的天空下」住過一個長歲月的他，現今再到明朗的都市來了，但在這個都市，他的偉大的經驗，不是這個都市的繁榮，不是巴伯夫 (Barbours) 瑪拉特 (Marat) 洛伯斯庇爾 (Robespierre) 的紀念地的憑弔，而是一種寶貴的友誼的新交。

馬克思和恩格斯終於互相瞭解了。他們締結了歷史上最寶貴的友誼，他們共同奠定了人類社會發展的理論上和實踐上的基礎，他們是人格上統一的。他們是同一條大路上永遠沒有發生過爭執的伴侶。他們共同擁護他們共有的精神財產，一直到他們的最後一日。

當然，相同的見解和目標，是造成這樣一種含糊的根本前提。他們已分別由觀察和研究，得到同樣的結論。他們知道，他們必須永遠在一處學習，一處奮鬥。但在這裏我們要說明的，與其

是他們性格上的相同點，實是他們性格上的差別；與更是他們共同的作業，實是他們各個對於這共同作業的特別的貢獻。

我們大家承認，恩格斯的地位是次於馬克思的。恩格斯在給倍倍爾 (Bebel) 的信上，曾公開承認是馬克斯告訴他以科學工作的意義。一八八〇年他給倍倫斯泰因 (Barnstein) 的信，提到馬克思，也說他不知道一個人怎樣能够嫉妬天才。「天才是不世出的。沒有天才的我們，應當知道我們是不能得到天才。」在他和馬克思的通信中，他承認他自己在理論上是懶惰的。他常常說，他的職務是「玩第二把琴」。

但在一切點上，他都只是附和者麼？李卜克內西 (Liebknecht) 曾經說到，他這對透明的藍眼睛，有洞察的能力。他尖銳攷獲本能，他的確實的觀察，他對於真理的不妥協的把握，他的堅決的方向感覺，他的本能的選擇力，凡是和他在一塊的人，都知道的。二十年後馬克思就會對恩格斯說：「你知道，在事物的理解上，我總是遲緩的，總是跟在你後頭。」實在的，恩格斯的「卡萊爾論」和「經濟學批判綱要」，以及他口述的意見和事情，對於馬克思，是有意義的，馬克思的抽象思想，常常要靠恩格斯的材料來充實。他在編輯萊茵新聞時雖然已經知道經濟學在歷史上的重要地位，但這方面的必要的知識，他還是全然沒有。研究經濟事實的必要的技術，是恩

解，他是不高興的。他是一個熱心的騎獵者，他會以同樣的精神，「在抽象思想的高壇上面行獵」。在他不足的地方，正是馬克思有餘的地方。反過來，馬克思不足的地方，也正是恩格斯有餘的地方。他們會成爲互相補足的一體，自是當然的了。

七 回到巴門

恩格斯回到巴門了。他原以為，商業生活一有可能就拋棄掉。只有這樣，他才可以專心於真正的事業。但這種真正的事業，和他的家族的傳統，是絕對不相容的。所以他不能不忍耐，以期避免與家庭衝突。

這時候，恩格斯寫了一部重要的著作「英國勞動階級的狀況」。後來，他被人推稱為記述經濟學之祖時，他很謙虛地指出了配第 (Petry) 和布瓦茲爾培爾 (Bois-Guilbert) 等。他說，他能在近代工業的中心地，最先把眼睛睜開來注意這些顯著的情形，是一件對於他十分幸運的事。這本書，是用英文，獻給英國勞動階級的。在獻詞中，他說，他曾研究許多文件，並會實地觀察，目的在提示一幅真實的圖畫，使英國勞動階級在反抗壓迫者的社會權力和政治權力的鬥爭中有所指示。他說，他只要想到，他在孟徹斯德沒有把餘暇時間，用在工廠主們的豐盛的筵席上，

卻把牠用來和貧苦的工人們接近，來研究他們的生活，心裏就覺得愉快。在德文的序言中，他註明了，他那裏描寫的，雖只是英國人的奴隸狀態，但在德國，結局也會有同樣的結果發生。在書前，他曾對於產業革命初期英國的經濟發展史，作一導論式的考察。他斷定，近代資產階級脚下的泥土，註定了有一天要把他們自己吞滅，書的大都分，是記述無產階級各階層的情形，最先是工業勞動者，其次是礦山勞動者和農業勞動者。有幾章是討論愛爾蘭的移民問題，討論大都市，討論競爭對於無產階級的影響。在勞動階級運動這個題目下，有大憲章主義和英國社會主義被討論了。最後的一章，是研究中等階級與無產階級的關係。在充分診斷社會的病狀以後，他才用一種預測，作為全書的結束。這個預測，是我們大家知道的。

在巴門，並且在德意志各邦，現在都流行一種謀工人福利的組織。各邦的政府，爲要使公眾的注意，由一些更嚴重的問題，如代議政治，出版自由等等，轉移到這個更無害的問題上來，也贊許這種組織。恩格斯當然不贊成這種改良的欺騙。但因爲這種組織不得警察許可就可以集會，恩格斯是常常參加進去。在那裏，他常常遇到一些有急進思想的人。但一八四四年十二月十四日他在「新道德世界」發表的論文「共產主義在德國的迅速進步」，卻表示他的見解過於樂觀了。

這時，他的思想，已經脫離了赫斯的影響。這可由「英國勞動階級」一書知道。在那部書

內，他不像「真社會主義者」一樣應用一些魔術的公式如「人」，「真人」，「人類」等等了。他相信，現制度的不完全性，必然會由內在的必然性，生出一個更好的制度來。他看見了階級鬥爭才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原動力。他已經不能像赫斯一樣以人道主義的空口號爲滿足。但雖如此，他還是和赫斯在一道。他們籌辦了一個月刊，題名「社會鏡」，但附以另一名稱：「代表無產者和分析當代社會狀況的機關雜誌」。他們聲稱，他們的目的在記述單純的事實，不帶任何政治性質。但不久政府就看出了當中的危險，刊物以後就停刊了。

恩格斯和赫斯在這時候做的別一件事，是利用工廠主們的慈善組織，來和一些有進步思想的青年接近。這些青年不知道他們的目標，更不瞭解他們的目標的實踐可能性。因此，恩格斯和赫斯同意在一個茶室內，開一次私人的座談會。這次集會，也許應當說是德國最早的社會主義集會。爲要避免政府的注意，開會以前，請了幾個琴師奏音樂，唱了一些以社會問題爲基調的歌。然後，赫斯和「腓特烈·奧斯渥」開始演說。

赫斯稱共產主義爲愛的原則，恩格斯却用流暢的語調，分析他在英國所見的自由競爭制度的不合理。他用現在的制度和 he 理想中的制度相比較。他說，他理想中的制度，可以把社會的階級區別消滅，金融恐慌取消。他說，實現的路有各式各樣，英國人會建設少數共產主義殖民地，法

國人會用法律來實現國家的共產主義。他沒有說到德國。因此，第二晚，有人起來責問。第三晚他答覆這個問題時，因為他已經決定立即離開德國，才大胆地說，在德國，社會革命也是必然的。他的主要論據點，是英德二國未來的商業競爭。他指證了，如果工業不要落後，它是必須發現新的市場。如果沒有新的市場了，英國必定會壓逐別個國家的工業，來保護他本國的工業。結局是英德二國的工業爲生，死亡之鬭爭。恩格斯以爲，那一定是英國勝利。這樣，被壓迫的德國工業，就會不能養活它的人爲地創造出來的無產者大眾。社會革命會立即跟着起來。但就使德國戰勝了，它的情形也會和英國現在的情形一樣。在任何一種情形下，社會革命在德國都是不可避免的。

自他第一次離開家庭以來，他從沒有像這回這樣久留在父母家裏。他的思想和家族傳統的信仰中間，已經有不能填塞的溝隙。父母原希望他在父親的事務所內担任商業的工作，但經過半個月的勾留，他覺得這是不可能了。一八四五年一月二十日，他寫信給馬克思道：「這種鎖銖比較的工作，是太可怕了；巴門是太可怕了，時間的浪費是太可怕了，但尤其可怕的，是不但繼續要成爲一個布爾喬亞，並且要做一個製造業者，與無產者積極地對立着。只要在他老人家工廠內住幾天，這一切可怕的情形就都看到了。當然，我也曾計劃着，在適合於我的情形下，守着這鎖銖

必較的營生，然後寫一點觸犯禁例的東西，好逃之大吉。但我等不得了。如果我不是每天可以在我的書上記述那最可厭的英國方面的情形，我怕早已硬化了。只有那種工作，還使我的怒火燃著。在不寫作的情形下，一個人可以是共產主義者，同時還保持布爾喬亞的地位，錙銖必較者的地位。但工業，錙銖必較，廣泛的主義宣傳要合在一起，是不可能的！」

八 在布魯悉

父親有意送他到波恩大學去唸書，但要他放棄主義的宣傳。不久，父親發覺了，兒子的主張是不能改變的，他是一個領袖的製造業者，教會的長老，怎樣能讓兒子去做這種傷他的顏面的事情呢？父子間爆發了爭端。一八四五年三月十七日恩格斯寫信給馬克思，說他在家裏是過的「狗一樣的生活」。他說，「你簡直不能想到，在我靈魂後面叫着的基督教的妖術，是怎樣可怕。」他說：他現在不要和任何人吵鬧，因為他決定在半個月內設一個法子離開家庭。他說：母親是很愛的，假使不是爲了她，他一定不會對瘋狂的專橫的父親讓步。

父子間的關係緊張到不能忍耐的地步了，所以警察對於他特別注意這件事，反而救了他。在巴門被捕，對於驕傲的父親，是一件致命的傷害。所以，恩格斯爲求安全而決往布魯悉時，父親不能反對。那時，馬克思也從巴黎被驅逐出來。自二月以來，就住在布魯悉了。

他們第一次能够在密切的日常生活中，從事理論的學習和建設了。他們的主張，也就是在這個時期，取得決定的形態。

一八四五年夏季，朋友備借遊英格蘭。恩格斯要恢復他和大憲章派的關係，並迎接瑪利·白恩士(Mary Burns)到布魯悉。這個女人是一個真正的愛爾蘭女工。她在恩格斯第一次到孟徹斯德時，就成了他的忠實的伴侶；從現在起，他就成了他的終身的伴侶了。馬克思是要在恩格斯的指導下，接受最初的英國的印象。他已投身於經濟學的研究了，他很想跑到英國去，學習初期英國經濟學者的著作。他們在英國住了幾個星期。這幾個星期的經驗是極豐富的。許久以後（在一八七〇年），他還在給馬克思的信中，提到那些日子的情形，這時候，恩格斯是「北星雜誌」的經常的投稿人了。以前他在「新道德世界」發表主張，尚以為在德國，革命將成為知識份子的工作；現在，他把這種主張否認了。他以為，沒有外援，工人階級也會把革命貫徹。

回布魯悉後，他們想合寫一本書，來發展並且完成他們的唯物論的歷史觀。這部書，可以說是「神聖家族」的理論的繼續。主要的批判對象，還是他們自己曾經一度抱過的「哲學意識」。在那裏，他們攻擊了鮑爾，史迪訥，甚至費爾巴哈，和「真社會主義者」。書名「德意志觀念形態」。自一八四五年九月至一八四六年八月，書寫成了。但它的命運是極不幸的。在德國的嚴格的

書報檢查下面，沒有一個德國的或瑞士的出版家，敢發行他們的著作。同時，馬克思完成了他反對蒲魯東（Proudhon）的書，但也找不到出版家。一八四七年三月恩格斯寫信給馬克思說：「如果我們合著的書會妨礙你的書的出版，就請不要憐惜，把我們合寫的那個稿子，拋到抽屜裏去罷。你的著作的出版，是一件更重要的事。」他們實際也是把「德國志觀念形態」一書的原稿，留給「耗子們去爲嚼食的批評」。這一冊綜合說明他們的歷史見解的書，到他們逝世以後許久，才能夠出版。馬克思寫信問恩格斯，在他的反蒲魯東的著作裏，是否可以使用那已經在這本合著書內表示過的見解。恩格斯答說「當然可以的」。他們兩個的精神財產常常是共有的。在一切他們的著作裏，我們往往不易辨別他們各個人的貢獻。就這時期的著作說，更加是如此。大概說來，「觀念形態」的最大部分是恩格斯寫的，但經過了馬克思的修改和補充。原稿一部分是威特梅爾（Wey demeyer）——普魯士的退職砲兵軍官，在布魯悉，成了他們的知友——抄寫的，所以筆跡不能成爲辨別的標準。在他們兩人當中，恩格斯的文章是流利的，他能以驚人的速率，寫出長篇文字，甚至整個小冊子。但思想一定是兩個人商量好的。恩格斯會再三說到，是馬克思在他們在布魯悉會見時，把他們歷史觀的基本原則提示於他。這種表示，是謙遜和事實並存的；因爲我們知道，恩格斯在英國已經感到了歷史進化的路線，不過這種感覺，在他遇見馬克思以後，才成

爲確實的堅定的理論。

在「德意志觀念形態」內，他們用了「共產主義黨」這個名稱，這是第一次。以前，人們總是把它當作一種哲學的意見來看待。他們說，這個黨，一定要成爲工人階級的黨。

可是，那時候德國的工人，還不能接受他們的主張。留在外國的德國工人，有許多隸屬於革命的正義同盟會。但這個後來對於黨的形成盡了最大責任的同盟會，對於知識份子，是不信任的。因此，他們必須把他們的不信任心理克服，讓他們接受他們的新歷史觀。

但可以同他們算做一黨的，有一些什麼人呢？基佐 (Gutzko) 驅逐德國亡命作家的措置，使比利時成爲這些亡命客的主要集中地了。馬克思最先從巴黎來的；恩格斯跟着從德國來；此外，還有赫斯，還有威特靈，還有賽勒 (Sailer)，威特梅爾 (Weydemeyer)，威廉·中間沃爾夫 (Wilhelm Wolff)，威爾茲 (Georg Werth) 和扶萊里格勒茲 (Freiligrath)，加上幾個有知識的工人。整個團體，大概等於二十位。

但在二十個人當中，威特靈和赫斯在見解上是和他們極不相同了。恩格斯承認他們兩人對於他和馬克思會發生過一些影響，也不輕視他們的歷史地位，但現在他覺得，他們之間的差別太大了，再合作下去，是不會有利益的。威特靈既沒有哲學的素養，又沒有歷史的意識。他牢牢守着

他自己的無結果的幻想，對於這兩位青年思想家，是絕不注意的。他自命爲德國無產階級的天然的領袖；在他看來，這兩位青年思想家只是「狡猾的權謀家」。他不瞭解資產階級革命必然會先，共產革命而生；也不瞭解感情只是「眼中的塵埃」。他在口袋裏懷着一個在地上建立天堂的藥方，時時擔心有人會從他口袋裏把這個藥方偷去。

破裂成了不可避免的。先是，在一八四五年初，有一個名叫克里格 (Kriegel) 的學生，持費爾巴哈的介紹信來見恩格斯，並由恩格斯介紹到馬克思那裏。他由布魯悉到紐約，得着一個美國富翁的幫助，辦了一個雜誌，自稱爲巴伯夫 (Barbott)「人民論壇」的繼續，實際却是「真社會主義」一個可憐的抄本。馬克思恩格斯早就要和這個運動脫離，現在他們才決定，和這個運動脫離，已經是刻不容緩了。一八四六年五月召集大會時，馬克思恩格斯提議發行一個小冊子，指斥克里格在美洲的活動。威特靈反對這個提議。當提議案通過時，他知道，他和德國工人的關係，已經無可挽回，乃決定到美國，和克里格攪在一起。

在議決開除克里格的那次大會裏，赫斯沒有出席，但事後批評大會的處分未免過嚴。馬克思恩格斯覺得，一切動搖都是危險的。他們告訴赫斯，如果他的態度不改變，他也將被開除。赫斯當然更憤怒，和他們的關係也就斷了。

在這所謂「黨」內，意見不同的份子，都先後退出或被開除了。恩格斯看見，留在外國的德國工人，已經不再信任威特斃了。他覺得，他必須用全力去把那些工人抓牢。但那時留在法國的德國工人，還在效忠於格林（Carl Grün）——哲學的社會主義的領袖。馬克思被法國政府驅逐出境了。恩格斯看到這種情形，才於一八四六年八月，決定前往巴黎。

九 在巴黎

在巴黎，德國籍的工人，主要是縫紉工人、細木工人、皮革工人。他們到巴黎去，目的是在謀手藝的改良。希望回國以後，當起老板來。德國還是手工業流行的，巴黎則是時髦、藝術、和手藝的首都。把巴黎看做孟徹斯德，把這種手工工人看做英國的工廠工人，恩格斯要獲得他預期的效果，當然是極困難的。但他的努力畢竟獲得了一些成就。

當格林把蒲魯東「經濟學的矛盾」一書中提出的合作計劃恭維得無以復加時，恩格斯譏刺地問，他們是否真正希望用他們的少許節省，把法國乃至全世界購買進來。在一次集會裏，這個「世界解放計劃」——被稱爲「哲學家的寶石」的——被討論了三晚。最初，整個團體都反對恩格斯。他宣講武裝革命的必要，指摘格林和蒲魯東，說他們的理想是小資產階級的理想，他聽見到會的聽衆都反對共產主義時，他憤怒了，提議舉行一次投票，決定集會的目的是否辯論。他說，

如果他們是以共產主義的資格參加，則對於共產黨主義的攻擊應該停止。如果不是，他就不願多費口舌了。格林的信徒們說，他們其實不知道什麼是共產主義的目的。因此，恩格斯對他們提示了一個「明白而單純的定義。」他說，目的在：

「一、實現無產階級的利益；這個階級的利益，與資產階級的利益是對立的；

二、爲要實現無產階級的利益，必須廢止私有權，而代以共有制度；

三、承認激烈的民主革命；是完成這些目的的唯一手段。」

第三晚，恩格斯居然把聽衆的大部分說服了。

恩格斯到巴黎來，還有別一個目的。他願與法國的工人領袖，確定更密切的關係。他在那裏創立了一個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這就是「國際」的雛型。但在法國他的工作是極困難的。他不能把蒲魯東說服；卡伯(Cabot)也用背向他。路易·布朗(Louis Blanc)的「改良」派也不能同他合作。恩格斯向布朗說明他的觀點時，布朗就指摘說，「那麼，你的宗教是無神論了。」

在巴黎，他遇見了海涅。他的「織者之歌」，會由他譯成英文。這位預言家，預言了革命的臨近，描寫了德國社會的腐敗。可是這位可敬的天才，已經衰老到不堪回首了。恩格斯去訪問他時，他只殷殷問及他以前的舊文。

當恩格斯馬克思正竭力與「真社會主義」和威特靈的手工匠共產主義鬭爭時，又一個困難問題發生了。那時，大眾正在支持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但自一八四四年職工暴動以來，社會上時常聽到一種論調，好像封建地主比自由派資產階級還更同情於工人的解放運動。一八四七年九月十二日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比新聞」發表的宣言，却力說，無產階級不必問資產階級要麼做什麼，只問他們必須做什麼。「無產階級應當問一問，使他們有實現目的更大機會的，到底是官僚統治下的現狀，還是自由派目下正在爭求實現的資產階級統治。」資產階級的統治，才會給羣衆以新的反對資產階級自己的武器，才會給羣衆以一個新的地位，那就是一個合法的黨。基督教雖有社會原理，但在古代，它是爲奴隸制度辯護，在中世紀，它是爲農奴制度辯護。基督教認一切可恥的壓迫爲原始的或後來的罪惡之正當的處罰，或只是天主對於其臣民所驟加的試鍊。說到資產階級革命，說它不能實現無產階級的目的，那是不錯的，但在臨近的革命中，民主主義者必然是無產階級的最密切的同盟。

所以，當資產階級的共和黨人海因詹 (Hans Heineken) 在「德比新聞」撰文，說，德國的絕望情形，不是由於一般狀況而是由於少數國君時，恩格斯就起來說，海因詹的主張，是地方的感傷的烏托邦主義之雜拌。他說，民主主義必然會導向無產階級統治，無產階級統治則爲一切社會

主義策略所必要的先決條件。

普魯士政府在財政窘迫的情形下，不得不召集國會了。這正是革命的前奏曲。自由黨的多數，在他們的最重要的主張未蒙國王批准以前，是不會批准舉債法案的。恩格斯以爲，在資產階級奪得政權以前，工人階級必須支持資產階級的鬭爭，像支持他們自己的鬭爭一樣。這些意見，是發表在一八四七年三月六日「北星」的一篇論文上。

國王四月十一日的就位演說，有這樣沉痛的話：「我和我的國會，我們要侍奉天主啊！」帶着怒氣和鄙視心理的恩格斯，拿起鉛筆，把白宮中的情形，畫成一幅諷刺畫。馬克思在五月六日的「德比新聞」把這幅畫刻印了。這時恩格斯還寫了一本小冊子評論普魯士政府，這個小冊子沒有出版，但他去世後，他的遺稿中，發現有這個小冊子的大綱，在裏面，他斷言，在臨近的德國革命中，只有中等階級的領導可以成功。

十 黨的形成

一八四三年正義同盟會的領袖卡爾·夏培爾、亨利·鮑爾、約塞夫·摩爾邀恩格斯加入同盟會，但他們對於天賦人權學說的信仰，使他不願去接近他們。一八四五年夏，他訪問倫敦時，這些領袖再表示願組成一個協會，成爲通訊委員會的英國分部。協會定名爲博愛民主黨(The Fraternal Democrats)，推哈爾內(Harney)爲領袖。對於協會的建立，恩格斯盡了很大的力。恩格斯的著作「英國勞動階級狀況」一書，已經使這些領袖們瞭解機械所引起的社會變革。馬克思由布魯悉茲到倫敦來的宣傳品，也發生了很大的影響。這時，他們不要再從事於烏托邦體系的「販賣」了。威特靈的訪問，使他們痛苦地覺得失望。他們一八四七年與卡伯的談話，也同樣使他們失望。卡伯的理想，不過要在美國，在新的歐洲革命的前夜，建立起一個共產主義殖民地罷了。

在卡伯訪問以前，正義同盟會中央執行部已決定派摩爾到布魯悉茲訪問馬克思，到巴黎去

訪問恩格斯，要他們幫助在組織上和原則上把同盟會改組。應爾對他們說明，同盟會很信服他們的主張，目前正在注意要實行一次完全的改組，如果他們願意在這種改組工作上發生影響，他們就須加入正義同盟會，把通訊委員會改爲同盟會的一個分部。必須接受這些條件，他們才有資格出席會議，他們的主張才能在會議中提出討論。他們早就想和德國的無產者握手；現在手伸出來了，他們能拒絕麼？

他們愉快地加入了同盟會。會期定在一八四七年六月。恩格斯是以留巴黎的德國工人的代表資格出席的。馬克思因爲沒有錢，不能到英國去出席。在熱烈的討論之後，他的最根本的建議之一是：新的會章，應破棄自上決定的傳統。祕密會社註定了要獨裁地由一個中央委員會去統制，但在公開的協會內，職員必須由全體會員推選。正義同盟會改名爲共產主義同盟會並採用恩格斯提出的字眼作爲宗旨：「推翻資產階級，建立無產階級統治，廢止以階級對立爲基礎的舊資產階級社會，建立無產階級無私財產的社會。」

這個新同盟會，爲要製定它的「信條」，推夏培爾和摩爾起一個初稿，但在公佈以前，馬克思恩格斯的提議的任何修正案都被包括進去了。他們的草案。用了一個新的格言「全世界的工人聯合起來」，代替他們的舊格言「一切都是兄弟」。恩格斯的影響是很明顯的。

同盟會的第二大會，定期在一八四七年十一月三十日，想要把第一次會議未完的工作完成。夏培爾和摩爾的信條大綱，曾在同盟會的若干支部提付討論。巴黎的分部，以赫斯的修正信條爲基礎。但恩格斯嚴厲地批評了它，所以新信條製作的責任，歸到他身上來了。這一回，他毫無疑問的，被推爲代表了。這第二次會議，完全實現了恩格斯馬克思的希望。他們被正式請求去決定黨綱的最後形態了。

巴黎支部要求他重新起草一個信條，在他離巴黎赴倫敦之前，他匆匆寫了下來。他反對用「信條」二字。十一月二十四日他寫給馬克思的信，提議用「宣言」二字，因爲裏面「必須包括一些歷史」，那是不宜於問答體的。在法國，一七九六年有「平等宣言」。所以，宣言二字是文獻上極熱習的。

他寫信給馬克思說，他的草稿「不外是敘事，非常匆促，非常不好地湊成的。」在同一信裏，他要馬克斯「稍稍把這個信條考慮一下」。也許恩格斯原來並不希望馬克思另起草的。可惜馬克思這幾週間給恩格斯的信已經遺失了。關於「宣言」的起草，恩格斯以後屢次說到，他和馬克思是分別起草的。「宣言」的辭意的嚴密，文體的鍛鍊，也表示它不是匆促寫成的。「宣言」展開了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全景；它用天才的力量，發揮了教訓，預言，鼓勵，和感化的作用。從

這一點說，馬克斯的天才的特徵，是充分表示出來了。

但從當時尚未出版的「德意志觀念形態」看，我們卻又發覺，在探賈的工作上，恩格斯的貢獻是不下於馬克斯的。除了形式的區別，「宣言」中講到的每一點，都已經在「德意志觀念形態」一書講到了。在近代無產階級的起源及其未來使命的說明上，在階級鬭爭的機能的說明上，在國家機能的萎縮的說明上，在共產革命的必然性的說明上，前一部書都可以說是先於「宣言」的。兩個文件的教訓是相同的：即，資本主義，自由競爭，資產階級統治的時代，註定了要轉化為共產主義和無產階級統治的時代。恩格斯的謙虛，使我們不能憑他的自白，來斷定「宣言」著作的經過。我們大概可以這樣斷言，「宣言」的最後形式是馬克思決定的，但它的內容是他們兩人共同獲得的結果。在某些點上。比較起來，恩格斯還是先覺。他先瞭解了近代資本主義的性質，先決定了無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對立地位，先嘗試把德國哲學和英國經濟學綜合起來，先接受共產主義的信條，先認識國際組織的需要。不過，馬克思才把這些論點，嚴密織入他的唯物歷史觀的體系內。

「宣言」是一八四八年一月完成的。一月二十五日倫敦中央執行部提出一個最後通牒，跟他們在二月一日以前交稿。那是在倫敦印刷的，在二月革命爆發以前數月內分送到同盟會各支部。

對於一八四八年一八四九年的革命運動，它沒有發生顯著的影響。在那時，它沒有在市場上公開推銷過。除了同盟會的幾百會員，也很少有人讀過它。

當然，後來的人，是把它當作歷史上一個經典了。

十一 「新萊茵新聞」

巴黎的二月革命，驚動了比利時政府。爲要在布魯塞爾預防暴動的發生，比利時政府下令驅逐了許多外國革命家。馬克思和威廉·沃爾夫都被逐到法國邊境了。恩格斯因爲從法國被逐出時領有比利時的護照，所以沒有遭再度被逐的命運，但他也跟着到巴黎來了。同時，同盟會本部也由倫敦移到巴黎來了。德國的革命發動了。馬克斯和他的同志，立即提出了他們的「十七點要求」。

恩格斯知道，在德國，因爲沒有多數的工廠勞動者，不得到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參加，民主主義的勝利是不能得到的。他知道，在那裏，貴族還很有勢力，上層中等階級並不怎樣有力量，他知道，大多數工人還不是近代工業家的隸屬，而是小手藝老板的隸屬。他知道，中等階級必然會反對無產階級志成爲統一勞動階級的要求，他們必然會反對無產階級大獲土地的提議，必然會反對

運輸機關有，礦山國有，銀行國有的提議，必然會反對官吏應支同額薪俸，遺產繼承權應受限制，工人的工資應足夠生活的主張。但他說，如果這種種政策實施了，則無數的被剝削工人，就能以生產者的資格，取得生產者應有的權力和權利了。

恩格斯聽說德國已經發生革命，是多興奮啊！許多工人都渴望著回祖國去，但必須有組織，回國的運動才可以安全。所以，一直到四月下旬，他和馬克思才動身。但到德國，他們將任何處呢？會有人勸他們回到各自的故鄉，準備取得普魯士國會候選人的資格。但這種志願他們是沒有的。他們已經在萊茵締結着千密切的關係，萊茵又是德國最發展的區域。所以最後他們決定到那裏去辦一個報紙「新萊茵新聞」。出版終於自由了。

但馬克思恩格斯到達科倫時，創辦一個民主主義報紙的計劃，已在進行中。贊助人聽說共產主義領袖要從外國回來奪取這種計劃的實行權，當然是不高興的。但如恩格斯所說，「在二十四小時內，我們就把一切障礙掃除了。馬克斯做了工作的大部分；報紙到我們手裏來了。」一八四二年舊「萊茵新聞」的編輯人，現妻再被委託去編輯這個新報紙。他必須接受的唯一條件是報紙應採取民主主義立場。但經費的困難，使他們不得不進行募款。恩格斯回吳培爾達爾去了。從那裏，他寫信給馬克思：「只要我們的十七點要求有一本流傳到這裏，我們的信任就喪失了。資產

階級的見解，是真正值得鄙視的。」馬克思提到他父親。恩格斯回信說：「他會願把一千枚子彈射進我們肚裏，要他拿一千塊錢，是決不會肯的。」在父親看來，連副良的「科倫新聞」也是過激派的報紙。

在吳培達爾，恩格斯應哈爾內的請求，把「宣言」譯成英文，並在那裏設立了一個同盟會支部。六月一日「新萊茵新聞」出版時，他到了科倫。同盟會設在科倫了。「新萊茵新聞」組織了一個很精萃的編輯部。恩格斯到七十歲的時候，還有時記起那時候的工作的快樂。他們的每一句話，都可以發生影響。他們每一篇文章，都像炮彈一樣射擊，一樣爆炸。從革命無產者的觀點批評德國國內外的一切事情，這還是第一次。報紙全然在馬克思的統制下。馬克思缺席，就由恩格斯代替。但就一般說，恩格斯的特別任務，是考察外國革命的進行，那是由他的語言天才決定的。

恩格斯有一種特別的本領。「他能在白天，在夜裏任何時間進行他的工作，不管是飽着還是餓着。他寫起文章來，筆調的暢達，常常是不可言喻的。」他能從外國報紙搜集材料，並極其敏捷地，加以評論，加以利用。這一點，常常叫馬克思驚服。馬克思對於一個題目，往往想一整天，還不能得出合理的結論。他不是一個天生的新聞記者，雖然他是一個天生的政治策略家。

報紙第一期出版時，立憲會議在佛蘭克福和柏林開幕了。幾乎每一個德國人都希望由他們的

討論，生出某一些奇蹟來。所以，當「新萊茵新聞」對新國會表示輕視時，它立即失去了股東的半數。其餘的半數，在它恭維巴黎無產者的六月革命時，也離開了。但財政的困難，不能使他們退縮。他們決定不支薪來支持報紙的發行。

報紙的外交政策，是由恩格斯負責的。這個政策的主要點是階級。所以他們的外交政策，和任何一個政黨的外交政策都不同。恩格斯對於事情的判斷，總是以現實為根據的，尤其是以經濟的現實為根據。他把「鐵一樣的現實」，看做是一切「道德範疇」的女主人。「新萊茵新聞」原希望德國的革命熱情傳播開來。但這件事是否可以做，要看新中央政權對於那些與德奧接界或一部分隸屬於德奧的各民族的志願，是抱什麼態度。從德國的歷史看，德國人總是做別國人的壓迫工具。法國人就在他們的敵人看來，也是值得同情的，但沒有誰會同情於德國人。他們如要獲得人家的同情，必須真正變革他們的性質，必須真正變革他們的國家才行。

但柏林，維也納，和佛朗克福都沒有意思要承認別一些民族的獨立。奧軍砲轟普拉格（Prague）時，恩格斯說道，日耳曼民族已經用流血的武力助成意大利的政治壓迫，現在他們又要在波希米亞實行同樣的舉動了。「新萊茵新聞」主張，西歐諸強國應結成一個同盟以與俄國戰。只有這樣的戰爭，能把日耳曼民族的兩個君主政治——普魯士和奧地利——破壞。恩格斯以為，奧

地利的瓦解，將由國內各民族的内爭；普魯士的瓦解，則由於人民與其專制統治者的分裂。」

最初，恩格斯相信二月革命會蔓延到英國，但結局證明他的希望不能實現。大憲章派是無力的。海軍大將威靈吞 (Wellington) 對工人領袖警告說，最簡單的軍事行動，可以把無論怎樣大的工人示威運動消滅。從此以後，他對於英國所寄與的希望，就很微了。英國政府決計袒護反動勢力，只要保持它的貿易獨佔權，恩格斯以爲除了俄國，歐洲革命的最強的敵人，就是「海中間這個不能搖動的反革命礁石了」。

但他還以爲，由於革命傳統的法國，會再度在歐洲取得領導權。六月間巴黎發生市街戰的消息，第一次傳來了。他以爲，這一次「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戰爭」，將成爲最後的階級戰爭。可是消息一天比一天壞，資產階級勝利，又成了確實的事情了。他起初還不承認無產階級已遭受致命打擊，但到一八四八年夏季，他已經不得不承認，運動的進行已經和他的期望相反。

十二 德國革命

柏林的羣衆一天一天變爲不能統制了。普魯士也覺得最好的方法是在內戰的紅旗尙未在德國揭起以前，先叫紅黨來一次過早的攻擊。同時，萊茵河兩岸也集中有大批軍隊。「新萊茵新聞」勸工人加強警惕性，不要從事散漫的無用的攻擊。恩格斯以爲，目下的一切，都要看國王是否把國民立憲會議解散而定。九月十三日科倫的民衆大會，一致通過了恩格斯提議的通告，要國會堅持不屈。沃爾夫提議，恩格斯附議，由大會通過，設立一個公安委員會，代表科倫地方未曾有立憲代表的人民。第二個星期日，萊茵河畔沃靈根地方的民衆大會，也贊成恩格斯提議的通告。這次大會，有許多人從科倫乘大帆船來參加，船上懸着紅旗，不是黑紅金旗。杜塞爾多夫的代表，也懸着紅旗。他們的領袖，是一個二十三歲的青年——拉塞爾（Lassalle）。恩格斯和拉塞爾是第一次會面。在大會裏，恩格是發言人之一；在他的鼓舞下，大會給了佛朗克爾國會一個請願書，

表示他們誠心爲德意志而反抗普魯士。運動天天在進展中。「新萊茵新聞」勸工人忍耐，等反革命勢力在柏林撕下假面具。但九月二十五日暴動畢竟在科倫發動了。

這天早晨，工人協會的主席夏培爾和貝克爾（Boeker）被捕了。下午在舊市場的大會內，摩爾（他和夏培爾，貝克爾是萊茵民主協會聯合會的中央執行委員）要求釋放他們。警察長正佈置把摩爾拘捕，並召集了軍隊。傍晚，摩爾在那裏發言時，忽謠傳軍隊們已經在開拔。街石擲起來了，但軍隊沒有出現，也沒有流血。砲台指揮官宣佈戒嚴了。集會被停止了。「新萊茵新聞」被處罰了。其編輯部人員，稍露頭角的，都被控告了。恩格斯不得不找隱蔽的地方。父親知道兒子居然叛逆，自然很是難過。他們間有一度痛苦的會見。母親力勸兒子謹慎，因爲這樣做下去，他和家庭的關係就要斷絕了。

恩格斯到布魯悉去了。比利時警察記着他以前的活動，把他當做流浪人，送到法國邊境去。十月十二日「新萊茵新聞」被准許復刊時，他已經在巴黎。他發覺，「新的巴黎和舊的巴黎之間有着世界上最可怕的鬥爭，一個血的海，一萬五千萬個死屍。」這個「死的巴黎」正準備復活波拿巴主義（Bonapartism）。他不能在巴黎再住下去。他必須遷一個地方，任何地方都行。他決定到瑞士去。「我沒有許多錢，所以決定步行。但我沒有走最近的，因爲法國實在太可愛了。」

他經過了法國東部的最美麗的縣區，賽恩河和洛亞河間的農民，以東道主的情誼，歡迎他。不過，他看到他們對於他們祖先由牧師貴族手裏得到的土地，抱有這樣強固的所有權觀念時，他寫道：「在法國，是和德國一樣，自耕農民還是在『文明之中過野蠻生活』」。他說，他們從來沒有瞭解那打他們頭上的風浪，有怎樣的性質，是怎樣起原的，是向什麼方向打去。他看到了，大拿破崙的姪子，一定會在十二月當選。德國的旅行告訴了他，法國的農民，是法國無產階級革命的最大障礙。

無而，當他浪遊這些地方的時候，溫底雲格勒茲 (Windsorgratz) 在維也納掀起了風浪，傑拉基 (Tallach) 正帶着克洛特人，開入那被蹂躪的都市。他知道，他宣誓效忠過的主張，已經達到決定時期了。十月底，他到了日內瓦。馬克思的信告訴他，在他出亡的時候，曾有人竭力想破壞他們的友誼。恩格斯的妹夫格里斯海因相信，只要馬克斯不理會他，他就會變得更馴良。但這一切都沒有發生效果。恩格斯也厭倦了散遊的生活。他要馬克思把外界的情形告訴他。他說，他不怕在一萬個法官面前對審，但「在獄的囚徒是不許吸菸的，所以我不願做囚徒。」爲要佔據他的精神，馬克思勸他在柏爾尼寫一篇論文反駁聯邦共和的主張，並討論匈牙利問題。這種性質的論文，有一篇，在一八四九年一月十三日發表了，這時他已經恢復編輯委員的位置；因

爲自九月以後，當局已經判定，警察關於他所提的報告，是言過其實了。

這時候，「新萊茵新聞」對於歐洲革命尙懷着重要的希望。一八四八年，馬克思已經預言了，「歐洲將會解放它自己；這個解放過程的諸步驟，是法國資產階級被推翻，法國無產階級勝利，一切國家的勞動階級解放。」恩格斯回來時，完全同意這個「預測」。但他以爲，匈牙利革命也有重大的影響。後來，提到葛蘇士（Kautz），他是批評得嚴厲的，但在那時，他還把匈牙利的這位獨裁者，稱爲「丹登和卡爾諾的合體」。他每天研究匈牙利革命戰爭的複雜情形。他對於軍事問題終生懷着的興趣，就是由這種研究喚起的。

但在一八四九年初，恩格斯還不希望匈牙利的革命再起。拉特茲基（Ratzecki）的勝利再爲奧帝征服意大利北部時，恩格斯寫道，法國不能坐視奧地利人佔領士林和熱諾亞。一次新的俄國革命，將會把匈牙利從威脅着他的俄國勢力下面救出來，並把全歐洲捲入。幾個月來，恩格斯的政治晴雨表，指示了兩個暴風中心地，一個是在法蘭西，一個是在匈牙利。這兩個暴風如果會匯合，那一定是在德國匯合。一旦德國捲入革命黨手裏，全歐洲的爆裂就不可免了。

德國資產階級熱烈希望德國的統一，會在佛朗克爾創立起來。各邦的反對，使他們的希望化爲泡影時，他們緊執着普魯士、奧地利、巴維利亞都不肯接受的帝國憲法。對於這一個擁戴威廉四

世爲皇帝的憲法，「新萊茵新聞」是只有輕視的。不過，對於一切足以加強革命，加強衝突，足以使輿論轉向急進主義的運動，報紙也認爲有支持的理由。

這時，普魯士軍隊的首腦，已採取廣泛的警戒，準備隨時粉碎萊茵兩岸的武裝暴動。普魯士的軍隊，幾乎有三分之一，調到這省來了。「新萊茵斯報」警告讀者們避免「組織的暴動」，並忠告科倫的工人不要做資產階級的傀儡。它忠告他們，要他們等候萊茵市議會的决定。爲了一些臨時的問題，這個市議會正在科倫召集一次特別大會。省內的騷動是一天比一天加強了。政府召集民兵，使資產階級不知所從時，騷動是達到了極點。五月五日，萊茵省的市議會通過一個決議案，表示在這情形下召集民兵，對於國家治安，是一件極危險的事，並且聲明，如果這個命令不撤回，普魯士現狀的維持就要受危險了。他們還向德國國會請願，要他們一致起來，決定支持人民的反抗。這個革命的文件，由萊茵省大約三十個市鎮的市議會通過了。代表上層中等階級的「科倫新聞」，也說「欺騙的反革命勢力」，應對那將要發生的流血事件，負全部責任，但同時懇求市民不要違法以圖洩憤。但入伍的兵士，怎樣能一面遵守法律一面又拒絕射擊的命令呢？

柏爾格·馬爾克工業區域內若干市鎮的民兵的態度，已經由冷淡變爲公開的暴動了。民兵的動員是叛變的最後衝動。但廣泛的失業和高漲的政治情緒，已經把路準備好了。五月九日易爾柏

的街石掘起來了。監獄有人滿之患。巴門雖還維持着和平，但倔強份子已經湧進易爾柏了。市政當局逃走了。市的行政權移交到一個公安委員會手裏。這個委員會是以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爲首腦的。恩格斯聽到他的故鄉正在發生暴動時，又聽到德勒斯登的暴動也在獨立進行中，布勒斯諾已經發生巷戰，巴勒丁納的革命運動正在增長，巴登的武裝暴動已經迫走大公，最後還聽到，匈牙利人正準備開入匈牙利。自一八四八年三月以來，情形算這時候最有希望了。

恩格斯一放下筆，加入易爾柏的叛變，就定下了一個鬪爭計劃。萊茵左岸必須支持右岸。小市鎮必須有動作。工業區域和農村區域都須有動作，以困擾守備隊。在要塞及駐軍的大市鎮，一切不必要的騷動應當避免。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必須集中在右岸，使革命的力量傳播開來。最後，並須利用民軍，組成一個革命軍隊。

但易爾柏的情形，和他的想像相差多遠啊！他不信，剛從泥坑中出來的無產者，可以立即成爲革命的主要柱石。但他看到的不快情形，委實使他失望。他受公安委員會的委任，被派到軍事委員會服務。這個軍事委員會負保衛市區的責任。他被派去觀察戰爭的準備和防禦工程的建築。由於他的建議，方·米爾巴哈(Von Mirbach)——普魯士總隊的退職軍官——被任爲總指揮。恩格斯初到時，公安委員會問他的宗旨何在。他答說，他是本地人，他能在易爾柏人民第一

次武裝暴動中佔得一個位置，是他的榮譽，他表示他的活動得限於軍事方面，而不預聞政治，他知道，在易爾柏，只有黑紅金旗下的暴動是可能的。不過，不管他怎樣表白，他加入的消息仍在資產階級當中引起普遍的驚懼。他們憂慮運動將爲「共產黨徒」所操縱；所以，這位青年革命家要求把表示願守中立的民團繳械，把他們的槍分給革命的工人，並要求一種強制課稅來填補工人的養家費時，公安委員會就得到了第一個機會，把他踢走了。五月十四日點名時，這位青年革命家被通知說，他的出席使市民不安，所以最好能自動辭職。同日，公安委員會佈告：「市民脾特烈·恩格斯，巴門人，最近住址科倫，過去有很好的勞績，但我們要求他今日離開市區，因爲他的出席，可能叫人誤解這個運動的性質。」第二天，米爾巴哈在各方壓迫之下，不得不在委員會的書面通知上副署。恩格斯回科倫了。武裝工人大爲憤怒。恩格斯在「新萊茵新聞」上勸告他們：「這個運動是另一個實在的運動的前導；要到那一個運動，工人的真正利益才成爲真正的目的，到那時，你們將再遇見我，到那時，世間再不會有什麼權力可以從你們旁邊把我推走了。」

在短短的幾日內，恩格斯和街石下的英雄住在一塊，一個星期日，他正在他的故鄉吳培達爾，那一天，他充滿着快樂的熱情，佩着革命的肩帶，正在指揮着哈斯佩勒橋上的砲兵，他父親從對面來了，「可敬的老恩格斯」和「叛逆的兒子」中間，有一次痛苦的遇見，其詳情我們不能知

道，但由以後數年間的信札看去，很明白，恩格斯許久還不能忘記他們父子間那時候的裂痕。

暴動終於壓平了，「新萊茵新聞」被封了，「新聞」的最後一期，用紅字印刷，恩格斯評述易爾柏的事情，對於那「無背骨的欺騙的布爾喬亞」，抱着深切的鄙視和遺憾，在那時，只有巴登和巴勒丁納還在爭持中。

恩格斯沒有在普魯士等候最後一期的出版。六月六日的拘票，證明他的出走，是得策的，他和馬克思一同到佛朗克福，希望德國國會能轉向革命，但不久他們看見了，在佛朗克福存這種希望，是等於在砂地從事耕作，國會先生們幾乎不知道，在這情勢下，保持守勢等於坐待滅亡，他們從沒有想到召集巴登和巴勒丁納的軍隊來拱衛，一點破釜沉舟的精神也沒有，他們倆希望到巴登去，但在那裏，他們又發覺指揮官毫無軍事知識，在巴勒丁納，他們發覺德國西南部的革命毫無力量可言，由巴勒丁納轉身時，他們曾在黑塞地方，以參加革命的嫌疑被捕，他們被解到達謨城，再由那裏解到佛朗克福，才被釋放，這時，他們決定了未來的計劃，馬克思持着民主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駐在巴勒丁納）的證件，到巴黎去了，恩格斯回到巴勒丁納，要從這個革命地點，注視德國的發展。

但只要他一開口，他就被人注意了。巴勒丁納的情形，也使他大失所望。幾乎沒有一個人相

信普魯士的隊伍會開來；每一個人都相信，如果普魯士的隊伍真正來了，也只要輕輕一擊，就可以打退。一切都過着牧歌式的生活。就連恩格斯也被解除了武裝，在一種快樂的安逸空氣中喝一鐘酒兩鐘酒，就算過了一天。

有一天，他從「科倫新聞」一張舊報紙，偶然獲得了一個驚人的消息：二十七個步兵大隊，九個砲兵中隊，九團騎兵，集中在薩爾布留根和克諾茲納克之間。當普魯士軍隊開到時，他不能不以「新萊茵新聞」駐軍記者的資格，去參加戰爭。他担任方·菲里齊(August Von Willich)的參謀。除了台克浩(Theodor)——巴勒丁納的參謀總長——在恩格斯眼裏，在一切退職的現在參加革命運動的普魯士砲隊軍官中，他是唯一有一點價值的人物了。他是一個「沈着的，冷靜的，聰明的，遠見的鬪爭者，但離開戰場，他却是一個討人厭的幻想家，一個「真社會主義派」。恩格斯在寫給馬克思夫人的信中，就是這樣批評他的。

恩格斯輔佐菲里齊，在穆爾格線上作戰。這一戰，是革命的最後的打擊。在退却中，他像在愉快的休假旅行中一樣，經過了黑林滿地鋪着花草的山崗。在沃爾法，他們憤怒地聽到革命政府已決計投降，不肯一戰。他們還想阻止這個決議的實行，所以決定把軍隊開到那裏去。到瓦爾德克齊，他們知道總部已經遷到丹諾新根了。菲里齊和恩格斯雖力主戰以圖挽回，但沒有效果。七

月十二日，菲里齊的隊伍，「巴登和巴勒丁納的最後一支隊伍」，就被迫離開德國國境了。

在瑞士，恩格斯遊歷了維維，洛桑，日內瓦，和柏爾尼。在日內瓦，他第一次遇見了他們的弟子李卜克內西（Wilhelm Liebknecht）。在維維，他能够和馬克思通信了，馬克思鼓勵他寫一個小冊子敘述巴登和巴勒丁納的革命。恩格斯立即着手了。他原打算以小冊子的形態，在瑞士把它發表。但八月底，馬克思告訴他，他已經被迫離開法國，現正動身前往倫敦，打算在倫敦創辦一個德文報紙時，他就決定把這個稿子，留到那個報紙發表了。

文體的優秀，範圍的廣博，觀察的正確，成了這個著作的特點。沒有別的記載這次立憲鬭爭的書，可以在這幾點上面和他抗肩。他指示了這次革命的主要份子是小資產階級。他現在知道了，小資產階級是沒有革命行動的力量。如果都市的無產者或一部分農民參加進去，小資產階級的最極端派會暫時和他們聯合。在巴登和巴勒丁納，就是這幾個階級，以大都市的無產者爲首，驅使小資產階級公然與現存的權威相抗。最初，上層市民和中層市民中比較有決心的份子，也參加進來，但情形一陷到無政府狀態即陷到有「發生決定鬭爭」可能的情形下時，他們就在恐怖中由戰場後退下來了。恩格斯以爲，自巴黎六月鬭爭事件以來，文明的歐洲只有兩條路可以選擇了。不是革命的無產者佔優勢，便是二月革命以前已經佔優勢的諸階級繼續佔着優勢。妥協已經

不可能了。尤其是在德國，上層資產階級已經表示他們沒有統治能力；所以，爲要確定他們的支配權，他們只得讓官僚和貴族再成爲他們自己的主人。在要求新憲法時，小資產階級正想用一種實際上不可能的妥協，來避免最後的鬭爭。他們的失敗使事態明朗。在未來，勝利者不是真正的革命，便是稍稍憲政化的封建主義官僚主義的君主政治。

在德國革命失望之後，匈牙利的革命也挫敗了。但馬克思來信說，法國已經起來反對波拿巴主義，英國的革命勢力在抬頭。馬克思要他立即跨海到倫敦去。他答應了。馬克思以爲他的朋友會由法國駐柏林的使館取得一張護照到倫敦來。恩格斯自己却以爲，走海道更爽快，也許還更安全。因此，他在熱諾亞上船，在海上過了五個星期。在他的文稿中，有一篇日記，記載太陽位置變化，風向，海岸狀況的，就是這時的記事。

十三 在倫敦

他和馬克思在一起了。自一八四九年秋至一八五〇年秋，他和馬克思一同負責任，創辦一個月刊：「新萊茵新聞政治經濟評論」。這個評論，公開反對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他們原希望，不久它就能在德國再以日報的姿態出現。這個希望永遠沒有實現。就是月刊，也沒有維持到一八五〇年以後。這是他們最後獨立創辦報紙的嘗試了。在那裏面，恩格斯發表了一篇論文，論述十小時勞動日的制度，還發表了「德國立憲鬭爭」和「德國農民戰爭」。後者，以後曾用書的形式單獨出版。他以爲，過去二年的事變，只是決戰的前哨戰。他相信，如果這種鬭爭由小資產階級去領導，那是一定會被破壞的，他看到了，一八四八年的商業恐慌；是二月和三月的革命的源泉；他推論，世界市場的狀態可以決定這一次破裂是在何時發生。馬克思是用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法國的階級鬭爭，恩格斯則用同時期德國的立憲鬭爭，來指示政治事件結局要由經濟原因

決定並限制。

反動的勢力再興了。同盟會不得不在德國再保守行動的祕密。總部的會員，幾乎全在倫敦會合了。他們決心要創立一個獨立的工人階級政黨。亨·鮑爾被派到德國境內去聯絡那邊存在的工人協會，農民協會，勞動者協會，和體育協會，想由此創立一個支部。一八五〇年三月，馬克思恩格斯共同起草了一個綱領，交給他作爲活動的基礎。

在這個綱領裏，他們叫德國的無產者注意，資產階級一奪得政權，就會利用這個政權，來驅逐他們以前的同盟——工人階級。爲要這樣做，他們會和那個被他們征服了的階級聯合起來，並在結局，被迫把統治權讓給他們。新革命迫近時，小資產階級會像一八四八年的自由派上層階級一樣，變做私通者。但和自由派相比較，民主派對於工人是更危險的份子。民主派不僅包括小工廠主，商人，手藝老板，並包括自耕農民，還暫時包括農村無產者。他們不願爲貧苦階級的利益而將全社會體系革命，不過要修正它，使它更與他們自己適合。他們只要求一個民主的憲法，而以表面的慈善救濟來麻醉工人。

民主派的政綱，不能滿足無產者的要求。小資產階級要迅速把革命結束，無產者却要使革命永久化，一直到政權歸到無產者手裏並由他們控制主要的生產力爲止。他們所要求的，不是分配

私有財產，而是廢止私有財產。他們不要把階級衝突弄得含糊，而是要除去階級衝突。他們的最後目的，不是現社會的改良，而是新社會的建立。

但目下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也在受壓迫。暫時間，他們一定會邀工人，請工人合作來成一個反對黨。但同盟會下的工人，必須創立一個獨立的組織，秘密的和公開的，與正式的民主黨相並立。在對抗反動的鬭爭中，這兩個政黨的利益會暫時統一，自然結成一個暫時的同盟。但勝利之後，工人必須立即反對資產階級的和平態度。他們必須要求保證；在必要時，還須索取保證——保證新的民主黨政府去實行種種讓步，和諾言。他們必須和正式的民主黨相並立，而樹立起他們自己的革命組織。這種組織，可採取市議會，工人俱樂部，勞工委員會等等形態。這樣，資產階級的民主黨政府將會覺得，他們已經失却工人的支持。這時，工人必須武裝起來，組織起來，必須立即採取步驟，使無產者全體能夠取得武裝。資產階級的民主黨政府一經確立起來，他們就會與工人立在對抗的地位。封建領主制度的廢除，將成爲衝突的第一個機會。小資產階級要把貴族的土地，當做自由保有地交給農民，從而在農村確認無產階級的繼續的存在；反之，工人的政黨必須要求，新被沒收的貴族土地應留爲國有，而由農業無產者以合作社的形式去經營，從而把大農業的各種利益保留下來。並且，民主黨要使德國成爲諸小國的聯邦，工人却要求建立一個

集權的統一的德意志共和國。工人在不能直接提出他們自己的要求時，必須強迫民主黨儘可能在許多點上干涉社會秩序，擾亂其平衡，從而迫得他們不得不向前走。一切可能的生產要素——運輸、工廠、鐵路等等——必須集中在國家手裏。總之，工人必須把一切民主黨所提議推到極端。如果小資產階級提議購買鐵路和工廠，工人就須要求把工廠和鐵路沒收，不給與賠償。

馬克思恩格斯把這個「反民主黨競爭計劃」送到德國時，他們還希望革命不久就會發生。但不久他們就認識了，革命的再爆發，不是最近可能的事。

大陸革命的失敗，使政治亡命家大羣湧到英國來。馬克思恩格斯領導下的「新萊茵新聞社」和德國工人教育協會，最先爲他們籌備一切。一個社會民主委員會組織了；恩格斯擔任該會的祕書。委員會在大風磨街租了一所房子，讓那些亡命客有膳宿的地方。但這一切人只有一個願望，那就是回故國去。但非里齊答允幫助他們回國時，馬克思恩格斯却斷言革命不會立即再爆發。內部的裂痕，成了不可避免的。一八五〇年九月同盟會總部在大會上公開發生破裂了。他們倆幾乎成了孤掌難鳴。他們提議總部遷往科倫。同盟會遂在倫敦有了兩派。較大的一派，由非里齊和夏培爾領導。他們不顧一切犧牲去從事動作。較小的一派則由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們的少數最親密的朋友組成。

在倫敦，馬克思恩格斯的意見，又和資產階級民主黨亡命客的意見相左。這些亡命客或從德國來，或從別一些國家來。他們信他們所欽信的事情，相信革命的日子不久，就會來到。他們對於他們自己的著作，給予誇大的估價。他們的意見，雖因民族特性和個人野心而分成許多派，但他們有一個共同的信念。他們全部相信民主主義的魔力。和這些亡命客結成一個聯合戰線的社會主義者不是沒有，但「宣言」的作者不能這樣想。他們拒絕參加他們的活動，因此，他們不被人理解，也不被人原諒。他們成了最不孚人望的了。「鄙陋的民主黨人」的怨恨，他們愉快地接受了。他們知道，他們明天的敵人就是民主黨。他們不但不不要溝通他們和這種民主黨間的裂痕，並且要把它強調起來。

在德國的政治亡命客中，沒有一個可以和意大利的瑪志尼 (Mazzini)，匈牙利的葛蘇士，法國的勒特魯·洛林 (Redru-Rollin) 或路易·布朗比較，但大學教員金克爾 (Gottfried Kinkel) 和魯格，自信可以和瑪志尼等人相比。對於前者，馬克思恩格斯會稱他爲「無害的人」；後者雖在青年黑格爾運動中和他們站在一起，但以後，他們之間是常常發生爭執的。菲里齊自以爲是德國需要的領袖，但恩格斯對於他的批評，是我們以上講過的。

他們又同樣不能和別一些國家的亡命客接近。他們更相信經濟因素的力量，更不相信人類的意

志。這一點，使得瑪志尼很高興。瑪志尼是一個行動家。他曾與魯格、勒特魯、洛林等人，創立歐洲中央執行委員會，其宗旨在謀一切國家的亡命客的合作。他是一個徹底的神祕論者。他希望由「神聖的行動」得到救濟。他特民族自決的信條。馬克思曾戲稱他爲「無任所的民主教會的教皇」。

瑪志尼的正直的本性，還使恩格斯覺得可敬；至於那令人作嘔的矯揉造作的葛蘇士，他對之，簡直是一點好感沒有。葛蘇士曾宣稱，在他的祖國內，社會主義不成問題。

法國亡命客的領袖是路易·布朗和勒特魯·洛林。馬克思曾戲稱路易·布朗爲「社會主義的拿破崙」，洛林雖得廣大的擁護，被決定要成爲共和國的總統，但他們對於他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也沒有一點欽佩的心思。在他們看來，在法國諸亡命客中，只有布朗基(Blanqui)的信徒是可以同情的。他們會和他的信徒們，加上哈爾內、菲里齊，計劃設立一個革命社會主義者世界聯盟，其宗旨是無產階級獨裁，推翻諸特權階級。

十四 在孟德斯德

同盟會在破裂以前，發生過一次政治辯論。反對派把黨看做是全然無力的，但他們表示，黨的力量就是「歷史必然性的力量」。同盟會終於破裂了。每一個人現在都和他們背道而馳了。現在，他們可以安靜下來，從事理論的研究了。

巴門方面，恩格斯的親屬，不斷關心他的前途。妹妹瑪利，得着父親的認可，母親的督促，給了他一封信。她說，全家人都認為危險，因為他已經有這樣一個長期間流亡在各種政治亡命客的會合地點。他說，爲他計，他甯可換一個地方。她還說：「我們都想到，你也許會願想暫在商業界圖一種確實的收入；只要你的黨有了成功的機會，你可以隨時告退，回去做你自己的工作。」腓特烈接到這封信後，就決定回去幹他舊時的商業生活了。爲要使他不易回去做革命工作，父親懇請他在加爾各答找一個位置。恩格斯甯願到紐約去，因爲馬克思可以同行。但根造化，這兩

個計劃都沒有實現。最後的決定是很簡單的。在孟徹斯德工廠內，恩格斯家族是沒有代表的；這個工廠一向就由歐門兄弟經營。這件事，對於家族的選擇很有影響。但記着一八五〇年九月的一個警察報告，卻斷定恩格斯所以出此，是因為無以為生的原故。像恩格斯這樣一個能寫文章的人，是不愁生計的。他願意回去經營卑污的營業，是爲了馬克思的緣故。在恩格斯看來，馬克思的偉大的天才，對於主義的前途，是非常重要的。他寧可犧牲自己，好使馬克思有專心去研究理論的可能。

一八五〇年十一月恩格斯回到孟徹斯德了。一到那裏，他立即寄來了一些營業報告，很得父親的贊許。父親對他的態度很快就改變了。一八五一年一月父親寫信給兒子說：「我猜想得到，留在孟徹斯德，是你極不願意的，但在現情形下，那對於我們的營業卻是一件再好不過的事。」二月，父親答應了他的要求，信上說：「你願意留在孟徹斯德的提議，很使我高興，這樣你是得其所了，你是我這方面的最好不過的代表。」自哈士佩勒橋上那次悲痛的會見以來，父子一直沒有會面。六月，他們再在孟徹斯德會面了。母親對於他們的會見，非常擔心。知道歐門要留她丈夫在孟徹斯德住一些時候，她就寫信給腓特烈說：「你們頂好不要整天在一起，因為你們不能整天做生意；你們的政見是這樣不同的，所以頂好不談政治問題。」他的憂慮證明了是不錯的。父親

對於祖國備極贊美時，被祖國視為叛逆的兒了，是極不高興的。在高度憤怒中，他寫信給馬克思說：「只要幾句話，就可以把他的嘴堵住。」但他說：「如果不是還有實際的問題，我真不願這種無謂的感情了。」

腓特烈願担任德國本店駐孟徹斯德的代表：因為這樣，他的薪水可以不靠英國工廠支付。只有這樣，他能用他的餘暇來從事真正的工作。這個目的是達到了。他告訴馬克思說：「大體說來，這一次和老人家會面的結果，是使我滿意的，他要我至少在這裏停留三年，但我沒有担任固定的職務，所以並不一定要三年。我的寫作，不受任何限制；我的行止，也不受任何拘束。他似乎沒有想到革命這一回事——現在一切都是這樣信賴的啊。他同意每年給我大約二百磅，作為代表費和招待費。」馬克思不久以前才失去他的幼兒。他把這個稱做「資產階級社會的貧困的犧牲。」馬克思夫人在答覆他的慰問信時，愉快地說腓特烈快要成一個「棉業大老板」了。她知道恩格斯是她們的最同情和最肯犧牲自己的朋友。她知道，只有他的幫助，她們最可以安心去接受，而不覺得困擾。

他離開生意場已經八年了。現在回去時，他也不知道會要忍受這樣大並且這樣長久的犧牲。他希望，下一次的經濟恐慌，將恢復他的自由；他還希望，恐慌不久就會發生。但在這個大製造

業都市內，他是一直住到一八六九年。整整十八年的光陰，違反本願地，被用在商業生活上了。不過，蘭克夏和那裏的煙囪，從他的生活的實在內容判斷，却證明了是恩格斯分析上最有價值的材料，那裏是自由貿易運動的中心，也是英國勞動階級政治鬥爭的中心。

在恩格斯離開孟徹斯德的期間內，大憲章運動發生了性質上的大變化。這時候，鄂康諾（O'Connor）的號召力漸就衰落了。更年輕的領袖，——哈爾內和瓊斯（Herat Jones）——已經起來。恩格斯和哈爾內的關係，自他初次到孟徹斯德以來，就很密切。鄂康諾正注意小資產階級的士地整理計劃時，恩格斯以為，哈爾內必須特別強調階級的衝突。瓊斯曾在德國受過教育，懂得德文，當然比別一些英國工人領袖，更容易瞭解馬克思恩格斯的理論。他也覺得，必須喚醒工人階級的意識。一八五二年大憲章派在孟徹斯德的會議中，提出了改組的計劃，拒絕與鄂布零（O'Brien）的民族改革聯盟合作，並確定以工人的階級意識為宣傳基礎。這種種，都使恩格斯異常興奮，所以恩格斯答應在瓊斯編輯的「告人民」內投稿。

不過，大憲章派的精神，畢竟不能有澈底的變革。各方的亡命客，都想與大憲章派拉交情。哈爾內領導下的報紙，常有與馬克思恩格斯反對的論文發表出來。那些亡命客召開的大會，也有哈爾內的蹤跡。無怪馬克思在給恩格斯的信內，會說哈爾內有兩個靈魂，一個是他自己的靈魂，

一個是恩格斯給他的靈魂，一個是自然的人，一個是短的緊身。

這時候，他們經營的「評論」停刊了。他們現今是處在極端孤立的情形下。恩格斯覺得，比較有效果的方法，是以「書籍」的形態宣傳。一八五一年二月他寫信給馬克思說：「如果你能夠寫一本經濟學著作來答覆這一切亡命客團體，他們將會怎樣說呢？」「現在，到底，真的到底，我們有別一個機會來表示我們不需要在任何一國有任何政黨來支持我們了。我們全然和這種胡鬧分離了。自現在起，我們只對我們自己負責了。時機到來，我們的朋友真是需要我們時，我們可以提出我們的主張。在這種時機到來以前，我們至少可以享受和平的心境——當然，也要忍受某程度的孤立。」他三十二歲的生日時，妹妹瑪利問他願望有什麼禮物時，他用頹廢的口吻答說：「妹啊，我已經有好些日子不存願望了，單是願望有什麼用處呢？實在說，我是沒有願望的才能的。我所存的願望，總是不能實現的。」

他看到他在孟徹斯德有好些年數要任時，就把書籍搬了來，像他自己說的，他就開始「苦讀」。他認識了軍事在未來革命中的重要，因此，請威特梅爾開了一個詳細的軍事學書目，他知道，「沒有系統的研究，不能獲得良好的結果。」他認真研究了法國革命時和拿破崙時代歷次戰爭的經過。除了軍事學，他還研究生理學，人種學，有時還學習語言——特別是俄文。

在孟徹斯德，他是和瑪利·白恩士同居的。一八五二年他父親再來訪問孟徹斯德時，要他担任事務所的總經理。對於這個職務，他每年可得一百磅薪水，最初四年可以得利潤百分之五，其次四年可以得利潤百分之七·五，再次四年中可以得利潤百分之十。

但他的收入，除了維持他自己和瑪利的家屬，還不能有充分的接濟，可以保障馬克思的生計。馬克思夫人雖然是一個有高貴品性和智力的人，但她出身在一個普魯士貴族的家庭，從不知道度量微薄的收入，來處理一切家務。所以一八五一年「紐約論壇」(其主編C·A·丹納)特約馬克思爲撰稿人時，馬克思當然不能拒絕。可是，這時候馬克思的英文寫作能力還不充分，所以他不能不賴恩格斯執筆，至少要由他的手譯成英文。我們要知道，幾年間，有許多用馬克思名字發表的文章，實際都是恩格斯寫的。紐約方面的編者，絕不知道孟徹斯德一位工業家是他們的刊物的撰稿人。

約定的稿子已經到交稿的日期了，馬克思因爲正沈潛於經濟學的研究，所以問恩格斯能不能替他寫一套論文，來論述德國的革命。一八五一年八月至一八五二年二月十日之間，恩格斯寫了一些連續性的論文，題名：「德國革命與反革命」，他死後，這些論文，才由考茨基編輯成書，用馬克思的名義出版。

這時候，威特曼和海因詹正在美國發起反對馬克思恩格斯的運動。後來，菲里齊也和這些人串通一氣了。所以威特曼能夠到美洲去代表他們時，他真是高興極了。恩格斯也想到美洲棉花栽培地探訪一次。但空前的繁榮繼續着；巴門方面覺得此行是無必要的。威特曼的用意是挺好的，但沒有獲得多大的效果。他創辦了一個刊物，名叫「革命」。但只兩個月就停刊了。改爲月刊的企圖也流產了。恩格斯雖保證與他合作，但他第一批寄出的稿，在途中遺失了。以後寄出的兩篇，却是到得太遲。其中一篇是討論法國人有侵入不列顛羣島的可能。自拿破崙三世政變以來，這是英國常常被人提起的一個題目。

恩格斯斷言，波拿巴族奪得政權的結果，戰爭的危險是增加了。他和他的同時人一樣，以爲還個新皇帝，正圖要一洗滑鐵盧之恥。他斷言，法國的進攻有暫時勝利的可能，但時間將成爲英國人的同盟。對於英國的勝利，恩格斯的種種理由，希望其成爲事實。英國雖然阻礙了一七九三和一八四八年大陸方面的革命，使其歸於失敗，但在他看來，英國一國的發展，比大陸全體國家的发展還包含着更多的革命要素。法國大革命已經在征服歐洲的夢想下擱淺了；英國卻正用蒸氣機使社會變革，正在征服世界市場，並且正在準備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決戰的戰場。在英國，大工業引起了舊制度的傾覆和社會的革命。足以使英國發生根本變革的，不是法國方面的政治騷

機，只是世界的經濟恐慌。如果英國被拿破崙的步兵征服了，結果一定會把資產階級和工業無產者間的鬭爭延遲。在英國，工業已經發展到成爲最高民族利益的程度。其他的人民階層，都繞在工業資產階級和工業無產階級二者周圍。所以，如果世界上真有一個國家，其工業技術發展的程度，已經有完全的社會革命，那就是英國。他斷言了英國的自由主義，在國防脆弱的情形下，一定會把幻想的和平主義粉碎。科布登和布萊特雖然是自由主義的和平團體的會員，但一入閣，他們就會贊成一個持久戰，甚至與全歐洲大陸相週旋。

他打算寄給威特梅爾的別一篇論文，也留有底稿，內容是討論維素自由黨內閣選舉權推廣的提議。

一八五一年縫工那茲金 (Nothung) —— 同盟會的秘密工作人員 —— 在萊比錫被捕了。由他那破獲的文件，暴露了總部設在倫敦的消息。一八五〇年的「反民主主義鬭爭計劃」，也被搜得了一份。當局把這個文件在報紙上發表了。恩格斯認爲，這是一樣最有益於他們的宣傳。自這個案件發生以來，恩格斯就以最密切的注意，注視其經過。他還把律師需用的許多文件，夾在商業信件裏面，秘密送回德國去；他寫了許多信，投到英國的報館去，有時，這種信件也會發表出來。信中說，在德國，出版是不自由的，所以德國內部發生的違法事件，不公道事件，英國報紙

有把名儘量發表的義務。

• 恩格斯傳 • 八四

但無論怎樣辯護，那些被捕的人還是被判決有罪。馬克思立即寫了一篇「審判案真相」，並且不待恩格斯的同意，就把同盟會宣告解散了。宣告解散的理由是：（一）自總部搜捕以來，大陸方面的聯絡已經斷絕；（二）這樣的宣傳機關，和政變後的情形已經不適合。

恩格斯說，這就是德國工人運動第一個時期的結束。從此以後，他不受任何拘束了。他營業的餘暇，可以全部用在研究上了。他知道，只有這樣做，他方才能够對他終生從事的事業，發生最大的效果。

十五 軍事研究家

近東的爭霸戰，在這時開始了。恩格斯以爲，東方已經是一個曠坑，其爆裂將會把一切的障礙掃除。所以，競爭尖銳化時，他對於當中包含着的地理問題、人種問題、經濟問題、政治問題、和軍事問題，進行了一種詳盡的研究。他替馬克思寫了許多關於時事問題的文章，先是投在「紐約論壇」，後是投在布勒斯勞的「新阿特爾新聞」。他用一種綜合的方法，研究了國際政治，軍事策略，和商業政策。這些論文，直到近年，才被入選集起來。由這些論文，我們才明白，恩格斯不愧稱爲十九世紀後半期最有創見的思想家了。

他注意了巴爾幹的斯拉夫民族問題，他注意了土耳其問題。這些問題，在當時，籠罩着全歐洲。一八五三年十一月，土耳其對俄羅斯宣戰了。兩個月後，英法的艦隊，駛入黑海的波士福魯斯。歐戰已經不可避免了。克里米戰爭發生了。

戰爭爆發時，恩格斯會有意放棄營業生活，靠他的軍事與知識來維持生活。馬克思要替他在自由黨的「每日新聞」，找到一個固定的位置，似乎是可能的。他的第一篇論文，「論克隆斯達的設防」雖然付印了，但談判終沒有成功。「泰晤士報」也拒絕發表他的論文「拿破崙一個砲兵隊長」。這樣，他只有替馬克思寫一些文章投到「紐約論壇」了。不過，這些論文，在美國，卻會引起深切的注意。主編者丹納寫信給馬克思說，許多讀者認這些論文是斯考茲將軍（一八五三年總統候選人）寫的。一八五九年他的小冊子「波與萊茵」也在德國被認為是普魯士某將軍的著作。

在戰爭爆發時，他預料普奧將加入戰爭。但這個預料，沒有實現。這件事，使大陸的戰爭不能發生。奧地利的動員，更使俄國必須保留巨大的人數不能開上前線。生產技術決定了勝敗。因為，在恩格斯看來，這次戰爭是一個採用古生產技術的國家和幾個採用現代生產技術的國家作戰。

恩格斯對於泛斯拉夫主義沒有好感，因為這個運動是以俄羅斯為主動的。「紐約論壇」在古洛夫斯基伯爵（Count Adam Gurovski）的影響下發出袒護泛斯拉夫主義的論調時，恩格斯就在一八五三年九月表示願意接受這種挑戰。古洛夫斯基的論據是，俄美是兩個新國家，有共同的

需要，使他們和西歐諸國相異。他們都有廣闊的領土和巨大的人口，使他們要儘可能去發展他們自己的產業。爲這個目的，他們必須建立關稅壁壘，解放奴隸和農奴。土耳其，奴隸制度依然盛行的土耳其，已經沒有繼續存在的機會了。就天然的情形說，俄國已經是一個民主主義國家，土耳其如要發展它的工商業，頂好是受俄國支配。

一八五五年春，恩格斯第一篇反對泛斯拉夫主義的文章，在「紐約論壇」上刊出了，但包含頗大的刪削。以後各篇，根本就沒有刊出。所以，他的意見應該由一個小冊子——「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的斷片去推尋。他以爲俄國的未來是在亞洲。

馬克思看見他的朋友能够這樣敏捷地把思想發表出來，同時並有這樣驚人的淵博的記憶，是不勝佩服的。不過，佩服之中，也含有感激。自一八五一年至一八五九年恩格斯寫的東西，都是用本人的名字發表的。他的唯一目的，是使馬克思能够在世界第一個大市場的無情的街道上，維持他的一家，並且能够繼續研究，把他的思想成熟。

一八五三年夏，老恩格斯再訪問孟徹斯德。支店的情形，使老恩格斯非常滿意。恩格斯的收入是增加了。但他的增加的收入，還不夠應付各方的需要。爲了他的朋友的緣故，他會把一個更好的房子退掉，搬一個租金更便宜的地方。馬克思會說他不願成爲單純的賺錢工具，但他的這個

願望能够實現，是不能不感激他的朋友的。

不過，恩格斯的幫助，決不只是物質上的，馬克思的成就，其實是他們兩個人共同努力的收穫。並且，恩格斯的鼓勵，也是馬克思能够不顧一切而進行理論研究的一個刺激。一八五五年春，馬克思失去了他的唯一的非常心愛的男孩。他寫信給恩格斯說：「近來我心裏真是煩悶。在這種煩悶中，我只要想到你的友誼，只要想到我們還有真正的工作要我們一同去做，我就把愁悶抑制下來了。」馬克思是一個硬性的人，他的敵人常把他描寫成一個「無情漢」。實在的，馬克思只在他自己或他所愛的朋友受到真正的不幸時，才會流露真正的感情。

恩格斯是一個長而瘦，健康但不十分結實的人。他常常騎馬、游泳、擊劍，做戶外運動，來使他的身體結實。他是很少生病的。他病了，也不完全依賴醫生，他會嘗試去發現適當的治療方法。一八五七年夏，他患了毒腺，跟着又發生了再發症和併發症。他讀了許多醫書。起初，他不肯停止工作；馬克思堅要他休息。最後，他不得不聽勸告，到海邊休息了幾個月。先是在利物浦附近的威特島，後遷至傑塞。馬克思的信說他的病像他自己的病一樣擾亂着他的心情。他在大英博物館，對於醫學，從事了一番熱心的研究，把結果告訴恩格斯。恩格斯覆信中關於魚肝油和碘的衛生價值，發揮了一個很長的議論。

在他未患病以前，丹納曾在二一八五七年春，要求恩格斯担任一部新百科全書的撰稿人。恩格斯和馬克思相商，由馬克思寫德國哲學，近代英法二國政治家的傳記，大憲章主義，共產主義，社會主義，亞里士多德，伊壁鳩魯，拿破倫法典，及若干財政問題。恩格斯自己寫日耳曼語，古德語，中世德語，羅曼斯語。但美國方面的編者，不要恩格斯寫這些東西，却要他寫軍事問題。恩格斯在大英博物館搜集了許多材料，恩格斯憑這些材料和一本有名的軍事學教科書，寫了許多這一類的題目。

但他們的工作中斷了，這不僅因為恩格斯生了病，並且因為發生了世界性的經濟恐慌。

恩格斯在「經濟學批評綱要」中已經說過，引起恐慌的競爭法則，不是一個哲學原理，而是一個自然法則，那時他已經斷言，恐慌會在五年至七年的期間內發生一次，每次都會比前次更普遍，更有麻木力。「宣言」上說，資產階級用來抵制恐慌的各種策略，只會引起更大的更普遍的恐慌——這個斷言，不過是「批判綱要」已經表示的觀念的推廣。一八五〇年他第一次提出了這樣的假設：生產手段的巨量增加，將會引起接二連三的恐慌，僅由短期間局部的復興隔開來。他在哈爾內主編的「民主週刊」內說道：不過因為有新的市場開放出來，因為生產成本的減低，使人們對於舊市場可以實行進一步的剝削，逆境才幸而被抵消下來。但他說，這是有限制的。現在

已經沒有新市場可以開放了。但在新市場沒有實現的可能時，資本家的生產仍不斷增加。恐慌成了必然的，由恐慌帶來的社會革命，也是必然的。

恩格斯回來做生意時，他原期待着，下一次的恐慌將會在來年發生。一八五二年二月底，恐慌還未發生。他以為，原因是荷蘭諸殖民地的開放，各國關稅的減低，棉花價格的下跌。他告訴馬克思說，東印度的市場有異常的伸縮力，加里福尼亞和奧大利亞導來了新的擾亂因素，大多數原生產物和工業生產物都便宜。但他還是抱着希望。到十一月底，他的希望才完全冷了。一八五三年四月，他在寫給威特梅爾的一封信裏，會說到已有許多引火的資料貯藏着，可以燃燒起下一次歐洲的革命。『歐洲是充分地準備好了，那只需要一次恐慌來引火。』但恐慌沒有發生。克里米戰爭也沒有影響普遍的繁榮。自一八五三年秋到一八五六年春，他寫給馬克思的信，沒有再提到恐慌的發生了。

一八五七年，他這樣急迫等着的事情，真的發生了。就在這年的下半年，第一次真正的世界恐慌，把過去十年間以空前速率擴大世界生產力的經濟體系的基礎搖動了。一八五六年九月德國的過度投機，使資本驚人地覺得短少，恩格斯正確地斷言了，這只是暴風雨的預兆，當大破局發生時，他寫信給馬克思說：『歐洲產業的全部會被破壞，一切的市場會被壅塞，資產階級會被掃

入全部破產，可怕的戰爭和完全的混擾。」美國的每一個交易所也都發生了恐慌。英國出人意料的被襲擊了。在美國的高銀行率開始吸引英國貨幣以前，一點警報的現象也沒有。但這種吸引的結果，是在十月下半月，物價慘跌。這種現象發生時，恩格斯還在傑塞養病。事務所接二連三的信，要他立即銷假。他回店的時候，正好看見金融恐慌的現象。好幾家蘇格蘭銀行倒閉了。十一月五日他開始把恐慌的消息，常川地報告馬克思。風潮接二連三地來。大陸發生一次小破局後，美國就發生了金融恐慌。東印度也有了恐慌的預兆。但商人恩格斯越是看見交易所的恐慌，越是覺得高興。有一次他寫信給馬克思說：「人們看見我突如其來地覺得高興，都氣得要死。」他還說，就是靠恐慌恢復他病後的元氣。

恐慌的最初一擊，就把庇爾（Pier）的銀行法停止了。對於恐慌的驚人的發展，恩格斯抱着很大的確信。他以為，英格蘭銀行也會被捲入。他現在以絕對的確實性，來預料革命了。但他希望無產者的攻擊將只由慢性的困蔽引起來。他說：「經過這樣的困蔽之後，無產者將能實行更有力的攻擊，將會有更大的統一和更大的協力。好比一個騎兵隊的攻擊，如果馬在跑到可以受到敵人攻擊的距離內以前，能急跳五百碼，攻勢的執行一定會更巧妙得多。」他還說：「在全歐洲未被放在鐵砧上以前，我不要事情發生得太早——如果太早了，鬭爭的工作將會成爲更艱苦的，更

討厭的，更拖沓的。」這時，他的興致好到了極點。十二月，他寫信給馬克思說：「上星期六，我出去打獵，在馬鞍上足有七小時。事態使我在這幾天內異常興奮。」還說：「在一八四八年，我們說過，我們的時間正在後來。就某一種意義說，那是確實來了。但這一回才是充分地來到。這是一個生死存亡的鬭爭，我的軍事研究，立即就會變成實際的了。我正在研究普魯士、奧地利、巴維利亞和法蘭西諸國軍隊的戰略和組織；除此以外，我就練習騎馬打獵，因為打獵是真正的騎兵學校。」他們兩個互相表示愉快。馬克思說，他雖在不斷的貧困中，但自一八四九年以來，要算這時候他最快樂。恩格斯說，他對這一次總崩潰，感覺到一種「可怕的信任心」。馬克思夜以繼日，從事經濟學研究；他希望在洪水發生以前，先把一般的程序弄清楚。恩格斯儘量搜集與恐慌有關的材料，儘量把各種不祥的消息通知他。

但恐慌到十二月底就漸漸平靜下去了。以前，銀行率是迅速向上漲，現在又同樣迅速地往下落了。「慢性的恐慌」並沒有引起革命。過剩的生產物被吸收了。對於這種奇蹟，他用印度和中國的大量輸入來說明。馬克思的說明是自加里福尼亞和澳大利亞被開為殖民地，中國和日本的門戶開放以來，世界市場和以世界市場為基礎的生產就終於實現了，資產階級的歷史使命就完成了。在歐洲，把有色人種當作重要因素的看法，這要算是第一次。中國問題開始被當作世界問題的一

環來考察了。

恐慌平息以後，馬克思忙着寫他的經濟學批判，並且要恩格斯不斷供給經濟生活的現實事實。一八五八年他把第一輯的大綱送給他看。可惜，恩格斯對於這個計劃的細密的批判沒有留下來。

在德國境內，已經沒有一個政黨和團體與他們有關係了。能够不受警察干涉和他們通信的，在德國境內，幾乎只有一個人，那就是浮第南·拉塞爾，在革命期間，他已經從杜塞爾多夫投稿到「新萊茵新聞」。他對於馬克思的尊敬心，漸漸增長成爲友誼。恩格斯很看重拉塞爾的才具，但拉塞爾的性格，很使他不高興。但這種一向就有的心理，到一八五六年他才明白地對馬克思說出來。那時，馬克思有一位熟朋友從杜塞爾多夫來，說拉塞爾已經離開工人的政黨，向自由黨獻媚了。自此以後，他對於這位「從斯拉夫族邊境來的猶太人」，就沒有一點好感了。馬克思也常常把拉塞爾叫做「伊克男爵」或「愛夫萊謨·古特先生」。拉塞爾用一種不慎重的過分的自大大，常常在他給馬克思的信裏，自命爲勞動階級的領袖。他再沒有想到，他信上的每一個字，都會在孟徹德和倫敦，被秤量，被恥笑。一八五九年他和他們的關係似乎有了轉機。他替馬克思的經濟學著作，找到了一個出版家。恩格斯一個小冊子——「論法國將在北部意大利實行對奧地利攻擊的危險」——也由他介紹出版了。

但當這種攻擊真正爆發時，恩格斯馬克思就覺得，他們必須真正反對拉塞爾。拉塞爾要普魯士利用奧地利的困難，來加強普魯士對於德意志北部諸邦的宗主權，因為在他看來，奧地利是歐洲民主主義最危險的敵人。恩格斯却以為，真正的敵人是帝俄。他認為，法俄間已有秘密軍事條約；這個條約，當普魯士援助奧地利來和法國對抗時，即將付諸實施。奧地利人在北部意大利的統治權，他是厭惡的；但把奧地利人在朗巴第擁有的戰略地位割讓給拿破崙三世，他却是反對。他擔憂德國將被壓迫在兩個戰線上作戰，即同時與法俄為敵。他說，在這樣的危機中，現在的政權必定會顛覆。這樣，就只有最堅定的政黨，可以把民族救出了。

關於這一年的政治軍事情形，恩格斯寫了兩個小冊子。一個是「波與萊茵」，討論戰爭爆發後的情形，別一個是「薩威·尼塞與萊茵」，討論維拉·法蘭加會議以後的情形，此外，他還在「紐約論壇」研究一八五九年戰爭的經過。有一個名叫「民衆」的在倫敦出版的小型德文報紙，也是他發表言論的地方。

「波與萊茵」一書關於戰略所發的言論，是特別值得注意的，因為那已經驚人地由世界大戰證實了。恩格斯要說明，因為法國已經在巴黎設防了，已經可以不必在萊茵河要求軍事根據地。法國與比利時接壤的一線，是弱得可憐。比利時當然是中立的，但歷史說明了，在戰時，中立

條約「不過是一張廢紙」。他說：「比利時，由凡爾登和瑪恩河上游，到萊茵河，繞着整個法國的東部。假道比利時來的軍隊，可以在駐在凡爾登或夏猛和駐在萊茵河之間的軍隊開到以前，把巴黎攻下。如其攻勢順利進行，侵入的軍隊，很可以在巴黎和萊茵河上或莫塞河上的法國駐軍之間，挺進一個尖。」法國必須要在比利時境內，以巴黎及其要塞爲根據，實行一個攻勢。「如果這個攻勢受了挫折，軍隊就須在阿伊塞·愛尼線上，尋覓最後的據點了。這樣，敵人雖要再進，也無益處。因爲，由比利時來的敵軍，如果單獨向巴黎進攻，力量必嫌太薄。在愛尼河後面，（以其與巴黎的交通不致隔斷），或至少在瑪恩河後面以巴黎爲左翼，法國北部的軍隊，還能夠實行一個攻勢，並等候別些隊伍的趕到。」恩格在六十年前預料了瑪恩河的奇蹟。

在第二個小冊子裏，他憂慮拿破崙取得馬根達和梭爾弗梭納的灰色榮譽之後，也許會藉俄國之助，圖在萊茵河上覓取新的榮譽。俄國爲要打敗奧國，也正需要這樣一種同盟。法國皇帝爲要保持皇位，只有出於戰爭一途，但戰爭所必要的同盟，只有到俄國去找。俄國也許會把萊茵左岸當作禮物送給法國。在恩格斯看來，沙皇制度是歐洲自由和革命勝利的最危險的敵人。不過，這時候，亞力山大二世正在考慮把農奴制度廢止。馬克思恩格斯覺得，「俄國的內政正在開始」，一八五八年秋貴族召集會議時，他們相信，這正是「革命已經在俄國開始」的記號。農民暴動和

貴族立憲運動的力量增加時，馬克思斷言了，『在下一大革命中，俄國將會仁慈地，與叛黨攜手』。恩格斯在這第二個小冊子裏，說明了相同的結論。他說：『俄羅斯外交政策的全體系，將由這一種鬭爭被傾覆；這種鬭爭，已經在俄羅斯，統治階級和被壓迫農民之間爆發了。這種外交政策，在俄國沒有內政史的時期，才是可能的。這個時期，現在已經過去了。政府和貴族所獎勵的農工發展，已經達到這樣的程度，現在的社會制度已經成爲不可能了。從一方面說，它是必須廢除的；但從另一方面說，沒有激烈的變化，它的廢除又是不可可能的。』在此以前，恩格斯從不相信俄國將會發生革命；從此以後，這樣一次革命，就在他的政治計算中，成爲一個確定的因素了。

十六 工廠主

一八五九年仲夏，恩格斯的父親再來訪問孟徹斯德。腓特烈陪着他的父母，在蘇格蘭度了一個九月。這是他和父親最後的一次會面。一八六〇年三月，父親去世的消息傳來了。大赦准他回德國來——自革命以來，他還是第一次回德國。他的諸弟以爲沒有疑問，德國的工廠應由他們繼承。腓特烈應只得孟徹斯德的支店。他們不會想到，他雖住在海外，仍不妨爲德國營業的股東。但依照英國的法律，商店主的繼承人，不能因父親死亡，而當然取得股東權。諸弟的態度，頗使腓特烈傷心。爲避免洩氣起見，他於是在合同上簽下字。他寫給母親的信上說：「我可以受任何犧牲，不願再叫你爲這件事操心。我不想再和諸弟爭執了，如果他們不強使我，我也再不要提起這件事來和他們爭執。一切都過去了，我不再提我吃了虧，他們佔了便宜的話了。」母親的回信沒有留下來。二星期後，腓特烈又有一信担保他不再懷宿嫌。「我可以得到一百種別的營業，

但永不能得到第二個母親。」

諸弟表示他們願在孟徹斯德留下一萬鎊。這樣，恩格斯在淨利中可以得到的百分比，是比以前更大了。他還由父親繼承了一些現錢。一八六四年他取得了股東的資格，但這一切不過堅定了他的決心。只要資本的利息够維持他自己和馬克思的一家，他就要把商業生活放棄了。

一八五〇年恩格斯已經預測，黑奴未來的廢止，將破壞美國現行的生產制度。南北美破裂，內戰開始，經過四年的鬭爭，反奴隸制度派終於獲勝時，他是極興奮的。美國人的「轉變世界的意義」，他原來就極重視。現在，他的政治興趣和軍事興趣，是全然寄在美國了。但戰爭影響了棉花市場，所以由營業的觀點，他也不得不對這個問題注意。

美國的迅速發展，對於英國的世界獨佔，早已成爲一種威脅。而南部諸州的生產的原料，又是英國幾種最重要的產業部門所必要的，所以，英國人看見那需要關稅壁壘的北部諸州擁有優越的海軍力，將對南部諸州的海港實行封鎖，從而間接停止蘭開夏的織機的生產時，是很憂慮的。爲英國的利益計，好像北美合衆國的破裂，最好是繼續下去。所以，英國立即承認了南部聯邦的交戰國權利。財政大臣格萊斯登(Gladstone)一八六二年十月公開演說，稱南部諸州的勝利是有把握的，南部已經不只是一個新的邦，並且已經是一個新的國家了。不過，以自由主義自稱的英

國公開護護奴隸制度，是不體面的。所以，英國的報紙故意把戰爭的目的隱蔽起來。他們說，北部諸州爲要取得鑛權，正竭力要用武力來統一南部諸州，南部諸州當然有權拒絕他們。倫敦，孟徹斯德和席費爾德的工人大示威運動，在一八六二年底，宣言反對要國對北部諸州宣戰。那時，戰爭已迫在眉睫；英國的造船廠，支持南部諸州的武裝民船；北部諸州爲報復計，曾在英國郵船上，捕去南部諸州的幾個外交代表。

自一八五九年意大利戰爭至一八六一年南北美戰爭間，恩格斯寫了許多軍事論文。他論述了步砲兵軍器一般的改良，德意志諸邦的軍事改革，英國侵略中國的戰爭，加利波底征服西西里的戰爭，法國侵入英國的可能性，不列顛羣島的防衛等等。他用一個外籍軍官的假名，寫了一篇文字，論述南北美戰爭的爆發，但沒有在「紐約論壇」上印出來。這些論文，分別發表在兩個專門的軍事學雜誌上——達謨城的「一般軍事新聞」和蘭開夏哲夏的「志願兵月刊」。後來，這些論文的一部分，會由他自己編成一個小冊子，在一八六一年，用「告志願兵」這個題名出版。

在南北美戰爭中，恩格斯希望，在人力物力上佔着優勢的的北部民主主義，會在戰爭的繼續中，日益取得優勢，而終於得到勝利。但北部臨時召集的軍隊和無經驗的指揮官，却是吃一次敗戰之後又吃一次敗戰。在歐洲，可資以判斷戰事的資料是不易獲得的，海底電線傳來的消息，還

極其有限。美國的報紙和歐洲報紙通信員的報告，有幾個星期沒有來了，即使來了，也不够解答一個軍事專家所要問的問題。關於主要的戰場，沒有一個適當的地圖。而這一次戰爭的性質，和恩格斯曾經看見過或研究過的任何一次戰爭比較，都大不相同。這是「軍事史上一幕空前的戲劇」，因為決戰的而積是這樣大，軍事行動的範圍是這樣大，對敵兩方的人數是這樣大，開支是這樣大，戰略和指揮是這樣特別。在戰略上使用鐵道和鐵甲船，這是第一次。起初兩方都沒有十分有訓練的軍隊，但北部的情形更差，因為大多數有訓練的軍官都屬於南部。

北部諸州屢戰屢敗的事實，頗使恩格斯不安，但尤使他不安的，是北部諸州似乎不要用「革命的力量」，去追求他們的目標。他們的口號是「戰到用小刀來血戰」。這純然是一個空虛的誇大。他不得不承認，論軍事才能，李要比麥克列倫強一着。恩格斯很擔心，北部諸州維持一個軍隊，不過爲要在和平談判中，示一示威。他用北部的鬆懈性和南部的緊張性相對比。馬克思看到，這樣一次應該用革命手段來執行的戰爭，北部諸州居然想用法的手段去執行，是嚴厲加以批評的。但他屢次提醒恩格斯叫他不要爲片面軍事方面的注意所蒙蔽。他說：「西北部諸州和新英格蘭，願意並且會強迫政府不再以外交武器來執行戰爭。……如果林肯不聽（他一定會聽的），那就會起革命。」林肯是聽從了。一八六三年元旦日，他爲一切黑種人擔保了自由，這才

是真正的革命行動。

幾個月後，他認識了，過早的和平是不致於發生了。北部諸州已經準備大規模的軍備了。但直到格蘭特將軍漸露頭角，他的疑懼才全然消釋。一八六五年春，李卒爲北部的軍隊所包圍，其軍隊全被俘了。

戰爭經歷了一個這樣長的期間，以致英國的棉工業覺得原料短少，生產不得不加限制，甚至停工；工人被解僱了，仍然被僱的工人，也切感貧困的痛苦。恩格斯在事務所內逐日注意棉饑的進行。對於這種棉饑的情形，「資本論」裏留下了一個完美的說明。材料大都是恩格斯供給的。但他太忙了，他對於這次恐慌，只留下了少許的說明。他已經不像一八五七年那樣樂觀了。這一次恐慌不是由生產過剩引起的；但對於生產過剩所引起的恐慌，他現在的看法也要持比較慎重的態度了。一八六四年十一月棉饑的危境過去時，他寫信給馬克思說，「在今日，這一類的事情，是不易到頭的。」馬克思回信說，現在，恐慌的強烈性還嫌不夠，但它的頻繁性可以把這個缺陷彌補起來。

一八五七年一個小額的遺產，使馬克思可以購買一個小房子，並把它佈置起來。但正是那時候，經濟恐慌使美國的出版市場大爲減色。恩格斯總以爲，他的朋友的情況，在各方面，都正在

走向「光輝之路」。所以，一八五六年聖誕節，他向父親要了一匹馬，作為禮物。他知道馬克思的情形又這樣困難時，看見這個禮物，他是極煩躁的，他竭力幫助他，但總不能使他脫離苦境，馬克思不高興常常去「揀取」恩格斯，但每次他說到這點，恩格斯總是答說，他希望能够多有一點東西「可以榨出來」。一八六一年二月「紐約論壇」裁減歐洲通信員，並停止百科全書的出版計劃時，馬克思的家庭情況又特別感到恐慌。他決心要對於自己的困苦，謀一個根本的救濟。他回到他的故鄉屈里爾去看他母親，到荷蘭去看他叔叔，還決定到柏林走一趟，因為不久以前，拉塞爾曾來信要他幫忙發行一個刊物。在柏林，他和拉塞爾住在一道，但避免為直接的決定；他說，沒有恩格斯在面前，任何決定都不能夠做；他主張，恩格斯必須擔任編輯。但恩格斯拒絕了。他不願在這種時候，丟棄自己的獨立地位，到柏林去依賴拉塞爾。馬克思也就以此為藉口，謝絕了他的請求。

回倫敦以後，他的日常的家用，還是不能不依賴「孟徹斯德的供給」。十二月，他所負的債務又達一百鎊了，他不願向朋友訴苦，所以暫時他沒有把實在的情形告訴恩格斯。但結局他不得不說：「你爲我盡內努力，已經大到叫你負擔不起的地步，所以，我真不願意老是在你跟前報告這種悶人的消息。」六個月後，他又不得不寫道：「我現在又要向你訴苦，真是叫人痛心，但是

有什麼辦法呢？每天，她總在我面前表示她憤爾帶着兒女去死。我真不能責備她，因為我們在這情形下受到的屈辱、苦痛、和恐懼，真是不能用筆墨來形容。」恩格斯聽到他這樣的話，是極痛苦的。他說：「誰搾誰，實在是不關重要的事。」他想由此安慰他。但馬克思答說：「先生哪，你要說什麼就說什麼罷！但我只要想到我的窮苦是這樣累你，心裏就覺得難過。我幾時能够找到一個職業啊！」一八六二年九月他實際也會向鐵路公司請求一個職員位置。他的要求沒有成功，因為他的字寫得太差了。

一八六二年夏，拉塞爾到倫敦來。他以為，馬克思前次的過訪，已經完全恢復他們舊時的友誼。這一回，恩格斯沒有和他會面。馬克思和拉塞爾的關係，也在這次最後決定了。拉塞爾表示他想再開始德國工人階級的運動，而以自己為運動的領袖，並以舊憲章派的普選權為主要政綱時，馬克思就以背向他了。他充分認識了，無論在原則上，在策略上，在目標上，他和他都無相同之處，馬克思已經把階級鬥爭說這樣一種酸液，注入國家這個概念中了，拉塞爾却還尊重國家，想用民主國這一個概念來招搖。他們看見拉塞爾反對那正在與俾斯麥鬥爭的自由主義派，是大不謂然的。但他們還不知道，拉塞爾已經和俾斯麥訂立了同盟。所以，對於拉塞爾的運動，他們暫時沒有表示任何意見。

在拉塞爾離倫敦之前，馬克思由恩格斯担保，向拉塞爾借了一筆錢。但不到年底，他家庭的一切動產，又都進了當舖。店老板擠來討帳，小孩子停學了，因為繳不出學費。馬克思感覺到，這一回真是沒有辦法了。正當他要寫信給他朋友時，一個意外的消息突然來了。他接到了瑪利·白恩士逝世的報告。二十年來，她是恩格斯的忠實伴侶；他在城市內做過討厭的工作之後，就和她在一起休息，並集中力量，來做他的真正工作。她已經成了他生活上不可少的最可愛的成分。在報喪的信裏，他寫道：「我不能把我的感觸寫出來；這個可憐的女子，她以她整個的心愛着我。」但這時候馬克思正為迫切的苦境所逼，對於不幸的朋友，沒有表示真切的同情，却無粉飾地答說，這個消息使他驚異，使他悲感。接着，他說到瑪利的仁慈聰明，並說她如何深切地愛着恩格斯以後，就用很長的字句，來敘述他自己的困難。他說道，在這時候對朋友提起這許多話，是「過於利己」，但他自慰地把這種行為，看作是一種以毒攻毒。他還安慰他的朋友說：「總之，我待怎樣做呢？在倫敦，我不能對任何人坦白地說話。」他說，在這種情形下，他是不能工作的。在一個附筆裏，他問他現在打算住到什麼地方，並且怎樣過下去，因為他現在已經沒有可以休息的地方了。以前，在那裏，他是可以「自由地，不必管這個騷擾世界的侵擾。」

恩格斯從來只有這一次覺得他受了馬克思的傷害。不過，這一回他是受傷得太厲害了。接到

這封信時，他不禁覺得，馬克思全然不能瞭解，瑪利的死，對於他包含着什麼意義。瑪利尚未入墓。所以，在覆信以前，他讓一個星期過去了。他回信時，他恐怕感情會過於流露，所以先寫一個信稿。在信稿內，他說：「當然，你會知道，在這情形下，我自己的不幸和你的冷漠的態度，使我絕對沒有可能早回你的信，一切我的朋友，甚至俗不可耐的人，都乘這個機會，出乎我的意料，對我表示了同情和友誼。天知道啊！這件事情太叫我傷心了。你却覺得，這是你發揮你的無情哲學的機會。就算你勝利了罷，我不要再挑釁了。」但抄寫時，他覺得措辭太尖刻了，因此把最後一句刪去，把前一句的語氣改得和緩一點。然後立即回頭來討論他的朋友的需要。他說明了，這時候什麼是他能夠做的，什麼是他不能做到的。但最後斷言：「我一定盡我的力」。

馬克思覺得，在回信以前不如停一停，因為在事態像這樣的時候，兩個人都不易有「冷靜的心情」。然後，他向他的朋友坦白表示，前信一經發出，他就覺得不對，並懇請他不要責備他無情。「我的內人和女兒可以做證，早上我接着你的信時，我心裏的感觸，是像我一個最親密最親近的人逝世了一樣。我給你的信是晚上寫的；那時，我的情形似已到絕望的地步。」地主的收租人來了，肉舖說欠帳必須立即付清，家裏已經沒有煤，沒有食物了。有一個小孩正病在床上。在這種無望的情形下，他通常是求救於普尼克主義。他的妻屢次責備他，怪他不把實在的情形全部告

訴他的朋友。這一點，特別使他覺得沒有主意。現在，她不得不同意他的提議，想使兩個年齡較長的女兒去找保姆的位置，他夫婦便帶着最幼的一個女孩，遷到一個公寓去住。恩格斯的回信，表示他曾經怎樣爲這件事所感觸，但他的怒氣已經平了。他認：「你的坦白，使我十分感激，你自己也知道，你的來信給了我什麼印象。隨便那一個，也不能不爲一個曾經共同生活這樣久的女人的死，而受異常的感觸。我覺得，我的青年期，是跟着她一道埋葬了……我對你說罷，你的信，使我一個星期放心不下，叫我忘記不了。不要緊哪，你前回的來信，把我的心印平了；我很高興，我失去了瑪利，沒有再失去我的最老的朋友。現在，回來討論你的問題罷。……」

恩格斯說，他無論如何不能讓馬克思照信上的計劃去做。他還說，他已經用「一種極大胆的手續」取得一百鎊。馬克思回信對於這種犧牲自己的友誼，表示了深切的謝意，並誠懇地說：「我不隱瞞地對你說罷，過去幾星期我雖然處在那樣的壓迫下，但沒有別件事，比我們的友誼或將破裂的憂慮，更使我心焦。我再三對我的女人說，這整個討人厭的事，實在不叫我擔心，使我憤急的，只是資產階級的庸俗氣味和她的歇斯底里的行爲，逼迫我不能在這時候安慰你，反而把我個人的需要麻煩你。……」嗣後幾個星期，恩格斯特別顯得沈默。馬克思擔心，說不定又有別的事情觸犯了他。但恩格斯的回信，說明了這一點。他說，他這時候正處在「一種非常悲涼的情

景中」。他覺得他不能轉換他自己。「那成功了。現在我又是我的故我了。」瑪利的妹妹露子(Daisy)在此以後，逐漸和他締結了親密的關係。

十七 德國的內政

這時候，拉塞爾在柏林方面的活動，已經使他們兩個不能再忍耐了。所以，他們聽說他們最可靠的信徒李卜克內西將於一八六二年在赦下回到柏林，當然是高興的。李卜克內西也是一個政治亡命客。在恩格斯看來，他是一個可靠的同志，但在政治上不能有多大的作為。他的烈性，使他容易為幻想所誤。所以他寄來的一切報告，他們都要用批判的眼光去考察。在拉塞爾逝世以前，李卜克內西從未將拉塞爾和俾斯麥的勾結報告他們。在他看來，拉塞爾的政策是危險的，但還不能說是主義的出賣者。他認為，馬克思還不能代替拉塞爾，只能想法把拉塞爾的勢力抑制。因此，沒有得到英國方面的朋友的同意，他就答應在次年秋間，設法使他們和拉塞爾會面，以最後決定他們將來能不能夠合作。他對於這個小團體內部的權力的比重，有一種可笑的誤解。在拉塞爾逝世不久，他還寫信給馬克思說，如果他願意到這裏來領導，他只要說一聲，就可以辦到

的。拉塞爾逝世的消息傳來了。客觀的說，拉塞爾是一個真正歷史上的人物。恩格斯在寫給馬克思的信上說：「且不論拉塞爾的文學才能和科學才能，他總歸是德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在今日是我們一個極不可靠的朋友，在將來，將會成爲我們一個最確實的敵人。」恩格斯真不懂。怎樣「像他這樣一個政治家，會和瓦拉齊亞一個冒險家去決鬥。這只有拉塞爾是可能的。在拉塞爾心中，輕浮與傷感，猶太主義和假武士精神，形成一種奇妙的結合。那正是他的特色。」恩格斯看見了，死的拉塞爾，比活的拉塞爾，會是更危險得多的敵人。德國無產階級如要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集合，拉塞爾的勢力，不僅必須在生理上，並且必須在歷史上被消滅。

當李卜克內西把自己的勢力估計得過高時，在赫斯看來，馬克思全黨却不外就是「老板」自己，「祕書」恩格斯，和「經理」李卜克內西。拉塞爾支配下的總聯合會，也不覺得他們和四八年以「新萊茵新聞」爲中心點的舊運動，有什麼關係。

一八六四年新的黨機關報紙出版了。那定名爲「社會民主黨」，由李卜克內西和希淮塞爾 (J. hann Baptist Tuh Solweizer) —— 一個沒落的貴族，野心的，聰明的，天主教學校的產物——負責去編輯。希淮塞爾寫信給馬克思恩格斯時，會稱他們爲「德國工人階級運動的創始者」，並邀他們一同編輯黨報。他們雖然相信總聯合會一定會瓦解，但他們還是接受了邀請。但

不久他們就由李卜克內西的信，知道拉塞爾和俾斯麥勾結的真相了。

希淮塞爾雖然明白對李卜克內西和馬克思提供了諾言，但社會民主黨不久就再採取了拉塞爾的戰略，把攻擊點集中到進步黨身上，並稱贊甚至積極同情於俾斯麥的政策了。當初，李卜克內西寫信給馬克思，說他希望報紙能夠逐漸取得「正確的態度」；還說，如果他們願意共同負起編輯的責任，他們一定更容易實現他們的主張。恩格斯聽了他的話，想試試看。他寫了一篇論文，那是討論普魯士的軍隊改革案的。

這篇論文，後來擴大成一個小冊子，在一八六五年二月底，在漢堡，用「普魯士的軍事問題和德國工人階級政黨」這個書名發表了。全書的前提是：政府保守黨和自由資產階級激進黨間的鬭爭，快要到危險的時候了。這正是工人階級政黨起來說話的時機。普魯士國需要多少兵士的問題，是他們不關心的。他們關心的問題是有多少工人受軍事訓練。那是越多越好的。在德國工人階級看來，政府和國會的衝突，要比軍隊改組案更重要。在工業革命已經完成的國內，工人階級的唯一敵人是資產階級。但在德國，還有封建領主，還有地主，有基爾特，有樞密院諸議員，有邦諸議員等等。在這樣的鬭爭裏面，一定有一個時期，鬭爭兩方面，都要求無產階級支持。當然，兩方面都不會準備批准無產階級的要求，但若有一個獨立的工人階級政黨可以當作一個政治

因素來計算，兩方面就都不能不準備對無產階級作種種讓步了。

但工人可望從那一方面取得更大的讓步呢？在答覆這個問題時，恩格斯對於希淮塞爾的政策大加批評，不過沒有把他的名字舉出來。他說，反動勢力的勝利，一定會延遲工人奪得政權的日期。資產階級的勝利，却每次都有益於工人階級的勝利。這種勝利，可以把階級鬭爭明朗化，並加速無產階級克服資產階級的日期。近來，對於某一些人，（他意下是指俾斯麥），一種新的反動方式成了時髦的。這就是波拿巴主義。在波拿巴主義統治的國家內，工人和資產階級一樣會把政治權力全部喪失，出版自由和結社自由將被禁止，選舉權將受限制，以致反對派的候選人，幾乎全部不能當選。在這種情形下，兩方面都只能希望一個休戰；由此，工業將能迅速地大大地發展起來，並為一個新的更激烈的鬭爭，創造出各種要素來。

恩格斯以為，剝奪國會的權力，決非無產階級的利益。選舉權如果是由政府賜予的，政府也就有權將其撤消。在德國，封建地主所剝奪的工人，尚倍於資產階級所剝奪的工人。由於地主們的懷柔政策，由於不良的教育，由於系統的愚民政策和蒙昧政策，農業無產者最不易認識他們自己的社會地位。在有一個工業工人就有兩個農業工人的國家，普選權會得到什麼結果呢？在農業無產階級未被捲入無產階級運動內部時，普選權對於都市無產階級，將不是武器，而是陷穽。工

人階級政黨和資產階級反對黨間雖不可避免發生鬭爭，但在他們未曾釘對釘，互相對立以前，這類鬭爭是不會爆發的，資產階級不要求普選權，出版自由，結社自由，是決不能奪得政權的。但這幾件事情，正是工人階級在求自身解放的鬭爭中所必要的事情。所以，資產階級雖然會成爲無產階級的敵人，但無產階級爲他們自身的利益，應盡力支持資產階級來對抗反動勢力——如果資產階級還忠於他們本階級的利益和主義。

社會民主黨報諂媚俾斯麥和崇拜拉塞爾的態度，使恩格斯十分憤怒。但他還沒有和它斷絕關係。後來，李卜克內西辭職了；希淮塞爾看見「馬克思的舊黨」已經沒有勢力，也盡量對馬克思黨嘲笑。實在說，有一個相當長的期間，馬克思主義幾乎在德國工人中間，失却了全部勢力。

馬克思主義不能在德國工人中繁殖起來，但已經在倫敦的國際工人協會內，獲得了適當的基礎。這個協會，是在恩格斯遊歷希勒斯維格·浩爾斯坦時所創立的。這個組織的初期歷史，在恩格斯的傳記上，不佔重要的地位。不久以前，他成了孟徹斯德工廠的股東，所以除了捐錢，他不能做別的工作。他預料這個協會只要當前的問題一經提出，就會歸於破裂。他還担心，實際的活動不免會妨礙「資本論」的完成，但這種「通電工作」的希望是這樣大，所以就是他，也只要可能，就要對這種組織盡他的最大的力量。

普魯士在俾斯麥領導下的進步，在最後，是恩格斯不願承認的。俾斯麥召集國民會議，主張，恩格斯認爲是變戲法。他看見了，俾斯麥的波拿巴主義，已經是資產階級的實在宗教。一八六六年他給馬克思的信裏，力言資產階級已不能有獨立的政治行動。『我益益看得清楚了，資產階級是不能實行統治的，所以標準的政治形態是波拿巴主義；不然，就是像英國一樣，由少數幾個人，爲了很大的報酬，而爲資產階級利益，負起指導國家社會的任務。以波拿巴主義爲基礎的半獨裁制度，會在反資產階級的情形下，維持資產階級的主要的物質利益，但不讓資產階級自己去統治。在別一方面，這種獨裁制度，也將被迫違反素願，而採取一種政策，來維持資產階級的物質利益。』

普魯士對奧地利宣戰時，恩格斯曾預言普魯士的失敗，因爲他相信，普魯士軍隊的紀律，已經在憲法鬥爭中破壞了。他曾對馬克思提出如下的預言：『六月底將會發生軍事的革命。』如果這個機會等閒放過了，如果人民讓這個機會等閒放過，我們就可以捲起革命包袱，回轉來研究理論了。』

在薩瓦多決戰以前，恩格斯曾在『孟徹斯德衛軍』撰了五篇論文，論述交戰國雙方的資源，前途和鬥爭的進行。但他預料普魯士失敗時，普魯士居然獲得大勝利了。他對馬克思（九月十四日）說：『無論如何，俾斯麥現在是躍躍欲試，想把他的德意志帝國實現出來。』七月九日他已經寫

道：「簡單的事實不外是這樣：普魯士有五十萬枝自動鎗，世界其餘各國不到五百枝。一直到現在，普魯士是處於絕對優勢。你以為俾斯麥不會利用時機麼？當然，他會。」現在，他當前最大的敵人，不是波拿巴，而是俾斯麥了。他在事實的面前，不得不承認，在德意志，普魯士主義即將流行。

正在德意志發生這樣大的政治變革時，馬克思忙於整理「資本論」第一卷，準備將其付印。對於「資本論」的命運，恩格斯是這樣深切關懷着的。在病與貧的交迫下，馬克思會對恩格斯說起，只要他的書完成了，家人不愁餓死，他是不管今天死還是明天死的。恩格斯答道：「你知道，我已準備做我所能做的事情，在極端的情形下，我還可以超出冒險的程度來做。但請拿一點理性出來，爲我和我的家人的原故，請一位好醫生看看罷，如果你有什麼事，這全部運動將會怎樣呢？」一八六六年恩格斯聽說第一批稿子已經付印時，特別飲了一杯，祝賀著者的健康。和馬克思自己一樣，恩格斯以爲，這部書將會引起極大的印象，並信馬克思未來的收入，可由此得到一個幫助。同時，他還希望不久他自己也可以拋棄營業的生活，因爲這樣生活，正在破壞他自己的工作。他把這些意思通統告訴了馬克思；現在他說：「我心裏老是想到這件事——你的情形將會怎樣。現在，如果事情真如我們所想，這個問題就自行解決了。」在馬克思的覆信裏，有這

確一句有意義的話：「沒有你，我不能把這個書完成；我對你說罷，在我意識中，只要想到，你主要就是爲了我，而把你的光輝的能力，虛擲在無聊的生意場中，並爲我的貧苦所累，我心裏就覺得不安。」

「資本論」出版了。恩格斯以爲，用一點小計，來促成這個著作的暢銷，也不是不可以做的專。他寫了許多匿名的廣告文字；他的信徒們，在德國，還看見這種廣告，被插在資產階級報紙內，李卜克內西編輯的「民主週刊」，也可使恩格斯隨意使用。但這樣的科學著作，是從來不會暢銷的。歷史家俾斯勒（Boisler）——馬克思的友人，「二週評論」的助編——答應接受恩格斯一篇評論。但主編人約翰·摩爾勒，把那篇評論擱下了，說這個題目太枯燥，不適合在雜誌上發表。恩格斯所撰的這些論文，目的都在於教育讀者，沒有準備的教育，讀者是難理解這個科學著作的。其中有一篇說到，「資本論」對於以前各種經濟學體系包含着「一種批判，並使社會主義理想得到一個科學的基礎。這個基礎，不論是佛里埃，還是蒲魯東，甚至拉塞爾，都是不能給予的。由這句話，我們可以看出，恩格斯爲什麼要在物質方面精神方面作種種犧牲，以促成「資本論」的完成了。馬克思也明白這一點，所以在一八六七年六月二十二日一封信裏，對他的朋友說：「你的滿意的表示，和全世界對這部書所說的話，比較起來，還是於我更重要的。」

普魯士的勃興，對於德國工人階級的運動，將會發生什麼結果，馬克思恩格斯是看得很明白的。他們明白看到了，北德意志聯邦的形成將會是無產階級取得民族統一性的機會，但他們的留在德國境內的同志，却單從反普魯士主義的觀點，去看全部情形。當恩格斯把這一點提出時，李卜克內西回答說，他不能要求他的支持者，立即與小資產階級的『南德意志人民黨』分裂。他說，這裏只有黨的新兵，還未曾有高度訓練的黨員。他說，他們還有種種偏見要掃除。最後他催促恩格斯說：『不要單是責備我罷，我已經在這裏取得了相當的位置。我現在的任務是保持它。穩定它。爲黨的利益來利用它，那是你們的工作。就動手罷！』

在這裏，他是指倍倍爾 (August Bebel) 在薩克森領導的大眾黨。這個政黨的黨員，主要是工廠勞動者。倍倍爾是一個熱情的青年，是一個車旋場工頭。遇著倍倍爾後，李卜克內西覺得，他已經得着他所需要的幫手。他開始向希淮塞爾攻擊。他攻擊希淮塞爾的領袖獨裁政策，攻擊希淮塞爾的工會政策。在一八六六年秋紐倫堡的大會內，倍倍爾和李卜克內西第一次勝過了希淮塞爾，第一次招撫了希淮塞爾一些黨徒。次年夏，社會民主工人黨在愛森納 (Eisenach) 成立了。社會主義工人的政黨，正式與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殘餘破裂了。恩格斯雖然不能贊成全部「愛森納綱領」，但他以爲，這應該算是第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政黨了。

十八 再成爲自由人

恩格斯和他的夥計歐門兄弟的契約將於一八六九年夏滿期。歐門兄弟很知道他不喜歡生意，所以在一八六八年夏，提議許他退股，並對於他的商譽，提出相當的賠償。這個提議，使恩格斯太高興了。在賠償額的談判中，他所考慮的，是資本的利息，够不够逐年滿足他自己和馬克斯的需要。一八六九年五月，他從商店提出了七千五百鎊，但談判還未完全定妥。七月，他已經能够寫信給馬克思說：「哈啦，從今天起，我可以不談生意了；我是一個自由人了。」那時，馬克思的幼女愛麗娜正好住在恩格斯家裏（她常常住在他家裏）。恩格斯去世後，提到這件事，她說：「我永久不能忘記，那天早晨，他穿起長靴，這是他最後一次到公司去了。他高興地喊着：『最後一次了！』」幾點鐘後，我們立在門口等候他時，看見他從屋對面一個小田園穿過來。他手舞着一根手杖，唱着，滿面含着笑容。」恩格斯寫給母親的信說：「從昨天起，我已經變成另一個人

了，更年輕十年了。今天早晨，我沒有到愁慘的都市去，卻在美麗的氣候中，在田園裏，散步了幾小時：在佈置得相當舒適的房子裏，打開窗戶，也沒有塵灰飛進來把東西弄得墨黑。窗戶上有花，房子前面有幾株樹。我坐在書桌上，做的工作，是和昨日以前的工作全然不同了。昨日以前我是在貨棧一個灰暗的房間裏，望出去，就是一個酒店的天井。」

恩格斯當初回事務所去時，原希望下一次恐慌，會把他召回。但這一去，是經過了十八年。他屢次爲希望所欺騙；他不知道，像這樣被鎖鍊在庸俗的事務上，是危險的。他担心中，他的天才也許會全然鏽掉。他憂慮抽身出來的時期會來得太遲。現在，他已經是四十九歲了。他已經不是一個急性的青年了。在青年時，他希望打獵，有一次，還在馬上墜下來，把骨頭折斷了。現在，他已經不是這樣的一個人了。不過，他覺得，他還是在年富力強的時期。一嘴棕黃色的鬚鬚，一些灰白色的頭髮，雖然如此，他還是沒有一點老人氣。他熱望生活，好動，快樂，善飲——這就是恩格斯；並且一直到高齡還是這樣。他是從來不頹廢的。他時時知道什麼是他應做的工作。他也從來沒有懷疑過他這種工作的重要和神聖。

九月，他和麗子·白恩士一同到愛爾蘭遊歷。從此以後，他每次提到她，總是把她當作他的妻看待的。同行的人有馬克思的幼女愛麗瑪。麗子有天賦的智慧，雖然她不能好好地讀，好好地

寫。她出身於真正的愛爾蘭無產家庭。她的全部精神，充滿着對被壓迫的祖國人民的愛；對於革命的斐尼亞黨，她抱着熱烈的同情。有幾個斐尼亞黨員，寄住在她家裏；他常常參與他們的密謀。在她家裏，革命的黑綠旗是常被敬禮的，所以恩格斯對於這樣一個家庭，覺得很有吸引力。在他看來，斐尼亞運動的性質，在英國的狀態下，是空前的，驚人的。對於他們的「巴枯甯式的，矜誇的，無目標的行動宣傳。」他不能贊成。但他以爲，愛爾蘭農民的暗殺事件是無法停止的；「只有靠這種手段，人民才不致全部爲地主剝滅。」

這時候，大憲章運動已陷入垂死狀態中，迭斯累利的選舉改革運動，曾一時爲恩格斯的革命希望的主要寄托所。但一八六八年十一月的選舉，成了「英國無產階級無能的致命的證據」。約翰·布萊特竟被視爲工人階級的領袖。當他對於這種運動覺得失望時，愛爾蘭問題對於他就益益顯得重要了。他和馬克思以爲，英國地主寡頭政治的沒落和革命精神的復活，必須由愛爾蘭發動，並且必須由愛爾蘭推進。

和盤子一同到愛爾蘭旅行的時候，他就決定要寫一本愛爾蘭的社會史。一八五六年他偕同瑪利到那裏訪問過一次，那時他已經注意到了。「英國資產階級的所謂自由，是以殖民地的壓迫爲基礎。」自此以後，他和馬克思屢次談到愛爾蘭受壓迫的問題。歷次的選舉，說明英國的產業工

人，對於生活標準較低的愛爾蘭方面的競爭者，懷有深切的厭惡心理。甚至在國際工八協會內，他後來也看到有人提議把愛爾蘭的各個支部隸屬於英國聯合會。他對於這種提議是反對的。他常把愛爾蘭當作一個獨立的民族看待。現在，他可以在愛爾蘭當地，研究愛爾蘭各方面的情形了。

一回到孟徹斯德，他就開始搜集各種與愛爾蘭歷史有關的材料。這種材料，是從孟徹斯德各圖書館和倫敦各書店找到的。他愉快地發覺了，獵取資料，比在「混亂」交易所內獵取顧客，是更有樂趣得多的。他的著作，計劃分成四節。前兩節，討論「自然狀況」和「古代愛爾蘭」。這兩節，在他逝世後，在他文稿中發現了。第三節，論述英國的征服；第四節論述英國人的統治。這兩節，都沒有保存下來。第四節，打算分做三段：「刑法」，「一七八〇年至一八〇一年的叛變和聯合」和「聯合王國中的愛爾蘭」。恩格斯贊成馬克思的意見，把最後一段分成兩期，「小農民時期，一八〇一年至一八四六年」，「剿滅時期，一八四六年至一八七〇年。」

這本書，打算由愛爾蘭的自然狀況，說明愛爾蘭的命運。英格蘭人總想把愛爾蘭人同化。『如果他們真的把愛爾蘭人同化了，愛爾蘭的全部歷史，就會屬於英格蘭了。這可以批評，但沒有辦法。但經過七〇〇年的鬭爭，他們還豈不能把愛爾蘭同化，又怎樣呢？如果每次新侵入者來到，都被愛爾蘭人同化，又怎樣呢？如果愛爾蘭人至今還是像波蘭人受一世紀壓迫之後還不是

西部俄羅斯人一樣，不是西部不列顛人，又怎樣呢？如果鬭爭還是不能停止，並且如果不是把被壓迫的民族剷滅，這種鬭爭就永無停止的一日，又怎樣呢？這樣，任何地理上的理由，他不够證明英格蘭有把愛爾蘭征服的使命。」恩格斯以爲，愛爾蘭的苦命運，幾百萬年以前，就被決定了；那時候，愛爾蘭島上的炭層被沖掉了，所以好像由自然命定了一樣，註定了要成爲鄰近一個大工業國的農場。

但愛爾蘭註定要成爲英格蘭的農場或牧場麼？「和英格蘭比較，愛爾蘭是更適於畜牧的；但和法蘭西比較，英格蘭也是比較適於畜牧的。我們能夠因爲這個原故，便說英格蘭全部應轉化爲牧場，其農業人口全部，除少數畜牧者外，應被送往工業都市或美國，好讓開地方來養家畜，然後把家畜運到法國去交換絲和葡萄酒麼？」愛爾蘭方面的地主，提高了他們的地租，英格蘭的資產階級減低了他們支付的工資——這樣就把一個社會革命，引導入一個主要從事小規模農業的國家了。這個社會革命的意義是四百萬人口的移出，和愛爾蘭人民的剷滅。」「今日英格蘭需要穀物，愛爾蘭就好像天生是適於栽種小麥的。明日，英格蘭需要牛肉，愛爾蘭就好像天生是適於畜牧的。五百萬愛爾蘭人的生存，就是政治經濟學一切法則的直接的侵奪。」他和馬克思一樣，認愛爾蘭是英國土地貴族的屏障。如果愛爾蘭的土地貴族失勢了，英格蘭的土地貴族也會失勢。

只有這樣，英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先決條件才算具備。

恩格斯對於愛爾蘭民族，存有一種獨特的敬愛心，他愛他的瑪利和麗子，他也愛瑪利和麗子的故鄉。「愛爾蘭有可怕的復原力。在最殘暴的壓迫之後，在剝滅政策實施之後，愛爾蘭人不久又會把他們的頭抬起來，並且比以前還會更強。」

一八七〇年秋，恩格斯和麗子移居到倫敦，在利堅公園路 (Regents Park Road) 買了一所房子，只要走一刻鐘，就可以到馬克思的寓所。在身爲工廠主時，恩格斯在政治上不能有積極的活動；現在，他是一個自由的作家了。他立刻就在國際協會當了選。李卜克內西盼望恩格斯回國當選爲國會議員。但他不願走進俾斯麥的勢力圈內，甯願住在海外，來追蹤大陸方面的發展，並在自由空氣中，從事理論的研究。

他離開孟徹斯德時，法國正和普王統率下的德國軍隊，進行最激烈的戰爭。在戰爭初發生時，恩格斯說，他自己是一個萊茵人，但他不信任雅各賓黨統率下的法國，將會解放被壓迫的民族。法國人，包括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者，藉口俾斯麥主義的危險，要出而干涉德國。恩格斯說明了，俾斯麥主義不是「德國天然的東西」。他寫道：「我以爲，這是極端重要的，這些紳士們應以平等待遇我們；在革命事件中，尤其如此。」

但德國工人對於戰爭應抱的態度是怎樣呢？在工人階級中，應否支持這一種戰爭的問題，頗有意見紛歧之處。馬克思被請求去解決當前的爭執；但他未與恩格斯商議以前，沒有表示意見。

八月十五日恩格斯的答信，一開始就說：「拿破崙已經使德國捲入一次爲民族生存而進行的戰爭了。」如果德國被戰敗了，德國將會有許多年數，甚至許多代數，不能復原。「這樣，德國將會沒有獨立的勞動階級運動了。一切能力將被吸收去恢復德國民族的生存，德國的勞動階級，將只能成爲法國的附庸。但若德國把法國戰敗了，波拿巴主義將被推翻，德國方面爭鬪不已的問題將告結束，德國的工人將能以更大的國民規模組織起來，並且無論法國將來採取何種政治形態，法國工人，總會比在波拿巴主義下，獲得更大的自由。」所以，恩格斯的意見是：德國勞動階級在民族運動以自衛爲限度時，應當參加去支持這種運動。他以爲，如果德國戰勝了，那只要巴黎成立了一個反戰的共和政府，黨便應當起來，發動一個榮譽的和平。他說：兩國勞動階級的利益共同性必須特別強調，他們不贊成戰爭，也不互相仇視。

李卜克內西反對民族運動的嘗試，惹起了恩格斯的鄙笑。他曾對馬克思說，「如果德國一般的情感是這樣，我們不久就會再看到萊茵聯邦之類的東西了。這時候，他將會知道他的活動已經發生什麼結果，勞動階級將被放到什麼地方了。」

在戰爭進行中，恩格斯在自由黨辦的「包爾茅雜誌」，討論了戰爭的進行。自一八七〇年七月二十九日至一八七一年二月十八日間，他發表了六十篇關於戰爭的論文。這些論文，後來在世界大戰中，用書籍的形式再版了。這些論文所引起的注意，給了他適當的精神上的報酬。「旁觀報」更稱這些論文為英國報紙上向未曾有的最重要的論文之一。泰晤士報和別一些報紙時常引用他的論文。因此，他預言色當的大勝利時，馬克斯寫信給他（九月二日）「你第一篇馬克馬漢的論文，已經得到光輝的證實了。現在你要開始寫第二篇論文；在這樣做的時候，你要把你自己的戰爭論重述一遍。你必須把英國人鼻子下面一切的東西都刮光，他們才會注意你；過於謙遜的態度，是不能對付英國人的。」

歐洲最有勢力的一個人——拿破崙三世——現在成德國人的俘虜了。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再在法國被宣佈了。德國統一了。這時，恩格斯的態度改變了。在他看來，歐洲的危險，已經不是法國的波拿巴，而是德國的俾斯麥了。他反對德國的領土要求。他以為，亞爾塞斯·洛倫的吞併，固將使法國失去一大塊領土和大約一百二十五萬人民，但法國依然不會受箝制。再把梅茲和斯特拉斯堡也割過來，法國人也還能在南雪或凡爾登成立新的陣線。所以，九月十二日國際協會發表了一節宣言，力言吞併亞爾塞斯·洛倫這件事的危險。宣言的軍事論點，分明是恩格斯指

示的。

這時候，恩格斯很希望，甘伯達 (Gambetta) 統率的民軍，會在被征服的土地內崛起，將德國王室的軍隊驅逐出境。一八七〇年底，他起草了一個國爭計劃，據說，會由拉法格 (Lafargue) 之手，交到法國政府。自九月以來，赫德公同時有示威運動；急進派，無產階級，和愛爾蘭人，羣起要求援法。這種示威運動，恩格斯是不重視的。但十月三十一日俄國宣佈廢止一八五九年巴黎和約的條款了。這個條約，限制着俄國的黑海主權。俄國的這種舉動，當然使英國朝野大震。恩格斯因此在「包爾茅雜誌」上，鄭重暗示英國有出而干涉的可能。十一月二十一日，他還說，因為俄國揭開了東方問題，所以法國的命運不必要到戰壕決定，卻將在一個未參戰國的內閣決定了。普魯士將被迫退出巴黎了。

十九 國際的分裂

一八七一年一月底，國際協會總部，開了幾天的討論會，討論的問題是英國。無產者對於大陸方面的發展，過去和現在是採什麼態度，將來又會採取什麼態度。討論分三部進行。那是由恩格斯提議和計劃的。第一個部分，斷言英國的工人階級運動，必須竭全力，使英國政府承認法蘭西共和國。第二個部份，斷言援法的武裝組織，只有在一定的時機可以成功，現在時機已經過去了。第三個部份，斷言英國如不能奪回使用實力的自由，即使用海軍力的自由，它將無法過問大陸方面的事情，也無法抵禦歐洲極權主義的軍事國家。這就是說，英國必須把克拉倫登勳爵在巴黎會議中所發的宣言，宣告廢止。英國的威力，完全繫於艦隊，但一八五六年的宣言，設立了一種海事法規，來取締武裝民船。照恩格斯的估計，普俄的祕密協定，已經是沒有疑問的。帝俄既然是當時歐洲最危險的敵人，所以，恩格斯很希望英國能有充分的實力，可以打擊俄國。但這樣

英國的商業是要受損傷的。英國的資產階級爲了他們自身的利益，不惜犧牲英國的實力了。只有工人階級，因爲他們沒有私有財產可以損失，所以也不要保障私有財產的安全。他們應發動起來，使英國能够恢復它所必要的實力工具，並保持這種工具，一直到俄羅斯帝國瓦解。在他看來，只有英國能够有效地制裁帝俄和普魯士目前的侵略戰爭。

在德國工人階級運動中，有拉塞爾的勢力，要馬克思恩格斯去剷除；同時，在國際協會內，又有巴枯甯(Bakunin)的地位要他們去掃除。在他們看來，巴枯甯在國際工人階級運動中的地位，是和拉塞爾在德國工人階級運動的地位一樣。

巴枯甯是一個俄國貴族出身的醉漢。對於他，革命是一種情緒的陶醉。他不喜歡有系統的研究。他的熱情，不寄在書本上，而寄在人身上。在他看來，科學和生活是不相容的；科學只是一種無結果的事業。他的生活是混沌。他本身就是一個混沌，是一團熱和一團火，會不斷噴出交熱來。他的故鄉，一直到這時候，還是沒有一家大規模工廠。他的世界是大地產和小農場構成的。就到後來，他還是相信像英國那樣的大工業，不會在斯拉夫族國家和拉丁族諸國家同樣發生。

這些性質，決定了巴枯甯的思想的性質。他要求個人爲極端的自我犧牲，來解放人類。在他看來，這種解放是一些小陰謀家團體努力的結果。運動的最高點雖然寄托在羣衆身上，但推動羣

衆，只是少數熱心的陰謀家的使命。他反對一切權威。他曾誇大地斷言。國家的廢除可以把一切的社會病害醫治好。

他在西伯利亞被長期囚禁之後，逃出來了。一八六八年在和平自由民主聯盟的一次會議內，他要求廢止一切國家，建立一個世界聯邦，以自由的生產協會爲構成份子。這個提案爲大會所嘲笑時，他才注意到國際工人協會。他要把他的「無政府主義」理論，移植到國際來。他以爲國際的力量只够把勞動階級組織起來，所以他覺得，在其內，必須另有一個無形的組織，而以「集體的行動」爲目的。他相信，他的任務就是組織，並且領導勞動階級運動內部的這個無形的組織。

國際工人協會雖然已經在馬克思恩格斯的領導下，但裏面包含着社會地位和政治認識，還是極多差別的。他們看見了這種情形，所以在提出主張時，他們往往不得不忍受必要的限制。要他們忍受這種必要的限制，已經不易做到；他們肯讓這種可以把協會根本破壞的思想和行動，在協會裏滋長麼？巴枯甯以前曾經創立一個社會民主聯盟，以無政府主義爲公開的主義。現在，爲要把會員介紹入「國際」，他聲稱把那個團體解散了。但馬克思恩格斯總以爲，這種解散不過是一種名義上的表示。

一八七一年三月巴黎的無產階級暴動了，但旋即失敗了。上萬的工人被屠殺在巴黎市街

當時馬克思會大呼，巴黎公社失敗了，但它的主義不會死滅。他還在國際總會宣讀了一篇有名的演講辭，說明這幾天大流血的歷史意義。他把公社的無意識的傾向，薰染成爲有意識的計劃了。二十年後，重印這篇演說辭時，恩格斯會說。這種薰染「在當時的情形下是適當的，乃至於是必要的。」

一切偏袒公社的人和政黨都被搜索了。大陸各國的政府和全歐洲的報紙，都熱心參加這種搜索運動。在英國，自由黨的報紙和保守黨的報紙，爭着要表示他們的兇狠，因此，恩格斯斷絕了他和「包爾茅雜誌」的關係。公社的舉動，他不是完全贊成，但資產階級的一致的兇狠，使他毫無保留地，左袒公社的行動和目標。他的母親也有所聞了。在一封已經喪失的信裏，他惋惜他的長子，居然會隸屬一個舉世駭怕舉世詬罵的惡黨，並且暗示，如果惡魔馬克思不和他在一起，他的政見也許不會如此。腓特烈的回信答說：「你知道，三十年來，我的見解終始沒有變改。當事態迫使我時，我不單要保持我原來的見解，並且要用種種別的方法來盡我的責任。你當然不會覺得奇異。我不這樣做，你倒有理由覺得可恥了。馬克思在與不在，甚至有沒有馬克思這個人，是一點關係沒有的。」他以後寫給母親的信沒有保留下來，但這是可以斷言的，他始終愛着他的母親；母子間的美好關係，沒有因這最後一次的爭論，發生嚴重的影響。

公社的失敗，使國際內部趨於分裂。英國工會的兩個領袖奧特加（Osger）和魯克拉夫特（Luorath）雖然是國際的發起者，但看見馬克思公開袒護公社的演講辭，就覺得這是他們脫退這個團體的充分理由了。關於這件事，恩格斯說，他們加入國際，不過爲了想利用「國際」，來支持選舉改革同志會；現在他們退出國際，又不過因爲他們現在不要和自由黨相爭，因爲自由黨答應設法爲他們找到國會的議席。

這件事情發生以後，國際協會內部的衝突，是更激烈了。恩格斯以爲，對於這問題，比較妥當的處理方法，是開一次公開的的會議，但問題應由一個祕密會議去解決，那就是，組織上政策上一爭論點，應由在倫敦召集的一次祕密會議決定。恩格斯很知道，國際協會的組織還是很不健全，各國的支部對於總會，多是貌合神離。他相信，國際協會必無法存續，如果總會和各支部的聯絡鬆懈下來。各國支部，多不滿意總會居超越地位，但總會的支配權，恩格斯認爲，是不能不保存的。

祕密會議在九月間召集了，到會的，幾乎全是馬克思派。反對派的代表，沒有一個出席。祕密會通過了許多決議案。其中的一個是指責各種離心的努力，認這種努力可以損害總會的力量。還有一個決議案，認定離開政治行動，經濟的勝利是不能得到的；並且，勞動階級應處處組織獨

立的行動。這是公開宣戰的記號。因爲在巴枯賓看來，這種決議是一種政變，其意圖在使國際變爲集權機關，以總會爲獨裁者，並以馬克思主義的綱領爲整個協會的綱領。

祕密會的決議案，提到公開大會去討論了。恩格斯已當選爲國際的通信委員，對意大利和西班牙直接負責。這兩個國家原來是反對派活動的營壘。他力要把他們克服。在西班牙，他是信賴拉法格——公社運動的亡命客。在意大利，他是信託加洛·加菲洛（Carlo Cafiero），但這位青年，在倫敦，雖然曾經是恩格斯的親密的同志，但一回到意大利，他就成了反對派的領袖了。——一八七二年八月意大利的里米尼大會，就在加菲洛的主席下，宣告與總會脫離，並決定不派代表出席荷蘭的公開大會。

同時英國方面的離心力量也在增強。英國的聯合會已經成立了。一八七二年第一次大會中，聯合會的書記赫爾斯（H. H. H.）提議，英國聯合會應有權與其他各國的聯合會發生直接關係，這就是不要總會干涉。八月六日恩格斯以小組委員會的名義，正式在總會對巴枯賓和他的「祕密聯盟」提出抗議時，赫爾斯是站在巴枯賓一面，說實際有兩個祕密團體在國際內爭權。在公開大會內，英國代表是全部支持無政府主義派的立場。

大會九月二日在海牙舉行。恩格斯到海牙以前，以爲可以穩得多數。開會廳名叫協和廳。但

會議的進行表現得極不和諧。巴枯寧沒有到會。反對派由一個瑞士人，名叫傑姆士·吉廉(Galliano)領導。由馬克思提議，大會組織了一個小組委員會，來裁判恩格斯關於秘密組織所搜集的各種證據。巴枯寧和吉廉被開除了。判決案不但指責巴枯寧的違反紀律的行爲，並指斥他的受賄。

在衆人的驚異下，恩格斯還提議中央執行部的辦事處，應遷往美國。這不僅因爲在紐約可以少受一些警察的干涉；更重要的原因，是公社失敗，亡命客湧到倫敦以來，原來只負監督和指導責任的總會，頓發生了國會一樣的辯論。這不是國際的好現象。恩格斯提議，遷移應以一年爲度。他的提議，被採納了。英國的工人階級已經後退了，總會已經沒有留在倫敦的必要了。

海牙的統制委員會，決定要對於巴枯寧的陰謀和秘密組織，編輯一種備忘錄。這種備忘錄，因爲主要是爲拉丁系的國民寫的，所以是用法文寫。在備忘錄的著作上，拉法格幫助了恩格斯。文名：「民主社會聯盟與國際工人協會」。一切足以爲證的證據，都搜集了。恩格斯鄭重地說，只有陰險的偵探，會像巴枯寧那樣把強盜描寫成爲真正的俄國革命家，會對青年人宣傳無智的宗教，會把革命和暗殺團體的行爲視爲同一。

文章雖然熱烈而有力，但國際的大勢，已由海牙大會前和大會中的情形證明，無能爲力了。

執行部移往紐約的目的，是維繫國際的生存，但國際的生存終於不能維持。恩格斯不得不承認，在舊形態上，國際協會已經沒有繼續生存的可能了。八年前馬克思走出書齋，指導實際的運動時，他原抱着很大的希望。恩格斯憂慮實際的任務，或不妨礙理論工作——「資本論」的完成——的進行。住到倫敦來以後，他和馬克思一起了。爲要給馬克思以完成理論工作的可能，他負担了實際工作的大部分。國際內部破裂以後，他越是覺得理論的研究重要了。他寫給國際總書記梭格(Sorge)的信表示他存有這樣的希望：再過幾年，只要馬克思的著作一發生充分的影響，下一屆國際就會純粹成爲馬克思主義的國際。

二十 社會民主黨的統一

德國已經統一了。但對於以戰勝法國爲統一基礎的德意志帝國，恩格斯沒有一點好感。他雖不輕視新帝國擁有武力，並且相信，在最近的將來，這種武力，除了由本國工人階級意識的增長，是沒有任何武力，可以將其摧毀，但他還是覺得，由征服而成立的德意志帝國是和因被征服而沒落的法蘭西帝國有相同的命運。統一帝國的選舉，名義上是以普選爲原則，但對於國家的措施，人民仍然不能有發言權，因爲警察可以支配一切。實在的權力，仍然落在一個特別的官僚階級手裏。這個階級似乎高立在其餘一切階級之上。而與其餘一切人民相獨立，虛偽的立憲政治，成了必然的。

但在這種情形下面，生產力是在突飛猛晉中。所以，在他看來，俾斯麥雖然一千個不肯，他還不能不批准資產階級的要求。一八七四年恩格斯寫道：「我們畢竟有我們自己的世界商業，有

真正的大工業了，有真正的近代資產階級了，所以我們也有了真正的投機失敗，有了真正有力的無產階級。和德國無產階級的無聲無氣但時刻不停的發展相比較，斯庇雪爾，馬士·拉，杜爾，和色當的砲聲，在未來的歷史家看來，將成爲一八六九年至一八七四年間德國歷史上更不重要的事情。」

這時候，李卜克內西和他的同志，已經和資產階級的民主黨脫離了。他們和倍倍爾，加上若干以前信奉拉塞爾主義的份子，創立了一個政黨，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可以說是真正的階級政黨，雖然在理論上，「愛森納綱領」還有若干點，不能叫他們滿意。在恩格斯看來，拉塞爾、希淮塞爾領導下的德國工人總聯合會，是一種阻礙的力量。他常常要把這種勢力掃除。但普法戰爭後，希淮塞爾從政界退休了。一八七四年初，俾斯麥又不斷猛烈打擊社會民主工人政黨，並同樣打擊工人總聯合會。於是，兩派都感覺有講求妥協的必要。歷年的仇恨心，屢屢使這種妥協成爲不可能。實在說，在大衆心中社會主義仍然以拉塞爾的小冊子爲根據時，馬克思恩格斯也是反對合併的。這情形下的合併，將仍然由拉塞爾主義支配。但李卜克內西卻以爲，「軍事性質的黨」，應當顧到事實，而不應太過注重理論上的差別。所以，不願他們的反對，他還是努力，謀兩派的統一。

一八七四年六月，拉塞爾派的總聯合會被解散了。在馬克思恩格斯的意思，社會主義工人黨應等候幾個月，使拉塞爾黨的「已經沒有組織的羣衆」，自動投進來。李卜克內西卻以爲，這全是幻想。他斷定，不對拉塞爾的舊政治要求爲相當的讓步，結合將成爲不能的，他怕馬克思、恩格斯出來反對，所以在以後數月間，沒有把談判的詳情告訴他們。倍倍爾還在獄中。一切的線索，都操在李卜克內西手中。一直到一八七五年三月兩方的磋商者想在哥達（Gotha）大會——兩黨的合併，就是由這次大會批准的——提付表決的綱領草案，才交給他們看到。他們真是動火了。

這個綱領草案，在他們看來，簡直叫健全的社會主義無產者，拜倒在拉塞爾的偶像之前。他們希望，快要被釋放的倍倍爾，會起來反對這個草案。因此，三月十八日恩格斯寫了一封信給倍倍爾，列舉各種理論的論據，來反對這個草案。五月五日馬克思又對社會主義工人黨諸領袖，提出他對於這個草案的批評。二者的內容，是全然一致的。

恩格斯把這個草案叫做「軟弱的無臭味的綱領」。綱領內有這樣一句：「一個反動的集團，由一個非無產者的階級構成，而與無產階級相對立。」他說，這種看法全然是「歷史上錯誤的拉塞爾的口號」。他說，這個口號，只在一定的例外情形下，是正確的。他說，在資產階級已經依

照他們自己的映像來形成國家和社會的地方，這種口號才是正確的。其次，綱領又否認勞動階級運動的國際主義原則，可以直接應用；它沒有說到工會；它甚至把拉塞爾的公共救濟計劃，當作解決社會問題的唯一出發點。對於這些，恩格斯都加以批評。他說，像這樣對拉塞爾黨大讓步所得的結果——純民主主義要求——就在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政綱內，也同樣可以見到。最後，恩格斯聲明，他和馬克思雖然在海外，但必須對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的言行負責；如果這樣一個綱領被採納了，他們對新黨是不能支持的。

倍倍爾看到了恩格斯的信麼？至少他是沒有作答。現在，我們又知道，馬克思的批評，李卜內西也沒有送給倍倍爾看。

對於恩格斯的不客氣的批評，李卜內西一個月後才致答信。他不掩飾綱領的缺點，但解釋說，他和同志們所以同意這個綱領，是因為拉塞爾黨不讓他們有第三條路；不是把綱領接受，就是談判破裂。他對恩格斯担保說，兩黨的統一，不僅指示拉塞爾觀念的死亡；那還指示了，馬克思主義已經完全戰勝拉塞爾主義。他還說，爲確保勝利起見，他還準備爲進一步的讓步。倍倍爾出獄之後，他相信，渴求統一的羣衆，對於談判所存的希望太切了；任何人，如其不要失卻民心，都不敢有所苛求。

這樣，恩格斯是失望了。他們的批評，完全被忽視了。李卜克內西雖然在理論範圍內承認他和馬克思的領導地位，但他覺得他們未免把實際看輕。倍倍爾在這時也還只是一個學習者。實在說，德國方面的領袖們雖然常常提到馬克斯主義，但那還沒有仔細研究過「資本論」，他們至多只知道「宣言」，知道裏面展開的階級鬥爭學說，比拉塞爾工人綱領展開，更徹底；黨員大部分還把拉塞爾「工人綱領」當作社會主義教育的入門書。唯物史觀學說，幾乎沒有人能够真正瞭解。他們都只知道馬克思學說的斷片，不能瞭解這個學說的連繫的整體。說起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大家都尊敬；但說到他們的見解，大家都認為太玄妙了，過於使用工人的頭腦了。他們覺得，馬克思主義不應當完全把感情的要素除外。他們甚至覺得烏托邦的描寫也不是要不得。當倍倍爾的「婦人與社會主義」這樣一部通俗的書，居然會不脛而走時，恩格斯很痛苦地覺得了，工人羣衆還缺乏一種嚴俗的教育。唯物史觀的理論，必須用教科書的形式記述出來。

在統一的談判中，有一個青年人，從柏林來，名叫倍倫斯泰因(Eduard Bernstein)的，第一次露出他的頭角。他是一個銀行職員，是猶太種，一個可憐工人的兒子。不過由道德家說，知道一點馬克思恩格斯的見解。但他看到了這個事實：即自拉塞爾主義瀰漫以來，政治領袖們還沒找到代替的理論。他偶然讀到了柏林大學首講師杜林(Eugen Dühring)——實證主義者——

的著作，就想把塔姆來代替拉塞爾。他甚至把杜林的著作，送給當時還在獄中的兩個最有力的行動家倍倍爾和摩斯特（Mosh），要他們兩個贊成他這個意思。

杜林擁護了美國人卡勒（Carr）的學說的一點滓餘，形成了他的樂觀主義的實證哲學。他的「經濟學批判史」，對於「資本論」，沒有說一句好話。他用他自己的古怪的社會主義，來代替馬克思的辯證法的共產主義。他的淺薄的空想的趣味，以及視勞動問題爲現世紀實在問題的態度，叫那些來受哲學訓練的行動家，看了非常滿意。他大胆地視一切科學思想家爲敵，並由此博得了一般聽衆的喝采。

杜林的影響，在這個剛剛成立不久的政黨內，似乎益益在增大。連一些向來尊敬馬克思的人物。也在受這位醫先生的誘惑。倍倍爾就對倍倫斯泰因說：「如果東西真正好，我是不吝惜一根稻草的。」摩斯特甚至叫起來：「如果有最好的東西，我們當然要用最好的東西。」在獄裏，倍倍爾寫了一篇文章，發表在「民主國」內，對於這位「新共產主義」大加贊美，甚至認杜林的經濟學教程，是馬克斯「資本論」出版以後最好的二冊經濟學書。在當初，連季卜克內西也不會信任杜林，一八七四年六月十三日，他還寫信問恩格斯說：「你有什麼理由假定他只是個騙子，或只是一個假裝的敵人呢？」但他後來也知道了，杜林是一個自大狂。他發覺了，杜林的「經濟

學批判史」，曾用「妒忌的笨話」來反對馬克思。他不能再容忍了。因此，他立即要求恩格斯寫一篇論駁的文章。他說，杜林很迎合了一部分黨員的心理，尤其是在柏林。一八七五年他再要求恩格斯起來反駁。恩格斯很不願意反駁這樣一個無聊的人，但李卜克內西送來了許多德國工人的信，證明黨內正在發生一種空前的危機。「綱領有被浸水的危險」了。因此，他們不得不開始注意這個問題。一八七六年五月李卜克內西又寄來了一篇論文，文內盛稱杜林在哲學上的成就，稱揚他在認識論上的發明。那是摩斯特投來給「前進」的，但李卜克內西拒絕把它發表。八月黨大會，有人起來責難，說他不應該陰謀對付杜林時，李卜克內西就答說，他已經請恩格斯寫一篇論文來批駁杜林了。

恩格斯的反駁成了一本書。書的名稱是：『杜林先生的科學革命』。和杜林先生自己的著作的名稱「卡勒先生的經濟學革命」兩相對照。在這本書內，馬克思主義的內容和觀點，第一次向德國社會民主黨人表示出來了。它爲馬克思主義奪得了無數的工人，事實上還教育了好幾代的人。它第一次向下一代社會民主黨的最清楚的頭腦，系統的闡述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見解，他們的辯證法唯物論。他教育了倍倍爾，倍倫斯泰因，考茨基，蒲列哈諾夫，阿克·爾洛特 (Azel rod)，阿德勒 (Victor Adler)……教育了全世界的工人階級。賴有它，馬克思主義有了系統的

說明；賴有宅，世界上第一次有了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學派。從表面看去，用這樣長篇大論，去反駁一個幾乎沒有讀者的作家，好像是極無謂的，但一個難懂的一向不被人理解的體系，還是第一次，在七十年代，灌輸到羣衆心中。現在，賴有宅，羣衆第一次可以瞭解馬克思的歷史觀了。它討論了哲學，經濟學，社會主義各方面。書立即在德國被查禁了。書的影響，沒有在當時充分發揮。後來，他把書的導論和結論，及論述社會主義的部分，在瑞士，印成小冊子的形式。除了「宣言」，在馬克思恩克斯的著作中，就要算「社會主義由空想到科學的發展」這一冊最有挑戰性了。這個小冊子，立即被譯成了各種文字，隨便在何處，它都做了必要的準備，使人們準備去接受他們的辯證法唯物歷史觀以及他們由此引伸出的革命政策。

在「反杜林論」的序言中，恩格斯表示了他的憂愁：德國實現了它的統一帝國，取得了它的工業繁榮，但它的優越的理智地位是被犧牲了。國家的精神生活被毀滅了。杜林不過是新的庸俗的「假科學」的一個標本。恩格斯最先看見了，物質財富會帶來資產階級之精神的貧乏。杜林先生雖然要使德國的社會主義轉向「最無道義的地方」，但這種嘗試註定要在健全的工人意識下破裂。十年後，他再在他的「費爾巴哈論」中表示了相同的思想。他說：「德國的科學純一性的傳統，只能在工人中間奪得了。因為在工人中間，沒有一個人會爲職業，利潤，或者寵幸而煩憂。」

反之，科學越是自由發展，它和工人的利益和目標將越是調和。……古典哲學的外套，已經落到德國工人階級運動上面來了。」

二十一 社會主義取締法

在倫敦，他是和麗子同居的。一八七七年九月以後，麗子的健康使他常常焦憂。一八七八年，他第二次悼亡了。十四年後，他在寫給倍倍爾夫人 (Julia Bebel) 的信上提到她，曾經說道：「她出身真正的愛爾蘭無產者家族，她天生，就對於她的階級懷着熱烈的感情，她雖然沒有資產階級女子的女學士派的風韻，但她的這種感情，就够叫我滿意了。」恩格斯關於婚姻的見解，後來解說在「家族的起原」中。他的信仰和感情，都使他不能忍受國家和教會對於他的最密切的人類關係的干涉。但爲要給麗子一個最後的快樂，他在她病榻上，和她舉行了婚禮。他在五十九歲頭上失去了她。她的死，當然是他私生活上的一個轉照。但擺在他面前的工作有這樣多，他能因伴侶的失却而憂鬱下去麼？

但取締社會主義的法律在德國通過時，恩格斯沒有立即予以無條件的援助。這種冷淡心理，

如果我們不記着當時德國黨方面的情形，就好像難於說明了。我們必須記着，他只要想到他和馬克思對於「哥達綱領」所加的批評，居然會被黨諸領袖忽視，他對於杜林的攻擊又居然會在一次黨大會內被指責，他就心裏覺得憤怒。

關於社會主義取締法，他雖然老早就覺得，俾斯麥的這個政策目的確在打擊黨，結果却只於黨有利——他說道「我們就把錢送給這個老頭子，他也不能替我們做比這還好的工作」，又說：「過去七年間，俾斯麥先生已經替我們做了許多事情，好像我們曾經付過錢給他們。現在，好像他停不下手來一樣，一定要把社會主義的實現加速起來。『等我過去以後再發洪水罷』，這個格言，對於他，是不夠的；他一定要在他活着的時候發洪水。」——但黨方面的情形，實在也叫他寒心。馬克思和他常常覺得，他們必須使德國的工人階級運動，在一切情形下，皆以階級鬭爭為指導原理。但在黨內，有幾個黨員，僅得是個原理又忠於這個原理呢？他們大多數沒有理論的訓練，以為在新的境遇中，黨的適當政策，是放棄階級鬭爭的外觀，而在資產階級民主派內尋找支持點。多數人的「無背骨」的態度，使恩格斯對於黨不能信任。

在取締社會主義法依然有效時，黨的活動自不得不為相當的自動的約束。但黨內一個小的部分，例如約翰·摩斯特，却決定要在這情況下，發洩自己的憤怒。他責備黨諸領袖，因為他們決心

要保持黨的合法地位。他不事先與黨內任何別一個領袖商量，便移居到倫敦，創辦了一個報紙，要求在德國境內，進行不合法的宣傳。報紙定名為「自由」。它殘忍地把社會民主黨內部的爭端暴露了。報紙的革命情調，最初，尚不怎樣惹起恩格斯的厭惡。對於摩斯特的主張，他暫時採取保留的態度。但報紙的無政府主義傾向，不久就發生了。所以恩格斯知道摩斯特被黨開除時，他也沒有提出反對。

黨不許在德國境內發行報紙以來，新的黨機關報紙，移到蘇黎支去了。恩格斯不肯投稿到黨報上來，他恐怕，報紙已經由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份子控制。倍倍爾雖然屢次說明，他的流利的筆，對於黨是一種最有價值的工具，只要他出馬，黨報的主張就要受他感動，而與他的主張漸漸符合，但最後他的答信是，「你和李卜克內西都知道，我所要求於黨的唯一事情，是讓我有安定的生活，來完成我的科學工作。你知道，十六年來不管怎樣，我還是不斷被要求去為黨報寫文章——我這樣做了，我應李卜克內西的請求，寫了許多連續性的論文，許多小冊子。你也知道，黨一日存在，我和馬克思總會自動在國外，為保護黨，而對抗黨的反對者。我們所要求於黨的唯一事情，是黨應該忠於黨自身。」往下，他還說他和馬克思每次看見黨在德國獲得勝利，總是高興的，因為這種勝利在一定程度上常常是依賴着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但就爲了這個原故，所以在

他們看來，黨的實際行爲，尤其是黨諸領袖的公開言論，應力求與馬克思主義的一般理論相調和。

一八八〇年聖誕節，倍倍爾和倍倫斯泰因到倫敦，要親聆恩格斯的指導。恩格斯和倍倍爾還是第一次會面。恩格斯很喜歡他的這位朋友和弟子，因為他有機警的感覺和清楚的頭腦。他完全信任了這個新朋友。曾一度爲杜林辯護的倍倫斯泰因，也由「反杜林論」的感化，益益轉過來，成爲恩格斯的弟子，所以恩格斯對於他也很高興去教誨。得着他的同意，倍倫斯泰因被派到蘇黎支暫時負起編輯的責任。後來證明他勝任愉快時，恩格斯要求正式委派他去充任這個職務。

倍倍爾到倫敦來談話中最重要的一點，是那正在歐洲大多數國家特別是在德國鬧得很兇的經濟恐慌。倍倍爾以爲恐慌會像一種痼疾一樣拖下去，一直到總破局，於是社會革命發生，但恩格斯以爲，自英國被迫與美法德平分工業的獨佔權，關稅壁壘已經在美、洲和歐洲各處樹立以來，恐慌的節奏已經改變了。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和社會體系雖然必歸於瓦解，但他看到了，在目前，仍有長的或短的繁榮期間會發生。他看來，充分大的水泡已經不會發生了。他雖一度相信，十年間會發生一次大破局，但現在他覺得這已經是過去的事情；自此以後，恐慌將會以更短的期間反覆發生——這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已經完全枯竭的一個證據。關於恐慌在德國的政治影響，他是和倍倍爾一致，承認社會民主黨的發展，將因此加速。

社會主義取締法下第一屆國會選舉，表示黨在農村和小市鎮原有的選民失去了一些，大都市的選民却是增加了。黨的「元氣未嘗大受損傷」，由此獲得了一個明證。這一點，是馬克思夫人所能享受的最後的一點快樂。一八八一年十二月二日她逝世了。她逝世後恩格斯在黨報上發表的哀啓，說到了這一點。這個時候，馬克思自己也常在病中，他不過比他的勇敢的妻，多活了十五個月罷了。在這十五個月中，他的不良的精神，使他多時不能在倫敦居住。因此，他和恩格斯又只能用通信來代替談話。一八八二年秋間，馬克思一度回到他的傷心的家裏來，住了幾個星期，並幾度和恩格斯一同爬上漢蒲斯台的高處，他們以前是常常散步到那裏去的。恩格斯知道，醫生的本領可以使馬克思的生命延長幾年。但馬克思忍受不了那種痛苦。馬克思逝世後翌日恩格斯寫給梭格的信中說：「在他面前，有這樣多的未完工作，他渴望完成它，但沒有力量完成它，——這一點所給於他的痛苦，比死所給於他的痛苦，不知要大幾千倍。他常常像伊壁鳩魯一樣說「死對於死者不是不幸，但對於生者是不幸」。看着這位天才活着像一個半死的軀殼，讓醫生來誇耀他們的本領，讓那些俗人，在他精力強時被他打擊到底的俗人，來傾注他們的嘲笑，那真是甯可像這樣好，真是甯可像這樣好。從今天起，再過兩天，我們就要把他安在墓裏，讓他和他的夫人永遠共眠在一處了。」

好幾年前，恩格斯已經覺得他的偉大的同志在開始感覺衰老了。他怕「資本論」的統計在全書出版之前會成爲過時的，從而把老們的證明力量喪失，所以，總催促馬克思趕快繼續工作，並把它完成。但馬克思一天一天老下去。他覺得力不從心了。恩格斯的烈性的熱心，或不免使他感到煩惱，所以他一直沒有把「資本論」完成的程度告訴恩格斯。他逝世後，倍倍爾問到這點時，恩格斯答道：「這不算什麼，不過因爲，如果我知道了，我就會日夜催促他，要他把全書完成出版。」馬克思明瞭了一切，所以告訴他的女兒說，萬一的事情萬一發生時，恩格斯可以依照他選定的任何方法，去刊行這個草稿。

別的兩個老朋友倍克爾和季卜克內西，和社會民主黨報編輯倍倫斯泰因那裏，馬克思逝世的消息，也是由恩格斯通知的。在給倍倫斯泰因的信中，他寫道：「我們黨內最偉大的一個精神已經停止思想了，我們知道的最強的一個心臟已經停止跳動了。」在給倍倫斯泰因報喪的信裏，他寫道：「所有那些常常和他在一起的人，都能够知道，在理論範圍內，他對於我們究竟有怎樣大的價值，都能够知道在必須有重大的決定時，他又在實踐範圍內，對於我們有怎樣大的價值。從此以後，他的有力的眼光，要和他一同埋到地下去了。」在亡命期中，季卜克內西和馬克思的家庭是特別親近的。對於他，恩格斯寫道：「昨天晚上，他雖然看見他睡在床上，閉着眼死去了，但我

相信，這個光輝的精神從此以後，對於東西兩半球的無產階級運動，仍然會用他的有力的思想，來豐富它的內容。我們會成爲現在這樣，是因爲有他；運動會成爲現在這樣，也是因爲有他的理論上和實踐上的活動。如果沒有他，我們依然會陷在混亂的泥沼中。」

恩格斯用英語致罪辭時，說明了馬克思對於人類，對於世界的無產階級，做了什麼事情。他說：「達爾文發現了有機自然界的進化法則，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進化法則。馬克思還發現了，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以及這種生產方法所創造的資產階級社會，是受一些什麼特殊的法則支配。……理論科學上的新發現，其實際應用在今日也許還是全然不能看見的，他固然以大的樂趣去歡迎，但因這種發現，會在產業及一般歷史過程中，包含一種直接的革命的變化，所以他又經驗到了別樣一種樂趣。……他的生命的任務，是依其方法，推翻資本主義社會和這種社會所引起的政治形態，從而，解放現代的無產階級，就是他，最先一個叫他們意識到他們自己的地位，意識到他們自己的需要，意識到在什麼條件下他們才能得到自由。鬭爭是他的天性。他以這樣的熱情，這樣的毅力來鬭爭，並獲得了這樣的成功，那是少有其敵的。——所以，馬克思成了他那個時代最被怨恨最被中傷的一個人。政府無論是專制的，還是共和的，都把他驅逐出境。資產階級無論是保守派還是十足的民主派，都爭先恐後，把謔言堆集到他身上來。這一切，都被他接

在一邊，把它們當作蜘蛛網一樣的東西，不理會它們，只在必要時加以反駁。現在他死了——愛他的，敬他的，悼他的，有幾百萬革命的工人同志，一片哀聲，從西伯利亞的曠山，到加里福尼亞，在歐洲美洲的一切地點，他的名字、他的著作，將成爲萬古不可磨滅的。」

恩格斯自己表示了，在他能力所及的限度內，他一定要把他朋友的科學工作和政治工作保存並繼續下去。爲要完成這些更重要的工作，他不聲不響地，把他自己的已經開始的工作拋在一邊。他知道，除了他，沒有第二個人能够編輯馬克思的遺稿。馬克思已經把「資本論」第二卷整理到這個地步，所以，一八八五年恩格斯已經能在著者的生日那一天，着手寫他的序言。但他發現第三卷只有一個「極不完全的初稿留下來」。同時，隨着運動的發展，他在報紙和政黨兩方面所必須負擔的責任又更重了。他已經開始衰老了。但他還能在他逝世前一年，將第三卷出版。他着手整理第三卷時，他以爲，那會比第二卷的整理更容易完成。但越是繼續下去，他越是看見著者的精力的衰頹，越是覺得自己的責任的重大了。

二十二 俾斯麥與社會主義運動

馬克斯去世後，恩格斯諸知友勸他遷到蘇黎支住。但恩格斯以爲，倫敦的環境最適於他的研究工作。實在的，他在英國雖然住了幾十年，但真正算得上朋友的，非常的少。英國人對於他沒有好感。但也正因爲這樣，他留在倫敦，才更可以安心進行他的理論研究。他知道，理論範圍內還有許多工作要他做，並且這些工作，除了他，還是沒有第二個人可以代替馬克斯的。他說：「我現在六十二歲了，但手頭還有許多工作要做。」「資本論」第二卷還須有一年的時間，才能够輯編好，其次我想寫一冊「馬克思」傳，一冊德國社會主義運動史（包括一八四年至一八六三年），一冊國際史（包括一八六四年至一八七二年）。所以，如果我放棄了這裏的安靜的和平生活，遷到別一個地方，要開會，要開座談會，從而把我的明察的視線擾亂，我就真是發瘋了。如果情形真再像一八四八年和一八四九年，只要需要，我會立即騎上馬背。但現在簡直是一種刻板工作，

所以在可能範圍內，我不得不從黨報退出。想想罷，要我答覆的信有多少罷，以前，那是我和馬克思共同負擔的；過去一年間，都要由我一個人負擔了。那些由各國通到馬克思書齋內的線，我希望，將來不致割斷才好。」

這時候，俾斯麥正在實施國家保險政策。許多無產者看見由此得到的物質利益，竟忘却他們的仇恨。黨內部的衝突更尖銳化了。俾斯麥在實施國家保險制度時，雖要求資產階級爲錢財上的犧牲，但安慰他們說，這種制度實際是對革命的一種保險。德國經濟學教授稱贊這種新的國家保險制度，認爲是世界史上一個轉點。社會民主黨內也有許多黨員，認這是一個希望的記號，甚至有人覺得，俾斯麥準備認真履行他對拉塞爾的諾言，並建立一個「民意的霍恩佐勒倫朝的君主政治」。恩格斯看到國家社會主義的新潮（這其實是一種復活的拉塞爾主義）居然會成爲黨內一種威脅，是非常動怒的。他立即要黨報發表幾篇論文，向工人說明，政府方面的這種社會主義，不過是一種藉口，由此，政府就可以在他們所統率的兵士和官吏的隊伍之外，再組織一個有訓練的工人隊伍。這是真正的拉塞爾主義的復活。

在社會主義取締法下舉行的二次黨大會，是一八八三年在哥本哈根舉行的。那一次大會通過的某一些決議案，得到了恩格斯的充分的認可。在取締法依然有效時，他是不希望黨內部分裂

的。但李卜克內西「調和，文飾，延緩危機」的態度，恩格斯却不能贊成。這些年來，黨內發生了許多的糾紛。大概說來，黨內部有一個根本問題存在着。倍倍爾相信革命不就會發生，布洛士（Bliss）奧爾（Auer）却相信革命不致在不遠的時候發生。倍倍爾在寫給恩格斯的信裏道破了這一點：「相信社會革命至少要等一世紀才爆發的人，和一個相信社會革命在不久的將來就會發生人，可以在行動上發生差別。」

在恩格斯看來，革命會立即在德國發生麼？自俾斯麥第一次勝利以來，他對於「這個東西」的佩服念頭，一直沒有增加。「這個東西的觀念是這樣不合理的，他的行爲是這樣善變的」。在他看來，和拿破崙三世相比較，俾斯麥有更強的意志，但只有更狹小的見解。那位法國人至少尚有「拿破崙的理想」，這位普魯士人却從來沒有獨立的政治觀念。他的目標是資產階級指示給他的；他的道路，是路易·拿破崙指示給他的。他全然不懂得理論；對於他自己所造成的歷史條件，他也全然不能瞭解。他的意志力，使他成爲德國資產階級的暴君。資產階級知道這一點，但仍不得不擁戴他。只有德國工人的意志，不會爲他的意志所搖動，雖然他的意志是這樣強的。這些意見，包括在一篇未曾寫成的論文內。但這篇論文曾經留下一個大綱，裏面包含着這樣的項目：「俾斯麥全然變爲貴族了」，「巴拿波式的社會政策」，「虛偽的社會改良」，此外有幾句銘語

體的話：「結論：（a）一種情形，那會隨着某一些人的死亡的崩潰——沒有一個沒有皇帝的帝國，無產階級會向着革命的目標猛進，社會主義取締法取消後，社會民主黨將有空前的繁榮——混亂，（b）如果情形好，全部的結果會是一個比戰爭還壞的和平，不然就是世界大戰。」

關於德國未來革命的性質和路徑，他在一八八三年六月寫給倍倫斯泰因的信裏曾經說道：「我們如果要前進，至少要由內部事情和外部事情的變化，把資產階級一部分推進到真正的革命運動上來。所以俾斯麥的政治對於我們已經很够了，他現今只能由一次衝突或辭職來幫助我們了。」兩個月後，他又說：「在德國，革命的最早的直接的結果，必須採取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形態。但這只能是一個短的過渡的階段，因為我們幸而沒有一個純粹的共和主義的資產階級政黨。資產階級共和國——也許要以進步黨為領袖——將給予機會，使勞動階級大眾轉而相信革命的社會主義，並使各種中間黨，有機會證明他們是徒勞無功的，或竟自殺。必須經過這個時期，我們才能够居主動地位。」

他看到了，社會民主運動的傳佈，已經削弱軍隊對於皇帝的效忠心理。他以為，普魯士軍隊的變質，對於德國革命，是一個不可少的支點。一八八四年十二月他寫信給倍倍爾說：「一個無武裝的羣衆，去和一個現代軍隊拚命，從軍事的意義說，只是一個負重。但若我們的後備兵（二

十歲至二十五歲的男子，他們是有訓練的兵士，但沒有選舉權。站在革命方面，純粹民主主義時期，就可以跳過了。」一個月前，他已經對倍倍爾解釋：「在軍事狀況像現今這樣時，我們切不可開始攻擊；這樣，我們將會有一種武裝的力量和我們反對。我們要等到武裝力量不再與我們反對的時候。在情形如此以前，任何革命就令是成功的革命，也不會把權力交給我們，只會把權力交給資產階級的最急進派，即小資產階級。」

在未來的革命中，恩格斯以爲，資產階級會臨時撤回他們的自由主張，但在俾斯麥的半封建統治下，他們決不能這樣做。所以，如果情形需要，恩格斯還準備與真正的資產階級政黨聯合，把社會主義取締法取消，把保護關稅廢止，把斷分法及其他各種封建性規定廢除。他說：「手段是不成問題的，但永遠的判斷基礎，是社會民主黨在任何情形下不能拋棄無產階級意識。」

一八八七年二月俾斯麥獲得了最後的一次選舉勝利。一八八八年一月七日，恩格斯寫信給梭格說，一切都進行得太妥當了，只要威廉二世逝世，情形就會陷於混亂中。第二天他寫信給李卜克內西也說：「現在不要戰爭，也不要暴動了，一切的進行都太妥當了。」八月，他又寫信給梭格說，威廉二世和俾斯麥的衝突，已經迫在眉睫了。一八八九年二月他說：「反動的團體，宮廷中的牧師和貴族，正竭力要把皇帝挑撥起來反對反俾斯麥，並引起衝突。」一八九〇年二月他告

訴倍倍爾說，威廉二世好像是特別創造出來，爲要把德國表面上安定的局面破壞的。『但我們不能猜想到，他居然會這樣快捷這樣完美地替我們把這一切都做好。對於我們，這個人的價值，用黃金計算，會和他的軀殼一樣重。他用不着擔心有人會暗殺他；把他刺死，不但犯了殺人罪，並且犯了不可救藥的錯誤。如果必要，我們應當給他一個保鏢，來防範無政府黨徒的惡行。』

一八八八年八月社會民主黨報在柏林的壓迫下，由瑞士被驅逐了。它不得不移到倫敦來。這個報紙從此就在恩格斯的監督下，由倍倫斯泰因編輯了。關於國際政治問題，報紙還直接在恩格斯的領導下。

一八九〇年一月社會民主黨在選舉上獲得了大的勝利。二月，黨報出了一個特別慶祝。恩格斯說，現在沒有什麼可以幫助俾斯麥了，除非他用粗暴的手段引起暴動，然後再用加倍粗暴的手段來彈壓。『這是他有所的唯一的的手段——並且我們知道俾斯麥這種人是爲目的而不擇手段的。』黨不可盲動。但『事情決不會如此的。社會主義取締法把我們的工人訓練得太好了，並且在我們的朋輩中有許多老兵可以應付這個——有許多人已經訓練好了，可以在彈雨中注意地立着，以等候攻擊開始的時間。』

俾斯麥倒台之速，出於一般人意料之外。青年皇帝以爲，社會主義取締法已經沒有需要；一

八九〇年十月這個法令被撤消了。這對於德國，對於德國的工人運動，是一個新歷史時期的開始。

一三三 各國的社會主義運動

自遷到美國以來。第一國際的情形，迄無好轉的希望。不生不死的局面，使負責人格格覺得厭倦。一八七六年他宣佈會期無限延期。恩格斯相信，第一國際已經盡完它的使命，已經走上死亡的路了。不過，它的傳統，還由一個在紐約的發行的報紙維持着。報名「勞動標準」，由愛爾蘭代表麥克丹內爾(Mao Donnell)編輯。

在這個報紙上，恩格斯曾寫一些連續性的論文，名叫「一八七七年歐洲的勞動階級」，在其內，他描寫歐洲勞動階級的運動，說它「不僅在有利的進步中，並且在迅速的進步中」。現在，整個的運動是浸潤在一個精神裏面了，現在我們再有了一致的和諧，在各國的工人間，已經有不斷的規期的聯絡了。他還說：「在一八六四年設立國際工人協會並在會內外與敵人鬭爭，始終擁護這一面旗幟，以至在政治的壓迫下，但不是在自己的錯誤下，陷於失敗而不得不在表面上退休

的人們，現在可以驕傲地斷言，國際已經把它的工作完成了，已經把它的大目標實現了——那就是，全世界無產階級已經在壓迫者的壓迫下統一起來。」

國際雖然死亡了，但無產階級的運動是分頭在各國進行。當然，各民族的狀況的差異，決定各國工人階級政黨的注意點。要他們走上一條路線，不但是困難的，甚至於是不可能的。所以，一八七六年底，倍克爾在日內瓦提議把國際當作各國政黨的聯合來復活時，恩格斯就表示反對。他以爲，歐洲的勞動階級運動，只有在某種足以影響全歐洲的事情發生的情形下，可能結合在一個主要中心的周圍。但這樣的事情，一直還沒有發生出來。

在馬克思還在的時候，恩格斯已經覺得，他和馬克思的任務，是就國際政治的進行和全世界生產的發展，來考察運動的發展。他們不能屬於任何一國的政黨，而當顧及一切國家的情形，馬克思去世前不久，恩格斯把這點告訴了倍倫斯泰因：「馬克思在理論和實踐的範圍內已經有這樣的成就，所以各國勞動階級運動的領袖人物是完全信任他。在緊急的時期，他們來向他請教，他們通常總覺得他的意見是最好的。他在德法俄諸國已經有了這樣的地位，在別一些小國，是不必說了。」他還說：「在值得並且有機會時，我們總和他們保持不斷的接觸。但違反他們的意思去影響他們，那只會傷害我們，甚至把我們已經在國際內部得到的信任心破壞。我們對於這點，已

經在革命中，得到太多的經驗了。」

在實際問題上，恩格斯對於各國工人階級的運動，總是採取保留態度，他從來不把他的意見強迫他們接受，不過在被請求時提出他的意見。他覺得，他的特別任務，是在馬克思主義有人信從的地方，保持理論的純潔性，並在可能把理論傳佈開來，他認為，他的使命是視察全世界勞動運動的進展，而在被詢問時，根據他和馬克思所有的廣泛的經驗，來提供指示意見。他在給予指示時，他的最後目標，是使全世界的勞動階級運動接受馬克思主義和他所主張的理論，目標，和方法。他以為只有以階級鬥爭為基本原则而組成的工人政黨，可以克服階級的對立。他屢次被詢問時，他總發覺，所提出的問題，有不同的性質。在處理這種種問題時，他只有一個決定的指導原則，那就是他的歷史觀。

在德國，拉塞爾的勢力，經過他們的極奮勉的鬭爭，還是不能完全排除去。但在德國，至少還有一個黨：明白表示他們願意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來工作。在別一些國家，情形就更壞了。

拿法國來說，蒲魯東、巴枯寧、路易布朗的勢力就瀰漫着。巴黎公社雖然把法國的「折衷的街頭的社會主義」殺死了，但情形依舊不能樂觀。那裏有許多硬化了的事情，使他的革命熱情不易忍受。

在法國這個時候，最熱心而又最成功的一個戰士是格德（Julien Gracq）。他以前曾經是巴枯寧主義者。馬克思恩格斯沒有直接和他通信；因為他的助手，拉法格（馬克思的女婿），可以把他們的理論，間接影響於他。但他後來也親身來向他們領教了；他已經可以依照馬克思主義的模型來為第一個法國的工人政黨起草一個綱領。會議是在恩格斯的書齋內舉行。這是一次重要的會議。他們倆還是第一次有機會可以對法國無產階級的思想，發生直接的影響。新黨在工業區域得到了主要的支點。在巴黎，則『可能派』（Possibilites）仍然有勢力。

馬克思去世後，恩格斯會經由兩方面去影響法國的工人運動。一方面，他要調解法國的社會民主黨和德國的社會民主黨，翼由此使戰爭可以避免，但這是以後的問題。另一方面，他又鼓勵在法國建立一個同樣強同樣統一的社會民主黨。一八九三年在法國第一次有了許多社會主義者當選為國會議員，但其中只有少數贊成那在利堅公園踏起草的綱領。大多數是屬於猶太的社會主義團體；他們宣稱他們的原則沒有可能歸成一個公式。恩格斯會批評他們，說他們對於社會主義只有一種柏拉圖的愛。米勒蘭（Milliard）是他們當中最乖巧的人物之一；但資產階級的法律成見，在他，是難於掃除的。約雷斯（Jaures）是一個高興演說的大學教授。他有更深的資產階級意識，不過後來恩格斯也覺得他已經很有進步，並可能會發展成爲一個正規的社會主義者。他去

世的那年，還在信上對蒲列哈諾夫說：「約雷斯已經走上了正路。他正在學習馬克思主義。我們不要催促他過甚。他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那就超過我的希望了。無論如何，我們不要太過責備求全。黨是太大了，馬克思的理論是太廣佈了，西歐諸國少數幾個孤立的幻想家，不能作多大的損害。」

再說到英國。他住在英國，對於英國無產階級的發展，五十年來，也無時不以深切的注意去注視，但他和英國的運動，自英國諸領袖退出國際以來，一直沒有密切關係。在英國，真正可以算做朋友的，只有「資本論」的譯者摩亞（Shannal Moore）——一個製造業者，失敗後，到尼格里亞担任過首席推事的職務——和愛威靈（Edward Aveling）而已。一八七九年他寫信給倍倫斯泰因說：「像大陸那樣的勞動階級運動，英國還是沒有的。」

幾年前，哈爾內曾經提出一筆錢，要恩格斯或馬克思寫一部書，對英國的無產階級，系統的，說明他們的學說，但對於這個觀念，恩格斯沒有多大的信心。一八八一年工會主義者希普芬（Shipfon），創辦了一個週刊，定名為「勞動標準」，贊成在英國把工人的獨立政治運動復活起來。恩格斯投了一些論文來，盛稱工會是保衛生活標準並減少勞動時間這兩點上面有莫大的功績，但責備他們沒有做種種工作，來使勞動階級成爲生產手段的主人，來廢除工資勞動制。

度；並且說他們沒有用政治的武器來與資本主義鬥爭。他說，與歐洲其他各國比較，英國的勞動階級有組織得更好的工會，他們不應在政治行動上這樣遠落在大陸方面之後。無產階級到處都在爭取政權——除了英國；實則完全的民主主義，在英國，最容易使勞動階級居上最優越的位置。在一篇評論「反穀物條例同盟」的工資學說的論文內，恩格斯對工人說明了，在自由黨黨中工人們所信任的人物所以贊成自由貿易，不過因為他們要減低英國麵包的價格，從而使英國的產業，在世界市場上，成爲一個更強的競爭者。五個月間，他試要用大憲章主義和宣言的精神，來感化英國的工人，但結局他把這種努力放棄了，因爲由此發生的唯一反應，連編輯人也被大陸的異端邪說嚇倒了。恩格斯很頹廢地寫信給馬克思說：「英國的工人不會向前進；只有事實，即英國工業獨佔權的喪失，可以搖動他們了。」

在這種失望之後，恩格斯相信英國的工人階級在英國喪失其世界商業獨佔權以前，決不會組成任何以階級鬥爭基礎的政黨了。但他以爲，英國的世界商業獨佔權，早已受到嚴重的打擊。他在他自己的和馬克思的著作的英譯本序文內，在報紙論文和私人通信內，一會反復把這個問題提起。他特別看重這個事實：即，自由貿易學說的基礎觀念，是英國爲世界的工業中心，而以農業爲主的世界則以穀物棉花不斷供給於它。不過，英國的工業獨佔權，和歐洲別一些文明國家的發

展，是不能相容的。這一些國家，如不甘陷於愛爾蘭的地位，也是需要工業化的。英國的商業政策也表示英國正決心要脫離英國產業獨佔權的縛束。他相信，美國將來必然會成爲世界工業的中心。當然英國的資產階級，在喪失其獨佔權之後，還會殘存着一個時期：威尼斯人和荷蘭人，在其商業已經衰落以後許久，還保存着他們的世界銀行業者的地位。但英國現在的產業制度，只在生產迅速不斷擴展時有維持下去的可能。終有一天，失業者（其人數是一年比一年加多）將不能忍受，而自己起來決定自己的命運。馬克思曾經預言，在歐洲，也許只有英國的社會革命，可以由和平的合法的手段來實行。「在資本論」英譯本第一版的序言中，恩格斯特別注意了這一點，但他加上了一句：「當然，他決沒有忘記加上一句，英國的支配階級，不經過護奴的叛變決不會甘心屈服在這種和平的合法的革命之前。」

但大約就在馬克思去世前後，社會主義的呼聲在英國更普遍了。組織一個獨立工黨的運動也在增長中。這個運動是由奧德曼(Henry Hyndman)領導的。恩格斯承認奧德曼有一點機警的幹才，但他的傲慢的野心，他們急於爲獨裁者的火性，很使恩格斯不高興。

奧德曼全然不瞭解唯物史觀，但受了「資本論」的影響。在馬克思晚年，奧德曼常常去訪問他，但他也高與他的爲人。那時及以後，恩格斯總不願意和他會面，並稱他爲「拉塞爾的可憐的

「運河畫」。奧德曼聽了很生氣，也給他一個綽號，「住在利堅公園路的條頓族大喇嘛」。他曾設法，想離開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友誼。他雖會在「全民英國」一書隨意借用馬克思的意見，但始終沒有引出他的名字。

在恩格斯看來，真正的政治的勞動運動要在英國發生，奧德曼的社會民主聯合會是必須先「斃命」的。從這個聯合會，有一個「社會主義聯盟」分出來，恩格斯雖承認摩里斯（William Morris）的誠意，但他沒有和這個聯盟接近，這個聯盟後來也染上了無政府主義色彩了。同樣，在原則上，他也和費邊協會（Fabian Society）疏遠，因為那是反對階級鬭爭的。在協會的會員中，他最看重安尼·貝蓀（Annie Besant）他覺得，在協會的一切出版物中，要算她的一些小冊子最有影響，一八八六年庇孫（Pearce）約他寫一個小冊子，來解釋社會主義的意義時，他拒絕了。他覺得，巨大的勞動階級，是不能由幾個「說教人」來推動的。九十年代，倍倫斯泰因與西德內·韋布（Sidney Webb）、蕭·伯納（Bernard Shaw）、格拉罕·沃拉斯（Graham Wallas）親近時，恩格斯很責備他。

一八八五年的選舉，奧德曼失敗了。但一八八六年的經濟恐慌，使勞動階級不能再置信於自由貿易的騙音，奧德曼利用這個機會，在特拉法加場組織了一個大示威運動。碼頭工人擁護保護

稅制的大會在同一地點被召集了。兩方面發生了衝突。市內商店有些遭失業工人劫掠了。恩格斯指責了這件事的惡影響，但說這件事將使自由黨人不得不承認缺乏和貧困的存在。他責備領導者們說：「這些社會主義紳士，要由巨力，在一晚之間把一個運動咒出來——其實，這在任何地方都是多年積累的工作。」

可是這一年恩格斯在英國也看到了「真正的社會主義工人運動」的痕跡。舊的不贊成政治行動的工會一旦被裂了，無產階級中那最貧窮的部分，就會捲入社會主義的運動中。奧德曼的最激烈的反對者愛威靈、馬克思的幼女愛麗娜的丈夫，在一八八七年，在倫敦東區，發動了一個有力的鬭爭。他們在倫敦東區組織了瓦斯工人和不熟練工人的工會，而與「勞動貴族」的舊工會相反。一八八九年這個工會發動了一次碼頭工人大罷工。

一八九〇年倫敦第一次舉行五月節的示威運動。他由一個大貨車的篷頂，看見無數熱烈的羣衆在要求行動。他才相信真正的社會主義運動已經在英國開始了。在長久的睡眠之後，英國的無產階級終於起來了。他說：「大憲章主義的孫輩，已經開上火線了。」

哈第(Henri Heald)已經開始(起初是在蘇格蘭，後來又在英格蘭)活動來創造一個獨立工黨。恩格斯也許事先知道了這個計劃，但他決計等着，看看運動的結果。他勸德國的社會民主黨

在未有進一步的證據以前，不要把牠當作「唯一的真正的獨立工黨」。馬克思的理論，是由英國社會的歷史長成的，但英國人不像德國人一樣愛理論，新的工黨仍舊有工會主義的作風，它的黨員也不知目標何在。恩格斯以爲，他們必須由他們自己的經驗，由他們自己的錯誤的結果，去學習。現在他們已經知道，資本和勞動的利益不是調和的。他以爲，在英國，「自意識的過程」是比較遲緩的，但他相信，對於盎格羅·薩克遜人，這是適當的路。忍耐是必要的。

美國的盎格羅·薩克遜人還更有這種情形。他以爲，在美國，「真正的運動」不能由拉薩爾的信徒也不能由倍倍爾的信徒創造出來。一八九〇年他已經對留特 (Gaultier) 說道：「美國的工人階級像英國的工人階級一樣會起來，但他們必須走他們自己的路。我們不能把理論擠進他們喉嚨裏，但在理論之前，他們會由他們自己的經驗，他們自己的錯誤及錯誤的結果而被推進。這樣，就得了。獨立的民族會走他們自己的路；英國人和他們的同族，是一切民族中最獨立的民族。他以爲，本地工人會對外來工人持貴族態度，不能不說是新世界工人運動發展上一個特別的障礙；但他知道，因爲這個青年國家一開始就立在資產階級的原理上，所以，在這個青年國家，工人階級會自始就染上資產階級的偏見，乃是必然的。」

他對於美國寄與了莫大的希望。他相信，停滯的局面將會停止；所以，在美國，全民族的社

會主義運動必將以大足步前進。他說：『美國是以純資產階級的原則為根據，絕無前資產階級社會的廢物留在身體內，它還以巨大的能力向前發展，——這種能力，甚至在他們的保護關稅制度上面，也表示出來了，有一天，這種能力和這些原則，將會產生一種使全世界驚異的變化。他們一經開始，一經用他們所有的能力和氣魄開始，我們歐洲人就會像小孩子一樣覺得無能了。』美國人在世界史上所負的任務，他是從來不輕視的。

在意大利，也依照德國的模型，建立了一個小的社會主義團體。在八十年代後幾年，意大利已經有少數知識份子，開始翻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想把他們的學說普及起來；他們的熱心工作，取得了很大的報酬。一八九一年第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報紙——「社會批評」——在米蘭創立了。恩格斯會投稿到這刊物上來。他還對該黨的領袖杜拉第（Ferrari）在各種重要問題上提供意見。羅馬大學教授拉布里奧拉（Antonio Labriola）亦常與他通信，討論歷史觀的各種問題。

一八八八年底，奧地利也依照德國的模型，建立了一個社會民主黨。黨內最主要的人物是維克多·阿德勒（Victor Adler）他原來是一個醫生。一八八三年他首次與恩格斯會晤。一八八九年他再去訪問他。在「工黨選民」（由約翰·白恩士，克·哈弟，和湯曼共負編輯責任）內，恩格斯

對於阿德勒的能力和毅力會大加贊揚，他們間的關係，只有他和倍倍爾間的關係可以比較，阿德勒算他爲師；他嘗說，教訓未來的社會主義領袖如何把理論用於實際的，就是恩格斯一人。

在比利時，荷蘭，瑞士，丹麥，瑞典，挪威，波蘭，匈牙利，西班牙，葡萄牙，羅馬尼亞，恩格斯的理想也發生了影響，但他的影響，在一個國度，發生了最大的歷史的效果。這個國家，在那時，論勞動階級運動，還是非常落後的。

我們知道，恩格斯在考察國際政治的前途時，那已經臨近的俄國革命，常常在他的考慮上，佔極重要的地位。他常常覺得，這個革命將爲西歐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掃開道路，這個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但何時才會爆發，並以怎樣的形態爆發，還是不能決定的事情。馬克思屢次和他討論到這些問題，俄國的革命家也常常來請教，他懂得俄文，儘够閱讀那些從俄國寄來的印刷品，但他覺得，對於俄國經濟狀態他所有的知識太貧乏了，所以在這些問題上面，他總覺得他沒有充任顧問的資格。但他的意見益成爲必要的了，因爲已經有一個新黨成立。與民粹派相反對了。這個新黨對於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有了最深刻的研究。民粹派不信俄羅斯也須經過長的產業發展過程，才能把共產理想實現，他們相信，俄國是一個大農民國家，可以立即由原始共產社會，通過到充分發展的現代共產社會。他們不能接受馬克思主義的診斷，因爲依照這種診斷，資本主義

的階段乃是必然的。

因此，在當時的俄國思想界，發生了一個問題：即未來的共產組織，能不能由俄國本有的農村共同體的原始共產主義，直接生長出來。換言之，是不是在俄國，共產制度也須由資本主義的生產體系生長出來。只要可能，恩格斯對於這個問題是避免不要答覆的。而在必須答覆的場合，他以為，在這場合，他們須處理的，已經不是理論問題，而是政治問題，俄國初期的社會主義者以為俄國人是最適於擁護社會主義的人民；這是恩格斯不能同意的。他不但不能同意。並且抱有一種惡感，因為這種大斯拉夫主義的意味，他是不能贊成的。他主張，俄國的原始共產組織，只能與生產的低階段相容納。「米爾」對於未來的社會主義的俄國，他承認，不是毫無積極的意義；但他主張，這個制度的遺留，即在俄國，也不能把資產階級社會的階段踢開，除非西歐無產階級的革命，能够在適當的時候發生。一八八二年「宣言」的俄譯本第二版出版時，恩格斯和馬克思就把這個判斷表示他們的序言上了。

在過去經驗的教訓之下，他們朋友兩個，對於由俄國來的政治亡命客大多數，不得不採取嚴格的保留態度。但一八七二年他已經能够對倍克爾說，在這些逃亡者中，確實有一些人的才能和性格，很可以贊美，他們能够刻苦勉勵，在理論上，也有過人的地方。在這些俄國人中，有治巴

亨 (Lopatin) 和哈特曼 (Leo Hartmann)。

那時候，俄國常常發生暗殺。但他希望，恐怖主義的時期可以迅速了結，而以立憲國的公開政治鬭爭爲其代替。他以為，使沙皇降服的比較確實的方法，是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決不是恐怖主義者的行動。在馬克思去世後不久，他會對洛巴亭說到，這時俄國革命黨的任務，不是實施社會主義的理論，因爲在俄國這時候，社會主義理論的實際條件還是不存在的。真正的任務，在迫使亞歷山大三世召集一個國會。選舉競爭的演說，比一切形式的革命宣傳，會有效果得多。俄國的實際生活條件，已包含充分的貧苦，可以引起革命。情形一被克服，人民就會被刺激起來活動，革命就會自行爆發的。

但在俄國，反動的勢力不久就再抬頭了。俄國社會主義者沒有希望可以在政治上發生直接的有效的作用，方才轉過來，注意原理的問題，而以恩格斯爲權威。一八八三年在日內瓦形成的「勞動解放社」這個團體，是第一個俄國人的社會主義組織，純然採取馬克思恩格斯的見解的。裏面最重要的人物，有蒲列哈諾夫，阿克塞洛德，和維拉·查蘇利希 (Vera Zasulich)。恩格斯聽說，在俄國人中畢竟有一個黨的核心，無條件無限制地接受他和馬克思的理論，並將無政府主義斯拉夫主義的傳統予以打破時，他當然是很快慰的。

幾年後，這些馬克思主義者親到倫敦來訪恩格斯。他把他曾經對查蘇利希說過的話，再對他們說；那就是，爲什麼在他們和別一些俄國社會主義團體發生爭論時，他不參加進來。他對於俄國運動的歷史，俄國的現狀，沒有充分的認識。這種情形，使他對於一個特殊時機的必要策略，不敢發表任何意見。一八八五年他對查蘇利希談到俄國革命的發展時已經說過：「覺得自己已經把革命製造出來的人們，常常會在次日覺得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並且會覺得他們所造成的革命，並不是他們想欲製造的東西。」

八十年代末期，恩格斯不常提到俄國革命了，但俄國方面的信徒能這樣吸收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他是十分嘉許的。關於農業問題，恩格斯以爲，將來大土地被沒收時，不應一小塊一小塊分散給農民。在他看來，農民的土地所有權，無論在西歐，在中歐，還是在俄羅斯，都是不能復活的。他堅信，未來的農業是和工業一樣將被合理化，而以機械，依大規模去經營。一八九三年他寫信給丹尼爾孫 (Lautsahn) ——「資本論」的俄文譯者——就說：「用一個新的資產階級化的地主階級，來代替五十萬的土地所有者和八千萬左右的農民，不免會引起可怕的痛苦和騷擾，」但歷史是一個最殘忍的女神，她不僅會在戰爭中，並且會在和平的經濟發展中，在死屍堆上，駛行她的勝利的車輛。」

一八九二年春，在恩格斯家裡，一個會議被召集了。俄國社會主義亡命者的兩派，都出席了。會議的目的，在促使兩派的聯合。在恩格斯看來，過於匆促的統一運動，也許只會引起更多的爭論；所以，計劃失敗時，恩格斯並不怎樣失望。他對於俄國內部的問題，始終採取保留的態度。一八九三年俄國農業問題著作家浩爾維齊 (Tsar A. Hourvich) 由芝加哥寫信來，請他把農民在未來革命中的地位宣佈時，他就拒絕了。他答說，他不知道，他是一個外國人，他們說的話至多只能有暫時的效果。在國內情形平靜如常時，政治亡命客會分裂成爲許多對立的小黨派，乃是不可避免的。他說：「只要研究一下過去十年間俄國那一些亡命客的著作，你就知道，這各派會用最矛盾的說法，來解釋馬克思著作和運情上的文句，好像那些文字是由經典或新約書引用下來一樣。所以，對於你向我提出的這個問題，我的話，如果被人注意，恐也不免要被他們同樣使用。」他說，過分的辯論應當避免；爲要避免過分的辯論，俄國的社會民主主義者間應迅即找到有力的領袖。

這個有力的領袖不久就找到了。二十五年後俄國的大革命爆發了。恩格斯當初當然沒有料到，他的主張，會在一個一向被他視爲文明圈外的國家，得到最早的實現，但沒有疑問，如果他能夠親見這個革命的發生，他一定會非常高興，並且會給予最大的鼓勵的。

二四 第一次歐戰前夜的情形

在各國社會主義運動以遲緩的或迅速的步驟向前發展的時，歐洲大戰的危機是一天比一天嚴重了。恩格斯在一八四八年曾經希望有一次世界大戰引起世界的社會革命，但自各國的社會主義政黨成立以來，他以為，一次歐戰的發生，至多，只會延遲社會主義實現的日期。但現在，大戰的危機是益益緊逼了。普法戰爭後亞爾塞斯，洛倫二州的割併，沒有解決德法間的問題，不過把兩國的世仇加深了。巴爾幹已經成爲各強國逐鹿的對象。法國人一致贊成與帝俄締結同盟。各強國利害衝突的緊張程度，隨時有引起大戰的可能。一八八二年十二月恩格斯寫信給倍倍爾會說：

「我應當把一次歐戰看做一種不幸。這回情形將異常嚴重。若干年間，歐洲將到處實行鬪武主義，因爲每一個國家都要爲自身的生存而戰。俄國革命家將近要成功的工作將會變爲無用；德國的黨將會在鬪武主義的洪流中暫時被掃蕩，被破滅，法國的情形也會如此。」

一八八六年十一月，他已經担心世界大戰將因巴爾幹問題而爆發。他希望法國的社會主義者能够認識法俄聯盟所造成的危機，起來反對這種同盟條約的訂立。他知道，這樣一次鬭爭將成爲世界空前的屠殺；最後勝利屬於何方，那要看戰爭是否持久，並且看各國如何結合。戰爭愈持久，英國的位置將愈見重要。（一方面因爲它擁有強大的海軍，一方面因爲它擁有巨大的資源）；在戰爭初開時，它的軍隊將保持在後備狀態中，但只要六萬英國軍隊，就會在戰爭中提出最後的打擊，這一切，當然都以各國國內情形不生變化這一件事爲前提。但在法國，戰爭的爆發可能會把革命份子擁上政治舞台；在德國，那個老頭子的失敗或死亡，可能使整個制度發生變化；這樣，交戰勢力變方的結合，就會發生變化了。總之，全部將會陷在混亂中。只有一個結果是確實的：以空前的規模實行大屠殺，全歐洲以空前的程度陷於枯竭狀態，最後是舊制度完全崩潰。

關於他預料中的這次大戰，在一八八八年二月，他留下了一個這樣的估計：「悲劇而又喜劇式的大衝突；國家必須冒險去進行政治的戰爭；那是從來不會引動民族熱情的。爲對付這種戰爭，國家需有一種國民軍；這種軍隊，在民族自衛戰及跟着發生的攻擊戰上，才是可靠的。在這種衝突中，普魯士國和普魯士軍隊會歸於瓦解——也許就在對俄的戰爭中瓦解。這次戰爭可以維持四年之久，結果只是痠癩和枯骨。」

他預料到了，這種曠日持久的戰爭，會予陸各國的經濟前途以威脅。他遺稿中留下了如下的記載：「在這種情形下，美國的工業將會得到全線的勝利，因而在我們面前只有兩條路——不是在生存的基础上（因為美洲穀物的大量生產，使我們只能立在這個基礎上），回復到純粹農業的狀況，……便是社會革命。」又說：「戰爭嗎？開始戰爭是容易的，但一開始，其結果便不易想像了。」又說：「和平依然維持着。但不過因為軍備的技術是在不斷的發展中，沒有一國已經準備好。世界大戰（這是唯一可能的結果）的前途是絕對不能預計的。所以，想到它，他們都發抖起來。」

在世界大戰的危機中，恩格斯的主張會被若干曲解，以為恩格斯是民族主義的擁護者。但我們必須知道，恩格斯對於德意志帝國，是始終沒有好感。俾斯麥倒台後，倍倫斯泰因在恩格斯的影響下，曾在黨報發表一些社論，表示他不為德皇的暫時政策所迷惑，德皇垂愛於社會政策，並要奪得工人階級擁護的一切措施，沒有能够欺騙恩格斯。

黨在倍倍爾和李卜克內西的領導下，益益有了擴張的影響，社會主義取締法取消後，在德國境內，第一次的黨大會，於一八九〇年十月在哈勒召開了。我們必須記着，恩格斯看見他和馬克思對於「哥達綱領」的批評竟為黨諸領袖所忽視，是極憤怒的。在社會主義取締法依然有效時，

黨綱當然沒有修改的可能。現在，這個法律撤消了。恩格斯急不可耐地希望來一次修改。哈勒大會同意在下一屆大會實行把黨綱修改。李卜克內西以爲，黨綱可以由全黨的集體工作來定立。但恩格斯不能相信這個。他爲要掃除拉塞爾主義或小資產階級人民黨的公式，決心要爲最大的努力。因此，他不事先與黨商洽，就在考茨基（Kautsky）編輯的「新時代」內，把馬克思的批評公佈出來了。這個批評一直到這時候，還很少人知道。

黨沒有抵制的理由，但宣稱這個批評的公佈，沒有事先徵求黨的同意。起初，恩格斯怕考茨基會成爲衆矢之的。他寫信給倍倍爾說：「假若你們竟通過一種取締社會主義法來箝制你們自己的同志，你們又和普魯士有什麼區別呢？這對於我個人毫無關係。我決心要說話時，世間沒有任何黨可以箝制我，不許我說話。但我覺得，你們應當想一想，你們在舉動上是不是應該慎重些，是不是應該少帶一點普魯士主義氣味。你們——黨——是需要社會主義科學的；這樣的科學，在黨內還有自由的時候，才是可能的。」

許多年來，他就覺得，必須把拉塞爾的傳統炸開；現在，他覺得，適當的時機已經到了。次一屆大會於一八九一年在歐爾福特開幕，新綱領被採取了。當草案寄到恩格斯手裏時，他立即把一切其他的工作排開，來研究它。他同意，「一切已經死亡的傳統之主要的殘留物」，是消滅

了，不過，必須批評的地方還是很多。譬如，草案上說無產階級的人數和貧困都在不斷增加。對於這句話，他提出了反對，而不能無條件接受『貧困程度益益增加的理論』。他說，勞動階級的組織以及他們的不斷增加的抵抗力，可能當作一個阻礙，來防止他們的貧困程度的增加。確實在增加的，只是生活的不確實性。在批評草案的政治要求時，他指出了這種錯覺：即，現存的法律制度，使黨的一切要求，可以由和平的合法的手段得到滿足。他說，德國還是一個半專制國家，所以在英美法等國，和平的發展雖然是可能的，但這種可能性，在德國，是絕對沒有。

對於正式的草案，考茨基也發覺了許多點，要加以批評。他提出了一個新草案，作為討論的基礎。其理論方面是由他提出，其實踐方面是由倍倫斯泰因提出。這個辦法，得到了恩格斯的充分贊許。他還會與倍倫斯泰因逐條討論。但在他看來，這個新草案也有許多點要更改。例如，考茨基主張沿用正式草案中的一句話：『社會的這種變革，不僅是無產階級的解放，並且是在現在狀況下受痛苦的全人類的解放。』恩格斯認這句話是『全然不着邊際的』。他提議改為，因為階級鬥爭的原故，統治階級甚至比被壓迫階級更在道德方面知識方面成爲殘廢的。十月十八日，倍爾從歐爾福特寫信告訴恩格斯說：『「新時代」所提出的新草案，已被採爲討論的基礎。李卜克內西很不高興，因爲他堅持我們自己的草案。』總之，情形總算合了恩格斯的期望。所以，他

寫信給倍倍薩時，表示他非常愉快；在給梭格的信裏，他說：「馬克思的批評全線勝利了，這使我們高興。」

德皇原來想用一盤稀飯，來把大眾的心買回。他看見這種方法不能見效時，他的態度就改變了。他看見社會民主黨的勢力不能用這種方法來收買時，他自然會想用暴力來鎮壓這個運動。恩格斯看見這種情形，不覺得驚異。但他不希望勞動階級在這種情況下和德國的精選軍隊衝突。「勞動階級的這種舉動，必然會引起軍事獨裁制度，所以我們必須留意，不要讓這種事情發生」。

（一八九〇年四月他給梭格信裏的話。）

卡爾諸總統被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刺死了。德皇威廉二世這時對革命黨行動的措施，使社會民主黨不得不採取緊急的處置。恩格斯在爲馬克思「法國階級鬭爭」新版撰一篇序言時，就抓住這個機會，解釋了在這樣的危機中，黨應採取什麼戰略。他根據他多年的經驗，表示巷街戰已經成了過時的，因爲現代軍隊已經有了改良的設備，改良的訓練，改良的組織。他說明了，自一八四九年以來，巷街戰的情形已經全然改變；現在，巷街戰是全然於軍隊有利了，改良的鐵道運輸，使政府可以更敏捷得多的，把可靠的軍隊召集；小徑後膛鎗比以前的平徑前膛鎗，可以射四倍的遠，可以射十倍的快。炸彈和炸藥，可以立即炸毀最好的街壕。現代的街道是這樣寬這樣直，新

式來轟擊和大砲可以在發揮最大的效果。他說，「如果有一個革命家居然在細密的考慮之後，贊成在柏林的工人區域發動街壕戰，他一定是發狂了。」

他還說，在大革命中，市街戰還是可以發生的，但若真的發生了，那就要用優勢的力量採取攻勢，不應在街壕裏採取被攻的守勢。往下他又說：「反動勢力說挑起無產階級從事公開的戰爭，然後再嘲笑他們，說他們不敢冒失敗的危險。不過，『這些紳士們真是濫費心機。我們沒有笨到這個地步。如果這種挑戰也會引起效果，他們也可以在下次戰爭中，要求他們的敵人，再採取老佛里茲（Fritz）的直線隊形，或採取瓦格蘭和滑鐵盧的橫列隊形，並持燧石鎗來做戰了。』」他還說：「德國的社會民主黨在國際無產階級隊伍中是最團結的力量，至少在開始的時候，它負有特別的使命。它的生長是自然的，不可抵抗的，平穩的，像一個自然的過程一樣。他說，維持這種生長，使其不致中斷，一直到最後把現行的政制推翻，乃是一件重要的事。在決戰的日期到來以前，黨不要把力量消耗在前哨戰上。」

當時，一個新的取締謀亂行為的法令，正好在提付討論。顧及這一點，黨編輯部認為必須遇事慎重。因此，他們決計把恩格斯這段話壓下來。恩格斯當然不願黨在這樣的情形下試行武裝的暴動，他曾嚴切地忠告黨，莫受敵人誘惑，以至在必敗時走上戰場，所以他同意把文章裏面某一

些字眼刪去。但他接讀印刷本，看見原文的刪削，使他看來像是一個「和平的合法的戰士」時，他是極憤怒的。他寫給拉法格，考茨基和菲雪爾 (Richard Fischer) 的信，都表示了這種憤怒。他說，他要法國人特別認識這一點：即他的和平戰略，「只是對當時的德國而言的，且當中也還附有許多保留。在法蘭西，比利時，意大利，和奧地利，這樣的策略是不能採用的。即在德國，到明天，這種策略也可以成爲無用的。」所以，很明白，恩格斯晚年反對使用暴力的猜想，可以證明是無稽的。不，一直到他死的時候，他總是覺得，除了極少數的例外，無產階級必須經過拚命的鬭爭，方才能奪得政權。

歐戰的危機，間接成了各國社會主義政黨間的危機，各國的社會主義政黨，都以爲，只要工人階級能够發動一個民團的和國際的運動，並且合作起來，就可以把戰爭的危險避免。一個新的國際，於一八八九年在巴黎成立了。但一開始，就遇到了種種困難。對於各社會主義黨間正式談判，恩格斯沒有積極參加。他只以導師的地位，仲裁人的地位，聽受各國的黨的諮詢。

這時候，德法兩國的衝突，益益尖銳化了。拉法格代表法國的黨責備德國的政策，說巴黎各報紙的戰爭情調，完全要由德國負責。恩格斯在覆信中，說到俾斯麥雖再愚蠢，也不須要發動一次會把全歐洲捲入的戰爭，因爲由這種戰爭得到利益的，只有沙皇。一八九〇年二月，他寫了一

篇相當長的論文，登載在蒲列哈諾夫和阿克塞洛爾德編輯的，蘇黎支發行的俄文報紙上。他說：歐洲大戰將由何方勝利，最後要取決於英國的態度，因為英國可以斬斷法國或者德國的穀物輸入，從而使法國或者德國不得不在饑餓中屈服。他指出了，俄皇的外交政策，是由社會革命在俄國的「長足進步」決定的。報紙雖異常熱烈地擁護俄皇的帝國主義政策，但所表示的，只是新成立的都市資產階級的思想。只要在人口中佔大多數的農民被准許在國會內發言，情形就會發生變化。這時候，俄皇的注意將會由國外移向國內，從而，把統治世界的夢暫時擱起來。所以，只有俄國革命，可以防止世界大戰的危機。最強固的反動堡壘一經傾倒，歐洲每一個政府會喪失它的自信心。這樣，西歐就會在無外國干涉的情形下，起來負起它的歷史使命。那就是，由資本主義社會，轉為社會主義社會。反之，如果俄國的革命竟無期延緩下來，歐洲就會以益益大的速度，陷入世界大戰的深淵中了。

這篇文章，用法文，在「新理想」上發表了；還由英文，在社會主義報紙「泰晤士」上發表了。

法俄同盟條約終於締結了。所以，法國工人黨發行的年鑑邀請他撰文時，他很高興利用這機會，來說明他對於當前的危機所抱的見解。在撰寫時，恩格斯十分慎重。他曾把他的草稿送給拉

法格夫人（馬克思的女兒），徵求他們的意見。她，拉法格，和格德看了他的草稿都衷心表示滿意時，他當然覺得很鬆快。文章的內容，在向法國人說明德國社會主義的起原和發展。在導言內，他告訴法國的讀者說，他五十年致力於革命所已獲得的地位，使他不能代表任何一國的社會主義黨反對別一國的社會主義黨，雖然天生是一個德國人。很可能威廉二世在社會主義達到高潮以前，不會老是坐着不動手。在那裏很可能會發生一種鬭爭，很可能更優越的反革命勢力會暫將勝利。但這樣一種勝利，不會阻礙社會主義的最後勝利，却不過使它的勝利更完全。但這種有利的結果是否發生，要以大戰不發生這件事為前提。不幸，大戰可以在任何時爆發。

於是，他對法國的工人階級說，德國的社會民主黨，決不會把牠自身，看做是和現在的德意志帝國一體。德國的社會民主黨，極反對割併亞爾塞斯，洛倫二省。他說，與德意志帝國比較，第三共和國是代表革命（但只是資產階級革命）；但其它與沙皇的俄國同盟，它就不能再代表革命了。

其次，他說明了，在帝國主義的德國背後，有社會主義的德國政權立著；它贊成波蘭的復國運動，允許北希勒斯維格和亞爾塞斯，洛倫自決。他責備法國的愛國主義者太過性急，說他們不值得為要達到目前的目標，而使整個大陸荒廢，並把整個大陸放在沙皇的鞭笞下。他說，在未來

的由俄國點火的世界大戰中，法德二國將受到最大的犧牲。在現狀下，維斯杜拉河的砲聲一響，法國的軍隊就會開進萊茵河。「這樣，德國就要爲它自身的生存而戰了。」如果德國戰勝了，德國不會有什麼利益。但若失敗了，它將會喪失一大塊土地。這樣，德國爲圖自存，必定會再發動一次戰爭。如果是這樣，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命運就被註定了。沙皇和德法二國的內閣，將立在德國社會民主主義的屍骸上，擁抱着狂舞了。

往下他又說，在現在的國際勞動階級運動中，德國的社會主義者負着最重要的責任。它負有義務，要防衛它到最後一人；它負有義務，不向國內的敵人屈服，也不向國外的敵人屈服。如果和平不被破壞，十年之內，社會民主黨，就會統治德國；如果戰爭爆發，社會民主黨如不能在二三年或三年內勝利，那就至少會在十五年或二十年內全然破滅。戰爭規定了不是立即招致社會主義的勝利，就是使舊社會秩序全然破壞，以至留下一片廢墟，使社會主義社會成爲不可能的。

他說，德國的社會主義者是不能拒絕與法國人戰的，如果法國人居然效忠於俄皇陛下。他的這個意思，在他寫給倍倍爾的信裏，同樣表示了。他說：「我們必須認識。如果與俄國同盟的法國竟與德國宣戰，它就必定會和歐洲最強的社會民主黨相戰了。這樣，我們只有用全力來抵抗那和俄國站在一面的侵略者了。」

他的論文，立即在法國方面，引起了不友好的反應。議員卜洛多 (Protot)——也許是一個俄國偵探——寫了一篇諷刺文，說恩格斯爲一條毒蛇，說他二十年來專門挑撥法俄間的感情，其目的無非要使德國獨霸。他還說，德國的社會民主黨和他們的大顧問恩格斯，比法國的社會主義者更有愛國心。法國的社會主義者維倫 (Vailant) 和朋尼爾 (Bonnier) 大覺狼狽；格德也辯稱，如果有別一個民族甘願破壞歐洲和平，法國工人當然也參加兵役。朋尼爾寫信給恩格斯說，如果社會民主黨可以防止戰爭的發生，那當然沒有問題，但若沒有這種力量，也不應急急要把我們的弱點暴露。對於這種抗議，恩格斯答說，「法國社會主義者不明白表示，在自衛的戰爭中他們願意抵抗德皇威廉的攻擊，只不過因爲理由太顯然太自明了，用不着說出來。在德國，每一個社會主義者都覺得，在這樣的情形下，法國的社會主義者定然會起來盡保衛民族獨立的義務。」他寫那篇文章時，就是從這個觀點出發的。

後來的人，常常引用恩格斯這幾句話，來證明他是一個愛國主義者。在這種曲解下，好像恩格斯將會在民族戰爭之前主張放棄階級鬥爭。這完全是一個誤解。他並不希望色當勝利的再來，像不希望俄國或法國勝利一樣。他認爲，有階級意識的無產者，在德國和法國各能支配自身命運的條件下，方才能實現他們的目標。在民族的生存受到威脅時，階級鬥爭一定會退到幕後去的。

所以恩格斯反對戰爭，但他以為，若戰爭不可避免，則一切反對的空談都不但無益，而且有害的妨害。他知道，如果戰爭真的不得不爆發，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處境當然會變得困難。社會民主黨的力量，尚不能遏止戰爭的發生。在國會內拒絕軍費案的通過固屬不智，宣傳罷服兵役，也不過給統治者以壓力壓迫的口實。他以為，一切辦法，「如其可以使現有軍隊更與民軍相近，如其只會加強我們的自衛力量，如其會把一切尚未入伍的男子，自十七歲至六十歲的，訓練起來，武裝起來，如其會把他們編入固定的隊伍，但不增加隊伍的統束，則黨應當投票贊成」。他還說：「在戰爭的危險消滅時，我們不能要求把現有的軍事組織完全改革。但若有一種方法，會把適齡但未受訓練的大批壯丁召集，儘可能把他們訓練的，並編入隊伍，我們所能接受的民兵制就接近了。」

一八九三年二月和三月，恩格斯在「前進」雜誌上發表了一些論文。題名「歐洲能够裁軍麼？」在裏面，他指摘了，正規的軍隊依然被維持着，那並不是爲軍事上的理由，而是爲政治的理由。他說：「這種軍隊不是爲抵禦外侮，而是爲制止內憂的。」他提議以民兵制代替常備兵制。他以前已經對馬克思說過，合理的軍事組織，應該是普魯士制度和瑞士制度的中間物。他說，只有社會主義社會能够真正與充分的民兵制度相適合。他提議限制服役的年限，並認這是縮減

軍備的必要前提。但倍倍爾的回信，說國會同志不能接受他的建議，並且說：「事實上，我們用不着苦腦筋，在幫助那些在位的紳士們。他們只注意軍事技術上的改革，在其他一切部門，是公然採取保守主義的。我們越是要增加服役人數而縮短服役年限從而使軍隊民主化，他們就越是只注意那些可以使舊傳統保持不變的事情。一方面是對於真理之絕對的明白灼見，另一方面却是一種狹隘的傑拿(Pro-Jana)的精神。」

恩格斯的見解，是以無產階級奪得政權爲主眼。在大戰會妨礙這個目標和實現時，他反對戰爭；在大戰已經不可避免時，他就要求改革軍隊組織，使其可以達到民衆武裝的結果。黨諸領袖把他的精神誤解了，這和法國方面的社會主義者的誤解，是全然一樣的。」

二十五 晚年

麗子逝世後，她的甥女瑪利·愛倫 (Mary Allon) ——她是在恩格斯家裏長成的——暫時替她管理家務，但一個糊塗的市儈名叫洛雪爾的，引誘了這個愚笨的女孩子。在恩格斯的主張下，他們結婚了。洛雪爾生意失敗後，他們全寄居在恩格斯家裏。但他們與其說是愛恩格斯的人格，寧說是愛他的錢袋。所以，當忠實的海倫·德妙子 (Helene Demuth) ——她是馬克思夫婦多年共患難的女僕和朋友——在馬克思去世後能夠到他家來替他料理家務，那真是他——宗太好的運氣了。德妙子是一個仁慈聰明的女人。她替馬克思料理家務，一直到馬克思去世。她的生活是這樣和馬克思一家的生活聯繫在一起，所以，她能夠到恩格斯家裏來時，他歡迎她，是像歡迎一個忠實的老朋友一樣。

自星期一到星期六，恩格斯過着一種單純的安靜的生活。但到星期日，他的會客室裏，常常

是很多賓客的，賓客的大部分是由各國來的同志，他們或是來倫敦遊歷，或已經住在倫敦。他慷慨地精神矍鑠地坐在東道主的席上，有時哼着舊的德國學生歌曲或唱他愛唱的英國歌「布勒敬師」。愛威靈夫婦幾乎常常在座，由一八八五年至一八九〇年，卡爾·考茨基和他的年輕的妻，也常常參加進來。一八八八年，社會民主黨報的編輯部，由瑞士被驅逐，搬到倫敦來了。裏面有倍倫斯泰因，菲雪爾，和摩特勒 (Mottler)。最常訪問的法人，是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和郎格 (Longue)；此外還有朋尼爾 (Charles Bonnier)。從德國來和他長談的，有李卜克內西，倍格爾，和辛格爾 (Singer)。在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中，有持拉·查蘇利希常常到他家裏，在波蘭人中，有孟德爾森 (Stanislaw Mendelsohn) 在英吉利人中，恩格斯的親近朋友很少。最重要的人，有約翰·白恩士 (John Burne)。不過，他同情於自由黨。松恩 (Will Thorne) 亦常常來。巴爾福·巴克斯 (Balfour Bax)、古賓罕·格拉罕 (Cunningham Graham) 和威廉·摩里斯也常常來。摩里斯對於中世紀的愛慕，恩格斯常以幽默的態度去容忍。哈第和魁爾希 (Quatrec)——「正義」的編者——不過有時候來。英國的社會主義者和工會主義者不高興愛威靈，也不高興愛威靈常到的房子來。有一次，韋布 (Sidney Webb) 對倍倫斯泰因說：「我們攻擊馬克思，其實是指愛威靈。」大陸方面的頌揚者，會稱恩格斯的寓所為「社會主義聖地」，英國人卻不願

走進他的家。

只要遇到休假，他是常常到海濱去，尤其是到伊斯特堡（Eastbourne）。一八八八年他「遠足」到美國和加拿大。同行的人有他的知友蕭理梅（Schorlemmer）——特出的化學家——和愛威靈夫婦。一八九〇年他又偕蕭理梅游歷斯坎底納維亞半島，他的遊蹤，到了北岬。

在美國他住了一個星期。他會著了他的老朋友梭格和哈爾內。他預料，紐約將成爲資本主義生產的首都。

經過短期間害病。海倫·德妙子在一八九〇年十一月四日逝世了。她是「一八四八年前的老衛士的最後一個，」她去世後第二日，恩格斯寫信給梭格說：「現在我又是一個人了。馬克思多年來所以能够安心工作，是賴有她；過去七年間我能够安心工作，也是賴有她。以後將會怎樣，那真是不知道。並且，在黨的問題上，此後我也不能再得到她的機警的意見了。」當她的遺骸被葬到馬克思夫婦墓旁時，恩格斯眼含着淚說：「以前我屋子裏是有陽光的，現在要成爲黑暗了。」——但幸而路易絲·考茨基——她和考茨基的關係是在一八八八年破裂了——接受了他的非常客氣的邀請，答應住在他家裏。新年來到時，他又能夠寫信給梭格，說他又覺得安逸了，一八九四年路易絲和奧地利一位醫生佛萊白爾格（Freyhafer）結婚後，他還是在他家裏担任這種

工作。他們三個在同一條街上，租了一所更大的房子，住在一起。

恩格斯七十歲生日時，文明世界各處對於這位老人爭相致送祝賀。他很謙虛的，表示他不願見這種祝賀個人的舉動。他說：「最知道我的，是我自己；我知道，這種敬意的大部分，不是由於我和我的功績。一個比我更偉大的人，卡爾·馬克思，播下了種子，註定了要由我去收穫它的名譽和果實。我只有把我的餘生，捧獻給無產階級，庶幾對於尊敬，不致覺得慚愧。」

一八九三年八月，在蘇黎支，一次國際大會被召集了。自社會主義取締法撤消以來，德國方面的朋友，不斷要他回來，親眼看看祖國的情形，因為現在他的祖國已經成爲一個大工業國，並成爲歐洲社會主義的堡壘了。他和路易絲·考茨基及佛萊白爾格一同到科倫。火車駛行於萊茵，他的故鄉時，青年時代的種種回憶，齊集在他腦裏。他看見教堂的高塔時，淚湧出來說：「可愛的地方啊，如果有福氣住在這裏啊！」由科倫，他同倍倍爾一同經過梅因茲，和斯拉斯堡，溯萊茵河而上，至瑞士。在格勞朋登，他偷閒了半個月；在那裏，他的弟弟赫爾曼等候着他。一直到大會快要結束時，他才到蘇黎支。

對於歐洲社會主義的這位保姆，大會全體致送了深切的敬意。在代表中，有拉布里奧拉，杜拉弟等著名人物雖然和他通過信。但沒有和他會過面。對於冗長的討論和商議，他是素來不高興

的。但他很高興地參加了各種社交的集會。他和愛麗娜·倍倍爾，考茨基，拉布里奧拉等人，會一同乘船到明德利康。主持人很想把他的時間獨佔過來，但他願意在真誠的討論之外，還有時間可以和幾個好友欣賞一點清鮮的微風，喝一杯淡酒。在阿克塞爾洛德家裏，他聽了一團俄國少女唱歌。維拉·查蘇利希被給予了一個親吻。一個維也納來的女工人阿德爾赫·德爾拉克——後來的卜蒲夫人，奧地利社會主義婦女運動的領導人——很得了他的稱許。

恩格斯担任大會的名譽主席，不能拒絕致送一篇閉幕辭。他踏進湯浩爾大廳時，一致的掌聲鼓起來了。在大多數代表眼裏，他已經是傳奇上的人物了；他們能親身見到他，都大喜過望。在他的演說中，他謝拒了這種敬意：他說，第一、這種敬意，應付於一個偉人，恰恰在五十年前，他和這位偉人，在「德法年報」內，一起發表了最早的社會主義論文。他說：「社會主義，從那時候那樣一個小的團體，現在已經發展成爲一個有力的政黨了，在它面前，全世界的官場都抖戰着。馬克思死了，如果他還活着，世界再沒有別一個人，能够像他那樣，看着自己畢生的事業而覺得驕傲了。」

幾星期後，他和倍倍爾一同到奧地利去。在那裏，他對同志們說，就令他以馬克思同志資格在這五十年內對於運動有什麼貢獻，他也不望報酬的。他說：「現在我們是一個大力量了。我們

被人害怕，我們的力量，比別一些大力量，更有決定的作用了。這就是我的真正榮譽。我們不是白費一生了。」他還旅行到柏林。他自離開軍隊以來，還是第一次到那裏，他在康考第薩一個羣衆大會內講演了一次。他說，在他青年時，柏林還是一個宮廷，守備隊，貴族，和官吏的世界，現在卻是一個世界最強大的工人政黨的首都了。

這種種新景象，雖使他看了高興，但他還是願回倫敦的書齋裏來。他寫信給梭格說：「一切人都好，但我並不注意這個。我很高興，因為這一切都過去了。他說，第二次他再去時，他要事先約好，不得再在公衆面前，舉行任何閱兵的儀式。」公衆所給於他的招待，頗使他驚異，但他情願把這種種，留給國會議員和演說家去享受。

一回到倫敦，他就開始工作。「資本論」第三卷將近要編輯成功了，還有第四卷要他編輯，此外，他打算把「德國農民戰爭」一書改訂，使其包括德國的全部歷史。他還打算寫一部「馬克思傳」，和一部國際史，因為除了他，他覺得，沒有別人勝任這種工作。同時，他還時時考察各項問題。一個亞洲國家還是第一次發生大的政治變革。一八九四年九月間十四日，他寫信給考茨基說：「又是一次莊嚴的歷史反語法。只有中國還可以被資本主義生產征服；這個征服過程一旦完成，資本主義就在它自己家裏成爲不可能了。」這一老人，在他去世的前一年，看出了中國在

世界史上的重要地位。

• 歷史雜俎 • 一九四

二十六 終

一八九五年元旦，他在答覆卜滿夫人的頌賀時，他希望這只是最近一次的生辰，不會是離最後一次的生辰。二月八日他還能說，他近來的健康，比一向時都好，並且說他正在享受工作的快樂，但三月間，佛萊白爾格不得不通知阿德勒，說這位老人正在患著食道痛。恩格斯沒有想到，這就是死的記號。六月開初，他寫信給丹尼爾孫，說他目下覺得不好，但情形不怎樣嚴重。六月底，他寫信給菲雪爾，說他還不能做任何工作，並且說這一次病不知要纏綿到什麼時候。阿德勒聽說他的病狀急轉直下時，向監獄官告了一個假，特意來探視他的老師一次，恩格斯正在「以斯多亞的精神」，甚至以幽默的精神去忍受痛苦。已經不能說話了，他還在石板上表示他的意思。在阿德勒探視的期間，他的病急切走向惡化的途徑，阿德勒不得不於八月三日離去時，他已經失去了意識了。八月五日晚，是一代最偉大的理論家實踐家之一，腓特烈·恩格斯，就在他的倫敦

寓所內，和平地逝世了。

他始終沒有知道他的病是不治的。但他知道他的情形是益益向下。他忠於他的死的哲學，預先把一切事情佈置得妥妥當當。他留下了一筆大款子，其中劃出二萬馬克，作為倍倍爾和辛格爾的選舉費，並且附註，依照英國法律，他只能依這個方法，把錢遺贈給德國的黨。這筆錢，只是他的財產的一小部份。其餘額，分給了馬克思諸女，佛萊白爾格夫人，和洛雪爾夫人。遺囑執行人為森辛爾、摩亞，佛萊白爾格夫人，和倍倫斯泰因。他把他個人的圖書，贈給德國的黨，並委託倍倍爾和倍倫斯泰因處理他的未發表的遺稿。

生前留下的遺囑，表示他願意把他的遺體舉行火葬，骨灰投入海中。他吩咐了，葬儀應絕對成爲私的，不要讓任何政治關係參加進來，而應以有私交的朋友爲限。他的這種種志願，都照行了。愛靈娜通知約翰·白恩士時，就明白對他說，請他不要把舉行儀式的地點和時間，通知任何人。儀式是在南西鐵路韋斯明斯特橋車站舉行的，然後遺體送到瓦真的火葬場。舉行火葬禮時，參加者大約不過八十人。李卜克內西，倍倍爾，辛格爾和倍倫斯泰因由德國來；拉法格由法國來；安塞 (Anseele) 由比利時來；文·德·哥斯 (Vander Gooze) 由荷蘭來。俄國方面是由維拉·查蘇利希、沃爾考夫斯基 (Walowicki) 斯台普尼克 (Stepniak) 代表。此外，還有一個波蘭人

和一個意大利人。愛威靈夫婦，慕恩，魁爾希，社會主義聯盟一個代表，代表英國的勞動階級。此外，還有考茨基和勒斯納（Léonard）——一個裁縫，自共產主義同盟會時代以來，就是恩格斯的朋友——和幾個家族代表。恩格斯一位姪子，在棺前稱，他雖然在政見上和家族反對，但總是無偏心的，和氣的，看待家裏的人。森李爾·摩亞在深切的感動下，致送了一篇短短的演說。李卜克內西代表德國的黨，倍倍爾代表奧地利的黨，拉法格代表法國的黨，對「全世界有階級意識的無產者的這位國際知友」，表示感謝。倫敦的國際工人教育協會——最早的國際團體——在八月十日舉行了一次追悼會，倍倍爾在會內發了言。愛威靈夫婦，勒斯納，倍倫斯泰因，護送他的屍次讓到伊斯特堡，依照他的遺囑，把屍次讓在距白赤·赫德五海里的地方，沉到海裏去了。這正是一個暴風雨的秋天。

阿德勒在維也納「勞動新聞」，發表了他逝世的哀啓，內稱馬克思爲「國際社會民主主義最偉大的理論家」，而推恩格斯爲國際社會民主主義最偉大的策略家。事實也是，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把新的益益發展的歐洲勞動階級政黨領袖們培養起來的，告訴他們怎樣把理論應用到政治實際上的，就是恩格斯。他密切注意着各國的發展；他不單注意共同的發展路線，並且同樣適當地，注意各國個別的歷史因素。他有一種特殊的對於現實性的感覺。

不待說，他的思想，他的工作，他的成就，是和馬克思合在一起；要是我們像一個學究一樣，研究他們個別的貢獻，那是一點益處沒有的。有一次，拉法格問到了這個問題。恩格斯就答道：「沒有疑問，總有人會努力去瞭解並且分析資本主義生產的機構，發現資本主義的發展法則——不過，這一定要經過一個很長的時間，並且這一切工作還會成爲一種補綴雜湊的細工。只有馬克思能夠就一切經濟的範疇，由它們的辯證法的運動，來考察它們，並把它們的依次攙起的諸階段，和那些決定它們的原因連貫起來，並且把經濟學的整個體系，在一個綜合的理論——其個別部分是互相制約互相支持的——上，重新建立起來。」這幾句話，表示了在一些什麼地方，恩格斯自己覺得他是不及馬克思的。他常常責備自己，說自己在理論上是懶惰的，但他對於理論的連繫，有一種天賦的能力。他往往可以由直接的觀察，去把握，去理解，並由此推出行動的綱領來。

他是謙虛的，但他有堅決不移的信念。他深信時間是他的同盟。他深信，在他和他的黨的堅決鬭爭中，一切的敵人都必定會倒下來。他的敵人也知道這點。他逝世後，斯杜漢（*Stuhr*）——薩爾的大工業家，威廉二世社會立法問題的顧問——所有的一家報紙，就發表了一篇論文，說：社會主義者恩格斯移生的工作，是發動一種鬭爭，從而把一切現存的社會秩序訓練和道德都

消滅。」

全世界的社會主義黨，都痛悼他的逝世。比利時黨的青年領袖方·德·維爾特 (Van der Veldt) 撰文追述他在蘇黎支步入會議廳時的印象。「要閉會了。最後一次的投票，是在熱病似的情形下舉行的。每一個人嘴裏都喚着一個名字。腓特烈·恩格斯步入了大廳。在大歡呼的聲浪中，他踏上了講壇。他用大會的三種語言，說到過去的鬭爭，現在的勝利，和未來的無限希望之後，太陽光好像突然射來了，雲霧好像吹散了。社會主義的精神團結，像白日一樣，在各國的特殊精神中照耀着。當他用「宣言」最後一句話來結束大會時，全會場都跟着喊：『全世界工人聯合起來。』」

科學社會主義的偉大建立者腓特烈·恩格斯，終生沒有懷疑過他的理論，沒有懷疑過他的理論的成果，他的「一生是捧獻於他的理論的。」

ENGLES ZHUAN

GUO DA-LIH
BIANYI

恩
格
斯
傳

編譯者 郭 大 力
出版者 光 華 書 店
發行者 光 華 書 店

華東·華北
東北·中原

■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

一九四九年二月在哈爾濱印造
再版發行五千冊

No. 75 D 5001—10,000

381 381
381 381 381

381

381



108611

108611

108611